

# 總統 蔣公教育思想之研述

高廣孚

目次
壹、緒論
貳、總統教育理論之基礎
叁、論教育之意義與目的
肆、重要之教育訓示與措施

伍、對學校教育之重要訓示與決定
陸、蔣公之倫理教育思想
柒、結論

## 壹、緒論

故總統 蔣公一生從事革命大業，勳業彪炳，功在黨國。國父生前對 蔣公深為倚重，故於民國成立之初，即肩任鉅艱，完成東征北伐，統一全國。復領導全國軍民，從事八年抗戰，終於打倒日本軍閥，獲得最後勝利，使我國躋身於世界五強之列，使我中華民族揚眉吐氣於全球。且也獨具慧眼，高瞻遠矚，早在民初之際，即已洞悉匪俄勾結，禍國殃民之陰謀，於抗戰之前，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之主張，痛剿頑匪。惜日本軍閥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乘機入寇，使剿匪大業，功虧一簣。共匪不但獲有喘息之機會，且以參加抗戰為掩護，陰謀破壞顛覆，乘機坐大。

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共匪擴大叛亂，全國人民眩於抗戰勝利之果實，惑於共匪惡毒宣傳之伎倆，對我 領袖人格頗多侮蔑，而國際人士對我 蔣公言行更多曲解，無論國內國外，對共匪姑息妥協之風正熾，和談苟安之心日高，蔣公却於此時，獨排眾議，基於國家民族之前途，凜於「漢賊不兩立」之大義，堅持貫徹繼續戡亂之基本方針。惜國際上短見之政客，受共匪之蒙騙，對我戡亂工作，不但不予聲援，且千方百計，從中破壞，致我戡亂大業，中途蒙受鉅大之挫敗，使自由世界慘遭至大之損失。

政府播遷來台之後，總統 蔣公領導自由中國軍民，勵精圖治，鞏固台澎金馬反攻基地，毫不為國際逆流所屈，恆不為苟安心理所動，仍確認蘇俄中共為世界禍亂之源，唯有消滅中共匪幫，亞洲安全始可無慮，世界和平始得維護。

時至今日，越南淪陷，高棉變色，泰、馬危若懸卵，赤鋒日趨高張，侵略野心曾不稍戢。世界各國對我反共抗俄之基本國策始逐漸了解，始悉我 領袖乃世界反共之導師，自由中國乃世界反共之燈塔。

總統一生，不但勳業卓著，人格光明磊落，而且學養精湛。一生著述極多，包括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各方面

，凡有關之詔告與訓示，均爲革命建國之準繩。可稱爲當今世界上最偉大之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家，而且亦爲最偉大之教育家。總統逝世之後，全國軍民痛失革命導師，朝野震悼。今適逢 蔣公崩殂週年，爰不揣譾陋，恭研 領袖教育思想一文，藉表悼念之忱。

## 貳、總統教育理論之基礎

蔣公秉承 總理遺教，對三民主義，民生哲學之精義，闡揚發皇，精闢入微。對 國父「知難行易」之說尤爲重視，多所發明創造，從而提示「力行哲學」之理論。此一哲學之內容，實爲 蔣公一切教育理論及思想之基礎。

### 一、力行哲學之教育思想

(一)「知難行易」說即力行哲學之基礎：蔣公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中，認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爲「民生哲學」。總理以「民生」爲歷史之中心，爲人類進化之原動力，以駁斥馬列之邪惡學說。國父之民生哲學，乃繼承中國固有之正統思想，認定利他爲革命之本務，仁愛爲救世之基本，發揚光大，而以「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爲終極之理想。民生哲學爲主義之基礎，由主義而產生革命之原動力。所謂革命之原動力，蔣公在本講辭中曾指出，分開言之，即智、仁、勇三個字，若合攏言之，即是一個「誠」字。「誠」爲力行之動力，革命之成功即在於智、仁、勇三者之力行也。

總統稱：「總理研究社會進化的定律，認定人類求生存的意志和努力，足以推動社會的進化，而中外古今所有革命的事業，唯有依於人類求生存的天性而出發，才能解決當前問題，增進人類幸福，促進世界大同。總理革命的動機是不僅救國，還要救全世界人類。他是要根本除去足以妨礙人類生存的一切不良努力和現象，要剷除社會上的不平。要建設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進而建立和平共存的大同世界」。(註一) 蔣公以「誠」爲革命之原動力，「誠」之表現在於行智、行仁及行勇，要在訓示吾人，一切成功均在「力行」。曾謂：「一部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可以說就是啓示我們革命要「力行」的道理」。(註二) 由此視之，蔣公之力行哲學，不但爲 總理「知難行易」說之繼承，亦且爲該說之發揚光大也。

蔣公在「中國之命運」(註三)中，對力行哲學要義之闡發，極爲精到。在其中引述 總理之言，以中國之積弱，實由於國人深中「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毒，故提出「知難行易」之說，以端正人心，改革社會風氣。故 蔣公稱，自辛亥革命之後，一般國民與黨內同志，不知建設之必要，更不知中國之建設必須以革命之手段實行。雖有 國父眞知，作吾人之指導，一般同志與國民仍以知爲易，以行爲難，忽視建設，尤不能了解民生主義，而僅以具備民族民權主義之形式爲滿足，故建設之革命歸於失敗。

蔣公在此指出，古人之知，乃自累代之經驗與畢生之力行而得。惟有自力行得來之知，始為真知，惟有真知，方纔易行。惟有 國父知難行易之說，始為指導人生之真理。

蔣公於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講「行的道理（行的哲學）」（註四）時，闡精發微，對力行哲學之精旨發明無遺。首論行的哲學為唯一之人生哲學，唯有認清力行之真諦，對於所行所為始有信心。次論「行」之本義，以行即人生，勉人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精神。再論「行」與「動」之區別，以「動」非「行」，動是臨時的，偶然的，他發的，行是經常的，必然的，自發的。動有善有惡，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而指出真正之「行」，為天地間自然之理，人生本然之天性，有目的，有軌道，有系統。又論行之目的，在增進人類之生活，群眾之生命，民族之生存，與國民之生計，而歸於「力行」即是革命，革命之動機在救人，革命之本務在行仁。又論行之要素即「智、仁、勇」，行之原動力為「誠」，行之表現在創造，在進取，在建設，在完成三民主義之革命。行之極致即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蔣公在此講辭之始，即論「行」與「動」之不同，在本文之末，更指出「行」必有科學方法，因以別於妄動，由此而提出「行」之四大要件：(1)必有起點；(2)必有順序；(3)必有目的；(4)必是經常的。與前文之「動」遙相對照，更見出行乃有計劃之實踐，有恆心，有毅力，冒險犯難，茹苦含辛，卒底於成之行事。故在行之前，必有周詳設計，必預立鵠的，必安排步驟，必擬定方法，按部就班，依次實施，故曰行非妄動盲動。所行之事，事前因有周詳之考慮，利害之衡量，故所行必善，而動則未必。蔣公所謂「行善」而「動未必善」之真義，即在此也。由此可知，革命即在行仁，而力行哲學，即革命哲學也。領袖經常勉人篤信 總理知難行易之學說，由力行中求取真知。唯有篤履實踐纔是力行，亦唯有力行天下始無難事。

由以上所引，則知 蔣公之力行哲學，實以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為其基礎，並加以闡發充實，以之作爲革命之哲學，做人行事之道理，以及宇宙萬物進化之原理也。而 領袖「行的教育原理」實亦肇基於此。

(二)知行合一說與力行哲學之契合：由上文所述，知 總理之「知難行易」說為 蔣公「力行哲學」之基礎，已無疑義。茲再論王陽明之「致良知」，「知行合一」說與 蔣公力行哲學之關係。蔣公當年於戎馬倥傯之間，與日理萬機之際，對陽明知行合一說與 總理知難行易之理論，曾作多次之比較、分析與研究。迭見於下列演講：「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註五）、「革命哲學的重要」（註六）、「中國的立國精神」（註七）、「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註八）、「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註九）及其專著「中國之命運」第六章中。蔣公在此等演講及專著中，詔示吾人者下列數端：

第一、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經過中日、及日俄兩戰役之後，國勢驟強，割我台灣，佔我琉球，併我朝鮮，又復囊括我東北各省，居然在世界上成爲五強之一。其所以致強之原因，並非得力於歐美之科學，而是受益於中國之儒道及陽明哲學。日本

精研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及「致良知」哲學之後，使以前衰弱萎靡之風蕩然一空，使支離破碎之封建國家爲之統一，全國上下，力行實踐，發奮圖強，遂逐漸雄踞東亞，而傲視全球矣。蔣公稱日本之所以能如此者，決非一人一時的偶然之功，而是「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立國精神，及其上下一致力行實踐之效果。關於此點，總理在孫文學說第五章「知行總論」中，亦曾認爲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非倖致焉。

第二、蔣公指出陽明所稱「良知」之知與總理所講「知難行易」之知，在本體上不同。「良知」之知，乃良心上之知覺，爲每人所固有，不待外求，即所謂「生而知之」之知；而總理「知難」之知，爲一切學問之知，爲「知識」之知，必求而後得；但不易強求，亦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蔣公會謂：「陽明所謂「知」，偏重於人性的良知，即不待學而後能，不待教而後知，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之知，例如愛國家、愛民族、救同胞、救同志，又如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乃至惡惡臭，好好色，都是人類天然的「良知」。而總理所謂知難行易之「知」，乃是着重於科學上的知識之知，要由學、問、思、辨工夫纔能得來。其經過的歷程非常繁雜困苦，因此所求得的知識，就非常高貴。獲得這種知識的機會，不是每個人皆能有的。中庸論述人的天資之高下不一，其論知與行乃分爲上中下三等，即所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如果借用這三種天資高下之知來區別陽明和總理所謂的「知」，則陽明所謂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之「知」，是屬於「生而知之」的一面，總理所謂知難行易之「知」，是屬於「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一面，這兩種「知」的本體完全不同，就很顯著的看來了。」（註一〇）蓋陽明心學，實上承孔、孟儒學要旨，其所謂「良知」，即孟子所主之「良知良能」也，乃本自天賦之良心，人人知孝敬父母，人人知尊敬師長，此即陽明所謂之「良知」之知也。若人人知孝敬父母，即孝敬父母，若人人知尊敬師長，即尊敬師長，便是「即知即行」，便是「知行合一」。若「知而不行」，「是爲不知」。此即陽明立教之主旨。總理所處之時代與陽明不同，自幼即受西學之洗禮，從事自然科學與西學之研究。見於科學之知，雖集窮年累月之功，而不一定有任何收穫；而庸庸家人，却常習焉而不察，行焉而不知。譬如工程師不知力學，則不能設計高樓大廈之藍圖；如欲精研力學，則非一朝一夕之功，又非人人所可從事者。但當工程師設計完成之後，一般不知力學之工匠，却能依樣葫蘆，建基打樁，塗泥砌磚，不久之後，而聳入雲霄之大廈成矣。由此視之，總理所指「知難」之知，實指科學之知而言，與陽明「良知」之知，判然不同，故蔣公謂，二人之「知」，實有本體上之區別也。

第三、經蔣公之研究，得知陽明「知行合一」與「致良知」之說，與總理「知難行易」之理，不惟不相反，而且相輔相成。蓋兩人之本意均在勉人力行也。因總理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所處之明季大致相同。國人在數千年來深受「知易行難」學說之毒，一般士大夫非學漢學解經，即學宋儒講性，流於空疏迂闊，無補實用，故陽明主「知行合一」之說，以挽救當時空言法行之流弊；而總理更進一步提出「知難行易」之學說，勉人力行實踐，從事革命，推翻滿清政府，以拯救中國淪於



次殖民地之地位。蔣公在「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講辭中曾謂：「陽明學說只在勉人「致良知」，所謂「致」就是「力行」，所以陽明學說的本旨，就是要人去實行。總理在「孫文學說」中，反復闡明「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的道理，歸納出來「行易」的結論，其最後目的就是只要我們照他所定的革命方略，計劃和他的命令去實行。」故知兩種學說，均旨在針砭時弊，以挽救國家民族垂危之命運，皆是救國之學說，救民之宏論。陽明生於明季，士大夫放言高論，不切實際，眼見國是日非，民生日困，大人先生只知坐而言，不知起而行，故倡「知行合一」、「致良知」之說以匡救之。總理目覩滿清政府腐敗，列強侵略日亟，割地賠款，不能壓強國之貪，徒使國勢日弱，民生凋敝而已。總理當時激於義憤，以滿腔熱血上萬言書，瀝陳救國之道，無奈清廷顛覆，置若罔聞。遂決心革命，立志救國，以爲不革命便不能救國，救國只有出之於「革命」一途。唯「革命」非放言闊論即可成功，必也起而力行，挺而走，喚醒民衆，群起響應，始可共襄義舉。乃倡「知難行易」之說，以勉人力行，共赴國難。由此視之，古今哲人所生之時代雖有先後，而其救國救民，匡正社會習俗，振奮民心士氣，勉人力實踐之本旨則如出一轍。

## 二、民生第一之教育方針

蔣公一生之訓詞、專著與演講中，討論教育之範圍甚廣，包括政治教育、經濟教育、軍事教育、普通教育等，其中關於前三者之詔告與訓示者尤多。本文以篇幅所限，將政治、經濟、及軍事教育部分從略，僅討論有關普通教育方面之理論。所謂普通教育之範圍，除涉及最重要之學校教育外，而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及倫理教育等，亦爲其中甚爲重要之內容。

蔣公之教育思想，以力行哲學爲其思想之基礎，自上文得悉，力行哲學實導源於總理之民生哲學，又爲民生哲學之發揚光大。蔣公在其專著「國父遺教概要」第五講：「社會建設與民生哲學之要義」中曾謂：「總理說：『民生爲歷史的中心。』又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我們無論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軍事那一方面之一切的努力，都應該以民生爲主要目標。」（註一一）由此觀之，蔣公之教育思想實導源於民生哲學，而力行哲學又爲民生哲學之闡揚推廣，故力行哲學實爲蔣公教育思想之基礎。

蔣公對於教育所肩負之建國使命，一向極爲重視，以教育、軍事與經濟之合一，實爲國家康樂富強之要件。在「中國之命運」中謂：

「國父分革命建國的程序，爲三個時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與憲政時期——而貫通於三個時期的基本工作，在於教育、軍事與經濟。這三個工作在本質上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可以說，三者並舉則國家富強，三者偏廢，則民族衰敗。不但是現代各國建國的基本原理如此，就是依照我們中國歷代的建國史實來說，亦無不如此。我們現在要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

，以求生存於世界，並要進而盡我們對於世界的責任。故必須先求教育、軍事與經濟的合一，才得完成國家整個的建設」。

蔣公復稱：

「建國的基本工作，在於教育、軍事與經濟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必須就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五個項目，製定同樣的方案，而使之實踐力行。」（註一二）

由上所引，得知 蔣公首先認定教育、軍事與經濟之合一，乃建設之必要途徑，欲求建國基本工作之完成，又必須製定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之方案，依據實施。而此五大建設又無一而不與教育息息相關。換言之，欲完成此五大建設，必先自教育着手。自心理建設而言，須恢復民族之自信心，發揚民族固有之創造力。蔣公認為 國父手著之心理建設——「孫文學說」，對症下藥，係心理建設最寶貴之指針。並指示心理建設之最大責任，尤在於我全國中小學校教師之身上。因中小學校教師為少年學生德行知識與體格之保傳，對學生之影響至大。

在倫理建設中，蔣公主張首在培養救國之道德。所謂救國道德，即恢復我國固有之倫理而使之擴充光大。其重要之項目，乃重禮尚義，明廉知恥。此等德性，即四維八德之所由表現。而四維八德又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實為我國教忠教孝之極則。故知倫理建設，必始於倫理與道德教育，而倫理道德教育之實施，又必將其注入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之中，方可期其有效。

以言社會建設，蔣公認為地方自治之訓練，與公共「樂」與「育」之設施，為社會建設重要之基本工作。地方自治健全，為民權，民生主義社會實現之基礎。自「育」而言，解決人民衣食住行之民生問題，充裕人民之物質生活，此為「富民」之任務；自「樂」而言，興辦各項社會福利事業，建立托兒所，保育院、俱樂部、公醫院，以充實人民之精神生活，及保障其身體健康，使人民進入安和樂利之民生主義社會。但欲求實現社會建設之計劃，則必先普遍提高人民之教育程度，增進人民之生產及謀生之能力，使其充分認識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始有保障，在安定中求進步，在進步中求發展，人民之物質生活始可逐漸提高。尤須使人民了解社會之進步，乃基於全體國民之互愛互助，與共同合作。在必要時應發揮人溺己溺，人饑己饑之精神，共同致力於社會福利事業之促進。

至於政治與經濟建設，亦必先自教育着手。國民對於政治制度與法令規章之遵守，自主、自動、自強、自立之精神的培養，五權憲法與全民政治之體認，青年報國救民之精神的陶冶，無一而不賴教育之力方能奏功。關於中國之經濟建設，蔣公認為當以 國父實業計劃之精義為張本。不但使中國之經濟達到自力更生之地步，且須加速全面工業化，鼓勵有志為工程師之青年，追求工業之技術與知識，以致力於工業之發展。故極力推進科學教育與工業教育為當務之急。

蔣公認為五項建設，自當同時並進，不可缺一，但其重點則不能不置於經濟。國父曾指示吾人「建設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之基礎為經濟。經濟不僅為各項建設之重點，而且為一切建設之先務。而教育之設施，亦應以「民生第一」為前提，為方針。蓋我國之病在「貧」與「弱」，欲治此貧與弱，必須全力發展自然科學，提高工業技術，改善經濟結構，開闢國際貿易，方能促進經濟之發展，以充裕國計民生。唯有如此，方可使國家轉「貧」為「富」，轉「弱」為「強」。教育必適時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之趨勢，以培養實用之人材。

### 三、三民主義之教育原理

蔣公為總理之忠實信徒，一生以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民為己志。在民國二十六年「救國教育」（註一三）之演講中，曾指出救國教育之根本要件，在建立共同之信仰，欲建立共同信仰，必先確立中心思想——三民主義。教育人員應對救國事業有堅定之信仰，而救國教育應以恢復民族自信力為實施起點，而以培養新的教育精神，產生新的教育力量為目標，達成救國教育之目的。在演講中勉勵教師自立自尊，以建立學生與民衆對教師之信仰，養成尊師重道之風尚。在此講辭中，蔣公對吾人之重要指示，認定三民主義之教育，即為救國之教育。

我國當前之教育宗旨，係於民國十八年四月正式公佈實施者，此次教育宗旨之擬訂，實基於以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原則，其內容為：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在此教育宗旨中，開始即指出係以三民主義為依據，旨在以教育為方法，而推行三民主義，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國，以實現世界大同之崇高理想。蔣公之教育思想，處處以三民主義為根據，在「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註一四）中，曾引述總理語云：「要中國不亡，而且能有次序的建設，惟有振興我們的教育，那纔是根本的辦法。」且指出，改革教育，必以實施三民主義之教育為本，因三民主義為革命救國之唯一主義。蔣公並說明所謂三民主義之教育，即是民族教育，民權教育，民生教育。由此視之，蔣公之教育理論，不但完全以三民主義為根據，且與我國當前之教育宗旨完全契合。

我國當代教育學者崔載陽氏，在研究三民主義教育時，曾指出三民主義之教育原理共有下列數端：（1）人本教育原理；（2）生存教育原理；（3）互助教育原理；（4）進步教育原理。（註一五）關於此等原理，在蔣公之教育思想中均可獲得印證。

首論人本教育原理，蔣公在「中國經濟學說」（註一六）中，指出民生主義之基本原則，其所採取之經濟政策，係以養

民爲本位。說明中國之經濟道理，非爲物而愛物，是爲民而愛物，即所謂「仁民而愛物」，亦即以民生爲本位。蔣公早在民國二十二年，「剿匪手本」中亦曾謂：「國以民爲本，故三民主義，亦即救國主義也。」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復稱：「民生主義的社會不是以競爭爲基礎，而是以合作爲基礎。各階級互相依賴，在互信互愛的情形之下共同生活，人人以其所付出之勞力爲比例來分沾其利益，如此，人民全體都有生活的機會，有完全的自由，並有充分的娛樂和幸福。」且在該補述中，論及養育問題，蔣公之仁心仁術，處處流露於字裏行間。論及兒童問題，疾病殘廢問題，鰥寡孤獨問題，老年問題，喪葬問題。不但注意正常兒童之養育問題，而且注意變態兒童及匪化兒童之教育與再教育問題；不但注意生理疾病及殘廢之養育問題，而且亦注意心理疾病及殘廢之養育問題；不但注重普通民衆之養育問題，而且亦注意鰥寡孤獨之問題，不但注意老年問題，而且亦注意其死後之喪葬問題，是所謂不僅惠及生黎，且澤及枯骨。非大仁大愛者，曷能及此！

人本教育原理，以「仁愛」爲出發點，以全民教育爲依歸。關於此點，蔣公實秉承總理民生哲學之精義，而更予以擴充宏揚之。載季陶先生在所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中，曾稱讚總理之人格曰：「先生的全人格，乃以仁愛爲其基本；一切表現，無不仁愛。有過人之智，而其智惟用於知仁；有過人之勇，而其勇惟用於行仁。可謂離却仁愛，絕無革命可言；民生爲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爲民生哲學之基礎，其他一切道德，皆不外由此演出，完成仁愛之用而已。」蔣公在其專著「大學之道」（上下篇）、「中庸要旨」及「政治的道理」等篇中，對孔子「仁民愛物」、及宋儒「民胞物與」之旨，均有精闢之闡發，而稱中國政治哲學，一切皆以「人」爲本。政府治民以「仁」，而人與人相處亦不可離「仁」。蔣公會指出實施青年教育必須遵循四大原則，其中第一條爲以「仁愛」代殘酷，以「利他」代「自私」，此即大仁大愛之表現，亦即「人本」教育之典範。

次論「生存教育原理」，總理之民生史觀，以人民爭生存爲社會進化之原動力，生存教育原理即以此爲本。蔣公在「中國經濟學說」中，對國父之此種理論，曾有精闢之發揮，茲摘錄如下：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派，主張以階級鬥爭的方法，打倒資本家階級，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個學說以階級私利爲本源，已經錯誤。國父指出這種錯誤，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

「所以國父說馬克斯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不是一個社會生理學家。」

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中，蔣公會謂：「吾人須知教育乃國家民族之精神與文化，亦即其永久生命根基之所寄託；故教育之優劣成敗，即爲國家民族興亡盛衰最大之關鍵。我國現正與倭寇作戰，教育之成敗，亦即是我國抗戰成敗最

大之關鍵。」由此視之，蔣公之教育思想中，亦特別強調「生存教育原理」，不只主張個人求生存之教育，且主張為國家求生存，民族求生存之教育；但在三民主義教育薰陶之下，吾人求生存之道，以「仁愛」為本，以「互助合作」為根源也，與馬克斯之「殘酷」、「鬥爭」之生存原理，不啻有天壤之別。

再論互助教育原理，亦以國父之互助論為根據。蔣公對此原理更多所發明。曾謂：「合群是人類的天性，箇人離開了人群，便沒有生存的方法，所以自有人類以來，箇人就是生於群，長於群，沒有一天可以絕對離群而孤立的，所以群的生命，為箇人的生命所寄託。群有發展，箇人才能得到發展。」（註一八）又曾謂，唯有團結一致，始能救亡國存，復興民族。（註一九）民國二十四年，蔣公在四川大學講「中國青年之責任」時，指出青年在社會中，應多為社會勞動服務，為人群謀福造利。在學校與團體中，亦應親愛精誠，團結一致。蔣公生前再三提倡救國教育，欲達成教育救國之目的，必使青年明白處今日之世，唯有互助合作，團結一致，始置國家民族於富強康樂之境，而世界大同之理想，始可實現。

最後論進步教育原理，國父在「知難行易」演講中曾謂：「古人進步最大的理由在能行，能實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進步。」又分人類之進化，為不知而行，行而後知，與知而後行三時期。至知而後行，實為求進步之階段。但此三時期之知，皆以行貫串之，離「行」不能致「知」，故一切進步，在於力行。在蔣公一生之著述中，闡明總理「知難行易」、陽明「知行合一」、與其本人力行哲學精義之處，所佔篇幅甚多。在講「科學的道理」中曾詔示吾人，大意謂，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不過數十年之光景，即能反弱為強，最主要之原因，是其留學生接受西方科學之精神與方法，從事研究發展，辦理一切事業，故國勢日強。我國惟有一本科學之精神與方法，始能推動進步，創造國家民族之新生命。（註二〇）在三民主義之教育中，民生教育重科學，科學教育重研究發展，唯有研究發展，始可不斷進步。故進步教育原理為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原理之一。在蔣公之教育理論中，其契合於此一原理之處甚多，不勝枚舉。

吾人對蔣公教育思想之研究時，除發現其有關教育言論與上述四種原理完全符合外，筆者發現尚有若干重要之原理原則，有待加以研述與說明者，茲再分述如後：

（一）實踐教育原理 此一理論以力行哲學為基礎，蔣公在「國父遺教概要」第四講：「心理建設之要義」中，概論國人多認為行難知易，於是對於一切事業均憚於為之；一知半解，沾沾自足，怠於求知，習於空談，養成「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習性。反觀外國人民，均能力行，故能進步。唯有一面求知，一面力行，尤須繼續行之，第一次失敗，第二次再來，以至三次四次無數次，甚至父而子，子而孫，兩代三代繼續努力行，直至成功為止。蔣公勉人實踐力行之論著及演講極多，迭見於「中國之命運」第六章，「反共抗俄基本論」第五章，「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革命哲學的重要」，「中國的立國精神」，「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行的道理」，及「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等篇內，均

極力闡明力行哲學之原理，勉人篤履實踐。

(二)創新教育原理 蔣公提倡新生活運動，指示全國知識分子肩負起教導國民之責任，使人人具備國民應有之知識與道德。以爲提高國民之知識與道德，必自國民衣食住行之基本生活着手，故非發展教育不可，教育國民應以昨死今生之精神，革除過去之野蠻生活，開始實踐合乎禮義廉恥之新生活運動。所謂新生活，即使全國國民生活於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之生活。(註二一)復指示推行新生活運動之要件：(1)「昨死今生」的覺悟。(2)「實是求是」的精神。(3)「以身作則」的教化。(4)「互助合作」的誠意。將新生活運動視爲復興民族之運動，改造社會之運動。(註二二)質言之，新生活運動，實是一全民之新教育運動，教育全體國民，革除舊日落伍腐化之生活，開創文明合理之生活，實內含創新之教育意義。

次言 蔣公之力行哲學，亦深寓創新之教育原理。其勉人篤行實踐，要在端正人心，改革社會因襲苟安之舊風氣。蔣公一生時刻倡導教育之革新。早在抗戰期間，即主張現代化之教育，應培養德、智、體、群四育，造成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之青年。師長等應勤加督導，使青年革新生活，相互觀摩，力求教育之進步。(註二三)復在五十七年二月十日提出「革新教育注意事項」訓詞，條陳臚列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之注意改革事項，頒行全國，而求全國教育之普遍創新。

(三)實用教育原理 主張「學以致用」，亦爲蔣公重要之教育原理。在民國二十四年時，蔣公即鑑於日寇之侵略野心日亟，及國內匪禍之猖獗，講「全國總動員的要義」時，因應時代需要，即主張實施軍國民教育，以教育爲經濟與武力相聯繫之總樞紐，故須以發展經濟增強武力爲教育之主要方針；以實施軍國民教育，始爲真正之救國教育。同年六月十七日，在成都四川省黨部發表「救國必須實施文武合一術德兼修的教育」，主張無論男女均有武藝，自衛衛國。二十六年七月五日，復在廬山暑期訓練團講「救國教育」，主張國人應負教育救國之責任，以教育之力量，實現主義，建設國家，完成教育人員所負之時代使命。蔣公並認爲吾人研究學問，務必注重實用。無論哲學、科學、藝術以及一切之知識技能，其最後目的，均旨在改進人類社會之實際生活。如此方爲真正有價值之學問，亦即「學以致用」之真義。(註二四)

(四)繼續教育原理 蔣公在民國二十八年講「行的道理(行的哲學)」時，謂自行之本義視之，行即人生。筆者認爲「行即人生」一語，予吾人以莫大之啓示，蓋整個之人生歷程，即教育之歷程，終吾人一生，無時無地而不接受教育。總統稱，人之生爲行而生，亦應爲生而行。行之目的，在增進人類生活，群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此亦即我國當前教育宗旨所揭示之教育目的。在本講辭之首，蔣公即指出「行」與「動」之不同，行有繼續不斷，恆久不輟之特性。故行有四大要件：(1)必須有起點。(2)必須有順序。(3)必須有目的。(4)必須是經常的，永久的。最後一條，即「行」之「繼續性」，亦即「繼續教育原理」之所本。教育爲陶冶之歷程，故必有起點，必有計劃，按部就班，依次實施。教育亦必有目的，目的爲教育實施過程中之價值指標，如同指示船隻航行時之燈塔，不致使教育在實施中逸出軌道。教育之歷程必是廣續不斷，永恆前進的，表示個人

在知識技能之培養，與道德品格之陶冶上，有一連串之成就與進步。

附註：

1 見 蔣總統：三民主義之體裁及其實行程序，載蔣總統集（第一冊，國防研究院印），第一一三九至一一四〇頁。  
2 同上，第一一四一頁。

3 見 蔣總統著：中國之命運，載同上，第一五七頁。

4 行的道理（行的哲學），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講，載同上，第一一〇八至一一一三頁。

5 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講，載同上，第五七八至五八二頁。

6 革命哲學的重要，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南京中央軍校講，載同上，第五八二至五八七頁。

7 中國的立國精神，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六日講，載同上，第五八七至五九三頁。

8 革命軍人哲學的提要，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講，載同上，第七八一至七八二頁。

9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十三日在陽明山莊講，載同上（第二冊），第一七一八至一七二二頁。

10 同上，第一七二〇頁。

11 蔣總統：國父遺教概要，載同上（第一冊），第四九頁。

12 蔣總統：中國之命運，載同上，第一四九頁。

13 蔣總統：救國教育，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五日在廬山暑期訓練團講，載同上，第九五五至九六一頁。

14 民國十六年一月在江西教育講習會講，載同上，第四八一至四八五頁。

15 參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民中學教師職前訓練班編：教育哲學，第一六九至一七八頁，民國五十八年。

16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日在重慶發表，載同上，第一七一至一八三頁。

17 蔣總統：中國青年所負的時代使命，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講，載同上（第二冊），第一四五七至一四六一頁。

18 蔣總統：中國之命運，載同上（第一冊），第一六一頁。

19 蔣總統：空軍救國三唯論，載同上，第七六二至七六五頁。

20 蔣總統：科學的道理，載同上，第八五一頁。

21 蔣總統：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講，載同上，第七三三至七三七頁。

22 蔣總統：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載同上，第九二四至九二七頁。

23 蔣總統：對陪都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指示，民國二十一年講，載同上（第二冊），第一四五一至一四五二頁。

24 蔣總統：爲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載同上（第一冊），第八五七至八六二頁。

## 叁、論教育之意義與目的

### 一、論教育之意義

#### (一)教育之一般意義：

我國古代論教育，常將兩字分別詮釋。以「教」而言，含有數義：(1)教有傳授與效法之意。如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又如漢書儒林傳：鄉里有教。顏註：教，效也，言可效道藝也。(2)教兼有知識傳授與品德培育之意。如(1)周禮師氏：以教國子弟。注：教之者，使識舊事也。(2)禮記學記：教也者，長善而教其失者也。(3)荀子修身：以善先人者，謂之教。故知「教」之一事，必含有下列諸要點：

(1)必有師法，從事傳道、授業、解惑之工作，此之謂「上所施」也。

(2)必有生徒子弟，以從事學習，此之謂「下所效」也。

(3)「教」之事必兼顧知識，技能之傳授，與道德品格之陶冶，而後者尤為重要。

(4)教者必有學養，加之品德方正，蓋唯有如此，方可為人師法也。

(5)教之事不限於師傳，此於「上所施」一語中見之。古之所謂「上」，殆指君主、官吏、父母、師長而言也。古代教之權責操在官府，東周時，王官失守，私人興學之風遂起，以是有諸子百家之學。然秦之時，仍以吏為師。是謂「作之君，作之師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三物者，乃古鄉學之教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由此視之，「教」之意義，傳道重於授業解惑，身教重於言教，以及「人師」之工作重於「經師」之工作也。

次論「育」，作名詞解，有幼童、稚子之意。如：(1)釋言：育、稚也。史記：教稚子。(2)書盤庚：無遺育。屈萬里注：育，穉，謂幼童也。育作動詞解，則有二義：(1)有生長、培育、撫育、及教養之意。如：1爾雅釋詁：育，長也。2詩生民：載生載育。馬注：育，長也。3易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注：育，養也。4易漸：婦孕不育。注：生也。5中庸：贊天地之化育。育，生也。(2)「教善」之意。如：說文解字：「育，養子便作善也。」段玉裁注：「育，不從子而從倒子者，正謂其不善者可使作善也。」

總之，「育」不僅有生長，撫養之意，且含有「教善」及道德培養之內蘊。由此視之，「教」與「育」二字義本通。二字連用，始見孟子盡心篇(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教育之對象為人，全人教育，不只重智能之傳授，且須重



道德之培養。

教育一詞，英文名詞爲“Education”，動詞爲“Educate”，前者源自拉丁文名詞“educatio”，後者源自拉丁文動詞“educare”，本義有「養育」、「提舉」之意。拉丁文中另有「動詞“educere”，與“educatio”有關，意義與“educare”相近而稍異。茲分述如後。

(一)“Educere”有“to lead out”之意，中文即「自……引出」也。英國南恩爵士(Sir Percy Nunn)主之，以教育即導引兒童及青年各種潛能之發展或實現也。

(二)“Educare”有“to train or mould according to Some Specification”之意，中文即「根據某種規範加以訓練或陶冶之」也。亞當爵士(Sir John Adams)倡之。(註一)

教育之工作實則包括以上兩事，一方面因人生而即有生理的及心理的各種潛能，教育應導引此等潛能而發展之及實現之；另方面人之初生，乃一純生物的自然人，當其進入社會，則逐漸接受傳統社會及文化中之各種規範，潛移默化，由私我(individual-Self)而變爲群我(Social-Self)，教育爲銜接私我與群我之間的橋樑，個人之接受傳統社會及文化之陶冶，乃是教育之功能。

由是觀之，教育乃智能之傳授，品德之培育，潛能之發展，與各種社會文化價值或規範陶冶之歷程也。

#### (三) 蔣公論教育之意義

(1)教育之範圍 蔣公論教育，以教育有廣義狹義之分，前者指教育爲整個人生之事；而後者則僅指學校教育而言。就廣義之教育而論，蔣公所指教育之範圍，幾與杜威(John Dewey)所謂「教育即生活」(education is life)之意義相同。曾詔示吾人曰：

『所謂「教育」並不是專指課堂上講授各門功課，或在操場上練習各種運動而已；無論是在學校裏，在家庭裏，在軍隊裏，在黨部裏，或在政府機關裏做事，無論是做教師做國家的公務員，或是當警察，人人要知道隨時隨地都負有教育的責任，應當盡心教導人家，同時我們也無時無地不是居於受教的地位，讓人家來教。並不是說我們做了教師就專去教學生，做了官長就專去教部下，或是教一般國民，自己什麼東西都了不得，不必再要人家來教，不願再受人家的教育，要知道我們就是活到七八十歲，在沒有死以前，依然時時刻刻要受教求學，即古人所謂「做到老學到老」。一方面我們無時無地不努力教人，一方面更無時無地不虛心受教。』(註二)

由上所引，得知 蔣公所論教育有下列各種涵義：第一、教育乃終生之事，並非專指學校教育而言；第二、施教工作乃衆人之事，並非學校教師專有之工作；第三、教育中含有「教學相長」之意，教者一方面教，一方面學，不但學之中有教，而教

之中亦有學也。

(2)教育之意義 蔣公論「教育」之意義時，並與我國古代學者之觀點完全相同。嘗謂：『生聚就是「育」（養育），教訓就是「教」。』（註三）在講「訓練的目的與訓練實施綱要」時，曾兼論「教育」曰：「教育的本義，是要既教且育，並要寓教於育，這是任何一種訓練所應該做到的一個要領，也就是訓練的要義所在。」在「教養衛」中又謂：『第一、我們要講「教」的基本要義，首先應當注意的東西就是「禮義廉恥」。我們要達到「教」的目的，要真能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絕不只在講堂裏一點書本子上的知識，使受教的人知道看書、寫字，懂得算學、物理、化學、政治、經濟諸般科學；也不只在操場練一點普通的技術，如瞄準、射擊、騎馬、跳跑等項；因為這些東西不過是普通的學術技能，單是教會這些科目，決不足以建設國家、復興民族，這種教育，不能算是真正的完善的教育。真正完善的教育，一定要除這些科目以外，並且在教授一切科目之先，能將受教者教成一個「人」！懂得做人的道理「禮義廉恥」！』（註四）蔣公論「教」之要義，以為教人智能固屬重要，而教人明禮義，知廉恥尤為重要。蓋人之別於禽獸者即在此。人生在世，徒有豐富之學識，精良之技能，設無高尚之品德，完善之人格，一旦面臨義利之辨，生死榮辱之關頭，往往失足喪節，為害國家民族。蔣公以為唯有教人明白做人之道，以禮義為先，廉恥為重，始可為真正完善之教育。如此之教育始為人格教育，使受教之人，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能擔當建設國家復興民族之重任！始知 蔣公論「教」之意義，與古人完全吻合，不僅注重知識技能之傳授，而尤注重道德人格之培養。

其次論「育」，亦見於「教養衛」之講辭中。蔣公以「育」與「養」意通，以「養」即「養育」。「養」即 總理所謂之「衣、食、住、行」四項基本生活。蔣公以為人人雖能衣食住行，但不知衣食住行之要領。衣食住行必有一定之規律，一定之樣式，必須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現代國人，對於此基本生活之規律不知講求，髒亂奢侈，完全違反生活之常則。此種髒亂奢侈之生活，反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等要則之舉動，直可謂之亡國行為！言之令人深痛不置！由此可見，蔣公之論「育」，亦不偏於「教育」，且亦兼及「德育」，亦與我國古人論「育」之要旨完全一致。

唯須注意者，蔣公論「教育」，雖常「教」與「育」分言，但仍視「教育」為一件事，而非兩件事，不可分離視之。嘗謂：『我們的全部生活，一定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我們要真能實踐禮義廉恥，就要從衣食住行四項基本的實際生活中做起來！惟有依據禮義廉恥，實行整潔簡樸的生活，才是真的生活，革命者的生活，亦惟有自整潔簡樸的生活中刻苦力行的人，才能真正實踐禮義廉恥，表現禮義廉恥！「教」和「育」所以不能分離之處，就是如此。』（註五）蔣公在「為學之目的與教育之要義」演講中，對於「教育」之要義更有明白而清晰之詮釋。茲引述如後：

『所謂教育原係包括「教」與「育」兩件事而言，「教」是著重一切學術技能做人的道理之傳授與實習而言，「育」是著

重體魄精神道德和生活的保育與訓練而言，「教」與「育」雖然是兩件事，但是彼此實有密切連帶的關係，必須並重兼顧，同時實施，然後才算是完全的教育。」（註六）

總之，我國古人論「教育」之意義較西人為精到；而蔣公論教育深得古人之心，較古人之詮釋尤為完善。今日若干人辦理學校教育，專重知識技能之傳授，而忽視道德教育之實施，只知授業解惑，而不知傳道，實昧於「教育」之要意，而將教育帶至偏頗錯誤之途徑，觀蔣公所論「教育」之要義，應知深加反省與檢討。

## 二、論教育之目的

### （一）論教育之外在目的與內在目的

近代西方學者論教育之目的，常從教育之外在目的與內在目的兩方面着眼。傳統教育學者多注重教育之外在目的，事前擬定崇高、遙遠或實用之理想，以各種手段，而設法達成此種理想。如古代希臘之審美的教育目的，羅馬時代之實用的教育目的，中世紀時之宗教的教育目的，斯賓塞（H. Spencer）之生活準備的教育目的，凱欣斯泰納（Kerchensteiner）之公民訓練的教育目的等均是。此外又如國家主義者以培養軍國民為其教育之目的；實利主義者以注重實用知識之傳授為其教育之目的；持社會效率說者以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為社會服務；自然主義者則以發展兒童自然之本性為教育之目的，衆說紛紜，不一而足。凡此種種皆為教育外在目的之代表。

近人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及英國教育家皮德思（R. S. Peters）等人反對教育有外在之目的，而持教育之內在目的說。其中杜威以為教育無終極之目的，教育歷程即其本身之目的。嘗謂：「（1）教育歷程除其本身之外，別無目的，彼即其自己之目的。（2）教育歷程乃繼續改組、改造、改變之歷程。」（註七）並批評此傳統之教育目的，及成人或社會預懸之鵠的，由外面強行加入活動歷程之內，此外鑲之目的，固定而呆板。以教育不應有永恆的及遙遠的目的，只有暫時的及直接的目的。英國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之教授皮德思亦以「教育不可能有外在之目的，其價值乃自教育之內在原則與標準得來者。」此等人士均以為教育之目的及價值皆內在教育的本身，不必在教育本身之外再尋求另外之目的。

持內在教育目的說者，以教育之外在目的，往往基於父母、教師、國家、社會之需要而提出者，恐其剝奪兒童、青年當前之興趣及需要。不幸而有野心之政客，常以教育為政治之奴隸，以個人之私利作為全國教育之目的，導引教育誤入歧途，使國家、民族陷於萬劫不復之惡運，如德國之希特勒，意大利之墨索里尼等是。此亦為反對外在目的說者常顧慮之事，成為良好理由或藉口之一。

事實上，教育之外在目的與內在目的應是相輔相成，而不應相互衝突。蓋教育之內在目的，係似教育之內在價值為依據，

在教育之實施上，一切以合乎教育之標準為原則，自無使教育逸出正軌之弊。但古往今來，世界各國之推行教育，均有外在目的之擬訂，此不待贅言者。有人甚至稱，即使主內在目的之杜威，在教育之理論上，亦設有外在之目的，主張以教育之力量促進民主主義社會之實現，即其教育之外在目的。論者以為以內在目的為實施教育之準繩，指導外在目的之達成，似更易發揮教育之效能，切合教育實施上之實際情況。如此，傳統之外在教育目的之弊可以避免，亦不必顧慮教育為少數野心政客所操縱，蓋在民主政治體制之社會中，教育不致成為政治之工具。

## (二) 蔣公之教育目的論

1 論教育目的之重要 由上文中視之，教育之外在目的有其重要性，實不應缺少。蓋教育之有目的，方可依據之以釐訂教育方針及實施計畫，編製各級學校之課程標準及法令規章，然後根據施行，方不致在教育之實施過程中，搖擺不定，時東時西，產生錯誤。既可節省時間，不使其有舉棋不定，多走彎路之弊；又可節省金錢，減少無謂之浪費。故教育之有目的，如同黑夜航海之有燈塔；國家教育行政之主管，如同船上之掌舵者，把握方向，可直達目標。

蔣公在「革命的教育」演講中，曾剴切說明教育目的之重要性，給吾人以莫大之啓示。在此演講中曾謂：

「首先要各位注意的，就是我們教育最要的是要有目的。各位從事教育，首先要問我們教育要教些什麼？受教的人所必須學得的是什麼？我們要教出怎麼一種學生？我們教出來的學生要使他們成為怎樣一種人？能擔任怎樣一種事業？這是我們教育家在辦教育以前人人要確定的最緊要的根本方針。如果事先沒有一個確定的方針，我們教人就沒有目的，教出來的學生究竟作怎樣一種人，做怎樣一種事，都沒有目標，這就是無目的的教育，是害人害國的教育！我們中國近幾十年來倡行所謂「新的教育」，在表面上似乎是理論方法，應有盡有，實際上這種「新教育」只是盲從、粉飾、凌亂、空泛，無計劃無目的的教育。教出來的一般學生，大部份都不知道怎樣做人，也沒有立志要做怎樣一種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所以有許多學生什麼事情不能作，生在世界上，於社會於國家於他個人，都毫無益處，其結果，使我們國家民族到今天要受敵人無休止的侵略，蒙受現在這樣奇重的恥辱！最近這二十七年來的教育，幾乎多是糊塗的教育，其影響所及，不僅足以亡國，而且將致滅種：這種無目的無方針的教育，簡直就是亡國的教育！是滅種的教育！我們現在要挽救國家，復興民族，首先就是要打破過去亡國滅種的教育，來實行抗戰建國的教育！我們的教育，一定要能達到抗戰建國的目的。」

此一演講，係蔣公於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出席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時所講，當時我國適值抗戰開始不久，基本國策為完成抗戰建國之使命，故教育亦應密切配合國策，因應時代及社會之需要，教育青年子弟，結合全國民衆，鼓勵愛國觀念及民族意識，激勵同仇敵愾之民心士氣，同策同勵，以完成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之偉大任務。在此演講中，蔣公對「新教育」之指責與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對一味倡導教育只應有內在目的，而不應有外在目的之教育家，給予當頭棒喝。實則教育

爲國家事業，爲民族事業，爲百年樹人之工作，自應適合時代、社會、及國家之需要，完成建國保國，養民教民之偉大使命。

早在抗戰之前，蔣公目觀列強之環伺，日寇侵華野心日熾，即多次倡導「救國教育」。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日在峨嵋軍訓團講「全國總動員的要義」，即提出「軍國民教育」與「行的教育」，以現代國家之生命力，係由教育、經濟、武力三個要素所構成。認爲當時國家共同之總目標，即在推動政治，建設國防，培養充實國家之生命力，以完成「全國總動員」之準備。並以教育爲一切事業之根本；而與經濟、武力之連環關係，尤爲密切，必須互相聯絡，彼此貫通。教育爲經濟與武力相聯繫之總樞紐，故更須以發展經濟增加武力爲教育之主要方針。實行軍國民之教育，始爲真正之救國教育。

由此視之，教育之目的常因應時代及國家社會之實際需要，時有變更，唯不能與基本國策及全國教育宗旨相抵觸。蔣公在戰前倡導之軍國民教育，文武合一教育抗戰時所提倡之抗戰建國教育，均爲救國教育。思以教育之力量，結合政治、經濟、及軍事，以達成強身強種，富國裕民，以及建國保民之任務。處處自國家民族之公益着眼，在在以救國救民爲前提；故雖爲外在之教育目的，而無戰前德、日軍國主義教育之流弊，教育反而成爲達成救國救民之時代使命的要素之一。

2 論教育目的 蔣公講教育目的，數見於其演講中。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在「教養衛」演講中，以「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爲教育之目的。而謂唯有教育，始能復興國家民族。以教育之力量，推行禮義廉恥，使國民均能明理，尚義，重廉，知恥，欲求復興民族，救國救民，並非難事。

蔣公在「現代國家的生命力」演講中，曾謂：「教育的種類雖然很多，然而却有一個共同的根基，也就是一切教育共同的要旨所在。這個共同的要旨是什麼呢？就是要使受教的人能够竭力增進充分發揮其「智識」、「道德」、「體魄」和「群性」，即所謂「智」、「德」、「體」、「群」四育。」（註八）在此講詞中，蔣公並提出今後一切教育之中心目標，即養成「軍國民」之風尚。以救國之教育，即軍國民之教育。唯有實施軍國民教育，始可充實並增強國家之生命力。

蔣公在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講「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時，指示吾人須認定教育上一定之目的，要以革命救國之三民主義爲我國教育之最高基準，實施抗戰建國綱領，創造現代國家之新生命。

總之，蔣公主張我國教育應以三民主義爲最高之基準，以達成「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爲教育之目的。推行禮義廉恥，提倡智、德、禮、群四育，實施軍國民教育爲手段，使此項教育目的能卒底於成。在此對於蔣公所提之教育目的，再稍加申論，俾供參考。

第一、蔣公所提教育目的，因應時代及國家民族之需要。當時我國南北統一不久，元氣未復，地方因深受軍閥割據之習染，尙未能一致擁護中央，而日寇包藏禍心，侵華行動日日熾烈，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邊緣。蔣公英明睿智，洞燭機先，爲挽救國家、民族於危亡，遂高唱實施「軍國民教育」、「革命教育」，及「救國教育」，唯有尙武強種，使教育與經濟

、軍事、政治結合爲一，使教育肩負起「建設國家，復興民族」之使命，方能禦強敵，捍外侮，以拯救國家民族之危運。

第二、蔣公所提之「軍國民教育」，與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之軍國主義教育完全不同，不應有所誤解。蓋以兩國之思想背景迥異，德國經多年主「意」主義哲學家等之薰陶，養成其「民族本位主義」與「國家本位主義」，加以受尼采「超人論」(Superman)之推波助瀾，遂自認日耳曼民族爲世界上最優良之民族，自應統制其他劣等民族，而侵略野心日日滋長，終於釀成第一與第二兩次世界大戰。我國五千年之傳統文化，以道德爲其骨幹，固有之道德與政治，軍事相結合，構成王道之精神，向以濟弱扶傾，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爲對外之政策。此種精神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長繼不衰。總理及蔣公亦深受此王道精神之陶冶，一貫相承，使此種精神更易發皇滋長。國父生前對此一貫之大道曾多所提及，在遺囑中更特別提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蔣公亦謂，總理創造三民主義，以民生哲學爲基礎，以人類全體幸福爲依歸，而終極理想爲「世界大同」。又謂，總理三民主義以我國固有之「天下爲公」的倫理思想與政治思想爲基礎。(註九)在「現代國家的生命力」中，蔣公會稱，現在之中國適合提倡「軍國民教育」，因我國崇尚傳統道德，向來不侵略弱小民族。茲再摘錄此演講之一段，以資佐證：

『因爲我們中國民族，向來是崇尚「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德，以王道爲本位，從來只以道德文化來感化外國人，很少用武力來侵略壓迫人家的。所以中國的軍國民教育成功，國家強盛之後，不但絕對不會有「窮兵黷武」的惡果，而且一定大有造於世界和平與全人類的幸福！這就是根本上中國特別適宜於「軍國民教育」的地方。』(註一〇)

蔣公對我國教育用心之苦，積慮之遠，其愛國憂民，爲國爲民之偉大胸襟，於此可見一斑。爲中華民族之前途計，爲當前國家之處境計，不得不提倡「軍國民教育」，使教育完成救國救民之目的。爲免流於外國軍國主義教育之弊，保持我國優良之王道精神，一方面提倡六藝教育，提倡四維八德之教育，以培養「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之青年，使其於具備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之外，兼有「天下爲公」及「世界大同」之精神。

第三、蔣公所倡導之教育目的，與我國現行之教育宗旨完全吻合。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五日講「救國教育」時稱，救國教育應以恢復民族自信力爲實施起點，而以培養新的教育精神，產生新的教育力量爲目標；達成救國建國的目的。我國現行教育宗旨，爲民國十八年公佈實施者，實以三民主義爲其根據之最高原則。在此宗旨中，包括三種層次不同之教育目的。如：「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教育之直接目的。發展國民生計所以治貧；延續民族生命必須去弱，充實人民生活所以治愚；扶植社會生存所以去私。此爲在教育上首先要達成之目的。第二、「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爲教育宗旨中所涵攝之中間目的。第三、以「促進世界大同」爲終極之目的。有層次，有程序，依次實施，必可完成。至於「延續民族生命」與「民族獨立」二者，屬民族主義教育之目的；「扶植社會生存」與「民權普遍」二者，

屬民權主義教育之目的；「充實人民生活」，「發展國民生計」與「民生發展」屬民生主義之教育目的。此三種教育目的之實現，方為「促進世界大同」之基礎。故三民主義之教育，即救國之教育，唯有實施三民主義教育，始能建設國家，復興民族。唯有根據三民主義之基準，建設富強康樂之中國，世界始有真正之和平。關於此點，在蔣公所論之教育目的中均顯露無遺。

至於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性，蔣公早在民國十六年一月，於「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演講中即已指明，從該講辭之內容視之，本文似為民國十八年「教育宗旨」之張本。主張三民主義為革命救國之唯一主義，改革教育，要以實施三民主義之教育為本。以總理三民主義之最終目的，即在「世界大同」之實現。主張打破一切國際之侵略壓迫，使世界各國一律和平相處，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欲達成此「世界大同」之境界，首先推行民族主義，不但國內民族獲得自由平等，而且使中國在國際上取得尊嚴與獨立，始可講「世界大同」。而最後認為三民主義教育之普及，方為國民革命成功之保障。（註一一）由此而奠定三民主義教育之發展方向。

綜合上述，可知蔣公有關教育目的之理論，有其思想及哲學之基礎。但有關此項理論之綜合，則見於「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註一二）中。在該文第二章，論教育之使命時，則以教育負有促進社會進步與民族復興之責任。蔣公在此提出「民生主義教育」之主張，而謂：

「民生主義的教育就是要教導一般青年使其適應人民生活的要求。換句話說，民生主義教育就是有計劃的教導一般青少年，從民主的生活中，培養自己的人格，發展自己的才能，以家庭的子弟，和國家的公民的地位，從事生產事業，努力於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的復興。」

蔣公認為欲使國民人人做現代之公民，復興民族，建設獨立自由之國家，教育則應負起充實學生生活內容之任務。至於生活之內涵，則有如下述：

- (一)生理與心理的健康；
  - (二)倫理與道德的生活——以合作互助為根本的個人修養，在家庭中與社會中和諧共處；
  - (三)家庭生活——家庭職務，灑掃應對進退的禮節；
  - (四)職業生活——生產技能與服務精神；
  - (五)公民生活——地方的、國家的與國際的常識與民主習慣。
  - (六)表達意義與進修學術之能力——語言文字之使用；
  - (七)利用閒暇的方法——保健、審美，使生活成為快樂的生活。
- 蔣公在此稱，學校教育之目的，即在課程上及課外活動中，教導一般青少年，使其得到上列各項知識與能力。案「民生主

(144)

義育樂兩篇補述」發表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此爲 蔣公論教育目的之較晚的文獻。但與以前所發表有關教育目的之理論，均密切相關，一脈相承，且較以前數次尤爲完備。學校教育之目的，雖旨在使青年獲得以上各種知識與能力，然教育之主要及終極目的，仍重在改進社會，復興民族，及達成世界之大同。

附 註：

1. ①From Authority, Responsibility, and Education, by R.S. Peter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New York, Paul S. Erikson Inc., 1959, P.89—65。
- ②See, Steven M.Cah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P.379,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70。
2. 蔣總統：教養篇，民國二十三年講，載 蔣總統集（第一冊）第七三〇頁。
3. 同上。
4. 同上，第七三二頁。
5. 同上，第七三二頁。
6. 蔣總統：爲學之目的與教育之要義，民國二十四年在成都四川大學講。
7.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The Macmillan Co., P.59, 1916。
8. 參見 蔣總統集（上冊），第九〇八頁。
9. 參見 蔣總統：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七日講。
10. 見 蔣總統：「現代國家的生命力」，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八日出席峨嵋軍訓團 總理紀念週講。
11. 見 蔣總統：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民國十六年一月在江西教育講習會講。
12. 蔣總統：「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爲 蔣公專著，係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發表。

## 肆、重要之教育訓示與措施

蔣公一生，在軍事教育及政治教育方面，均有卓越之成就。民國十三年，創辦陸軍軍官學校，建立黨軍，奠定軍事教育之良好基礎。先後完成東征、北伐，統一全國之偉大革命任務。民國二十二年，創辦廬山訓練團，實施政治、軍事合一之教育，先後完成剿匪及八年抗戰之安內攘外之使命。反觀 蔣公在教育方面亦有許多重要之指示與措施，均曾產生其劃時代之功效與任務。茲縷述如後：



## 一、對現行教育宗旨之影響

我國現行教育宗旨，係於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經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實施，以迄於今。其全部內容如左：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蓋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中央黨部恢復，決定召開四中全會。翌年，中政會決議任 蔣公爲北伐全軍總司令。二月，二屆四中全會開會， 蔣公提黨務政治徹底更始案。四中全會推 蔣公爲軍事委員會主席。在此次會議中，共同決議教育應基於以三民主義爲建國之最高原則，且爲教育政策實施之根據。而稱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建國，應以三民主義施教，從前頒布之教育宗旨自不適用。今特仰遵 總理遺教，根據教育原理，訂定中華民國教育宗旨，遂通過「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其內容如下：

恢復民族精神，發揚固有文化，提高國民道德，鍛鍊國民體格，普及科學知識，培養藝術興趣，以實現民族主義；灌輸政治知識，養成運用四權之能力，闡明自由界限，養成服從法律之習慣，宣傳平等精神，增進服務社會之道德，訓練組織能力，增進團體協作的精神，以實現民權主義；

養成勞動習慣，增高生產技能，推廣科學之應用，提倡經濟利益之調和，以實現民生主義；

提倡國際正義，涵養人類同情，期由民族自決，進於世界大同。（註一）

此案在民國十八年三月，經中國國民黨第二屆四中全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後，國民政府於同年四月二十六日明令公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故知現行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實以上項「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爲根據，而加以若干修訂，然後公布實施者。唯其基本精神，仍與前者完全相同。

現行教育宗旨，有若干顯著之特點，茲分列如後：

（一）基於建國理想 三民主義爲建國之最高準繩，在中華民國之教育宗旨中，開始即指明「根據三民主義」。一切教育事業，均應以配合國策爲原則。

（二）根據民生哲學 三民主義以民生哲學爲基礎，總理會謂：「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在教育宗旨中規定：「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

（三）建立理想社會 實施民族主義之教育，以恢復我國固有之道德與智能，以達成「民族獨立」之目的；實施民權主義之教育，訓練人民行使四權，建立廉能政府，實施五權憲法，以樹立權能制衡之政治體制，達成「民權普遍」之目的；實施民生主義

之教育，振興實業，發展交通，從事建設，以充裕民生，建設富庶康樂之社會，以達成「民生發展」之目的。

（例）實現大同世界 大同世界之理想，自孔子提出之後，國父亦極力提倡之，而以實現三民主義之社會，為達成「世界大同」之階梯。在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中，以「促進世界大同」為教育之終極目的。（註二）

根據以上之分析，中華民國教育宗旨，與二屆四中全會第三次全國代表會所決議通過之「確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案」之內容完全一致，僅稍加精簡而已。唯依照筆者之判斷，無論「確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案」之內容，或「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之內容，似均深受 蔣公教育思想之影響頗大。蓋 蔣公早在民國十六年一月，於江西教育講習會中，發表「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演講，前已略述之矣。在本文中，蔣公主張，改革教育，首須以實現三民主義之教育為本。所謂三民主義教育，即民族教育，民權教育，民生教育是。民族主義則由民族革命，排除侵略，以救國內外民族之平等；民權主義在打倒軍閥，伸張民權；民生主義則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解決國民生活問題，然後得飽食暖衣，安居樂業。而最後以三民主義教育之普及，為國民革命成功之保障。在此演講中，蔣公以實行民族主義，為實現「世界大同」之途徑，曾謂：

『我們知道 總理三民主義之最終目的，即在「世界大同」之實現，就是打破一切國際的侵略壓迫，使世界各國一律和平相處，各個民族一律平等。因為要達成這個「世界大同」的境界，第一步便當勵行民族主義，使中國民族得到自由了，中國境內的民族都得平等了，中國在國際上取得尊嚴和獨立，我們纔可講到「世界大同」。』（註三）

由上所引，前後三種文獻相互對照，其中要節均一一吻合。蔣公發表此次演講後，逾二年，中國國民黨即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而與會諸公，對 蔣公本文之內容定早有所研讀，故知中華民國之教育宗旨，必以「確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案」為根據；而後者似以 蔣公本文之內容為根據。若四中全會與會諸公，對 蔣公此文根本毫無所聞（事實上絕不可能），蔣公此文之內容及主張，與「確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案」之決議完全相符，則更足證 蔣公為天生之偉大教育家。

## 二、確定青年領導方針

蔣公一向極為重視青年教育，民國十八年七月，在北平發表「青年地位及其前途」演講時，即認青年為國家之主人，民族之生命，革命之後備。國家與民族一切艱難鉅大之責任，均付託在青年同志雙肩之上。因而勉勵青年刻苦求學，始為救國家、救民族、救人民以及救自己之唯一方法。革命事業，一面破壞，一面建設，而建設事業，需要各種高深之專門知識，青年須努力研求，以備國用。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七日，在南昌對各中學校長學生訓話，以「立志為學與服務」為題，勉勵青年立濟世救人之大志，以效法歐陽修、文天祥、陸象山、王安石等人，以改造社會，建設國家及復興民族，立志求學最高原則在「興滅國，繼絕世，為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一方面須自治自強自立，努力學業；一方面須助人教人，努力爲社會服務。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在中央政治學校講「爲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指示學問必須重實用，方爲真學問。爲學辦事與成德立業，必須發揮精神，運用科學方法，並指出大學爲中國正統哲學之寶典，爲人人必修之學問。吾人應以身作則，教導國民，以建設現代之新中國。

同年七月八日，在成都大學講「中國青年之責任」，指出青年爲國家未來之主人翁，應以救國救民爲唯一職志，負起復興民族繼往開來之責任。論及青年之地位與責任時稱：(1)在宇宙中，應宰制宇宙，征服自然，創造文化；(2)在國家中，應自覺自強，建立獨立自由之新國家；(3)在社會中，應爲社會勞動服務，爲人群謀利造福；(4)在家庭中，應發揮孝友睦婣任卹之美德，與從事家庭勞動服務。(5)在學校與團體中，應(1)親愛精誠，團結一致。(2)服從領袖。(3)嚴守規律。(4)養成義勇決斷，冒險進取之精神。並應徹底了解人生之意義與目的即是：「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三十八年八月四日發表「現代青年成功立業之道」，指示青年成功立業之三條原則：(一)要有正確的目的。(二)要有高尚的思想。(三)要有純潔之人格。又謂青年思欲成功立業，須注意下列之要點：(一)定計畫。(二)秉毅力。(三)重實行。

四十年八月二十六日，蔣公來台復行視事不久，出席本黨夏令講習會結業典禮，筆者曾忝爲其中學員之一。時蔣公以「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爲題，發表訓話。大意爲青年爲時代之基礎，時代之重心，應接受時代之考驗；並把握時機，以創造時代。稱反共抗俄之戰爭，不僅爲民族戰爭，亦即社會文化之全面戰爭。指出四維八德爲反共抗俄鬥爭中之主要武器。在此篇演講中，最重要者係蔣公正式指示領導青年之方針及要點：

(一)木質上：以培植對摧殘，以成全對利用，以仁愛對暴虐。

(二)基礎上：以誠實對欺騙，以教導對脅迫，以理性對強制。

(三)方向上：以自信對自卑，以仁愛對仇恨，以合群對鬥爭，以建設對破壞，領導青年走向救國救民之方向。

此外蔣公歷年對全國青年學子所發表之演講及訓示，可謂不勝枚舉，每年青年節發表告全國青年書，無不勉以努力學業，敦品勵行，恢宏胸襟，及變化氣質。告以救國救民爲己志，以承先啓後，繼後開來爲目的，參加偉大之革命行列，以求貢獻於國家、社會、及人群。

由此視之，蔣公實爲青年之導師，其所提領導青年之方針，乃憑其畢生之革命經驗，剿匪戡亂之心得，針對共匪殘殺、迫害、利用、驅使青年之弱點，團結全國青年，予以致命之打擊。多年來蔣公領導青年完成多次偉大之革命任務。第一次領導東征北伐，打倒軍閥，完成全國統一，奠定八年抗戰必勝之基礎；第二次在抗戰期間，三民主義青年團，深入學校，對團結

青年，鞏固領導中心，曾發揮不可磨滅之功效。在抗戰進入最艱苦之階段，領袖以「十萬青年十萬軍」為口號，號召全國青年請纓從軍，參加抗戰行列。全國青年紛紛響應，以實際行動，參與抗戰殺敵之工作，終於贏得輝煌之勝利。蔣公在民國三十年七月二日出席三民主義青年團全國幹部工作會議，講明「青年團工作根本要旨」，曾提出青年團之工作方法：（甲）團體方面：應重視多方面的聯繫，以收和衷共濟之效。（乙）個人方面：應本「中和」之道，注重精神的感化。其關心及愛護青年之心，昭然若揭。而此一訓示，誠為全國青年參軍運動成功之基石。

三十八年，大陸局勢逆轉，政府播遷來台，民心士氣低沈，情勢危急。蔣公應全國軍民之請，復行視事，使台澎金馬局勢立刻轉危為安，立趨穩定。復鑑於青年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遂指示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結海內外青年，以從事反共大業。該團於四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蔣公頒發訓詞。指示青年為時代之先鋒，革命之動力。青年反共救國團之成立，是全國青年第三次大結合之開始。希望青年親愛精誠，團結一致，忠勇奮發，以完成對國家、對民族及對時代反共抗俄，救國救民之使命。多年來該團對青年之領導，發揮過輝煌之成就，無論在自強活動方面，指導研究方面，國內建設方面，宣傳文化方面，軍中服役方面，全國青年均有卓越之表現，奠定反攻復國之鞏固基礎。

### 三、推動全民及社會教育

（一）新生活運動：蔣公在教育止之另一偉大之成就，為推行全民教育或社會教育。在此方面有兩大重要之措施：一為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發起之「新生活運動」；二為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六日所提出之「國民精神建設」。此兩大指示，在本質上密切相關，均為完成全國人民精神武裝之運動。

蔣公以「新生活運動」即是一種社會教育，新生活運動之普遍推行，對於復興工作有極大之貢獻。（註四）新生活運動亦可謂是一種「道德重整運動」，因蔣公特別強調國民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中，實踐禮義廉恥等道德規範。在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於行營擴大總理紀念週中，講「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喚起全體知識份子負起教導國民之責任，使國民具備國民知識與國民道德。提高國民知識道德，須從改善國民基本生活——衣食住行着手，故非發展教育不可。今後全國國民應開始實踐合乎禮義廉恥之新生活。新生活運動，要使全國國民生活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在實踐新生活中，國民應以昨死今生之精神，革除過去之野蠻生活。

實踐新生活，除重視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之生活外，並教導國民注重禮樂與守時。同年三月五日蔣公講「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時稱，做人須知禮，行禮須中節，不中節則不成禮。樂之節奏與禮之節度，就其意義與作用而言，實不可分。實踐新生活運動之人，須同時注重禮樂。提倡新生活運動，要使國民人人明瞭時間之可貴，養成遵守時間之良好習慣。

同年四月九日，蔣公復在南昌行營講「禮義廉恥的精義」，在文中不但對以上四種德目之意義，析理透徹，且指「信仁智勇」與「禮義廉恥」完全相通，以「禮義廉恥」為民族道德之體，「信仁智勇」為民族道德之用，實踐禮義廉恥之人，必能發揮信仁智勇以達於極致。最後指示提倡新生活運動時之所以實踐禮義廉恥，乃針對一切亡國末流之惡德，而加以一番積極之針砭，以之轉移風氣，恢復民族道德，以完成國家之復興。故曰：「要救中國目前反覆虛偽浮夸凌亂的風氣，惟有齊之於禮，使民能崇信；要救中國目前澆薄殘忍冷酷自私的風氣，惟有示之於義，使民能興仁；要救中國目前貪婪放浪義利不分的惡習，惟有砥之以廉，使民能有辨別真正是非的智慧；要救中國目前怯懦苟且墮落消沈的惡習，惟有勵之以恥，使民能有感激效命犧牲奮鬥的勇氣。」由此視之，禮義廉恥實為新生活運動之準則。

此一運動之主旨、認識、目的、內容、方法等，悉備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公布之「新生活運動綱要」之中。就主旨而言，新生活運動乃全國國民之生活革命，以「禮義廉恥」為基準。吾人對新生活應有之認識，首須注意生活為「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之總表現，為人生一切活動之總稱，補偏救弊，一變舊生活之趨向，謂之「新」生活。新生活運動之目的，在以勁疾之風，掃除社會惡習，以黨和之風，培養社會生機與正氣。至於新生活運動之內容，是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使人人能養成規矩矩之態度，正當當之行爲，能有清清白白之辨別，及切實實之覺悟。而最後以期達成下列之成效：一、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爲，求國民生活之藝術化；二、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爭盜竊乞之行爲，求國民生活之生產化；三、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亂邪昏懦之行爲，求國民生活之軍事化。

(二)國民精神建設：關於蔣公提示之「國民精神建設」，實亦為一全民教育或社會教育運動。此一運動遠則秉承國父「心理建設」之要旨，近則配合「新生活運動」之推行，以期在精神上武裝全國國民，以完成復興民族國家之任務。

蔣公講「國民精神建設之要旨」（註五）時，指出過去教育，只知灌輸呆板之知識與技能，忽視陶鎔品性，修養人格之精神教育。故徒有智能，而不能努力於正當之工作，報效國家民族，反而以學問技能作為濟奸作惡之工具，以遂其自利之企圖，因此使國家社會敗壞至如此之地步。吾人懲前毖後，今後欲起衰振敝，救亡復興，必使一切教育均注重精神之訓練，道德之修養，與健全人格之完成，始可達成救國救民之革命事業。

在此訓示中，並指出黨員守則十二條均為做人之道，實亦為全國國民之守則，如全國國民人人能實踐，則國家之富強，民族之復興，可立而致。並稱新生活運動教民「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在提高國民精神道德之水準，而為根本之救亡復興之道。蔣公在此將推行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精神建設」連結一起，並行實施，更易發生鉅大之效果。

最後蔣公指示以「軍人讀訓十條」，做為普通一切國民軍訓，童子軍訓練，以及壯丁訓練之中心要旨。指出一般人最大

之毛病，不外虛偽、苟且、怠惰、敷衍、怯懦、散漫、貪鄙、奢多、浪漫、驕傲、粗暴等行爲，軍人讀訓十條即在革除以上之缺點，以期人人能自覺自治，自強自立，收到教育之實效，達成救國救民之目的。

至抗戰期間，蔣公復爲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註六）。首論精神動員之重要，推倒滿清，建立民國，誓師北伐，完成統一，均賴精神制勝。次論當前國運之危殆，強寇之猖狂，實由吾人已往精神行爲之頹惰散漫，因而召此結果。最後使人確認國民精神總動員之重要，應知悲愧奮發，共同努力於民族之固有道德，一致發揮總理之革命精神，集結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個共同目標之下，掃蕩萎靡腐敗之障礙，養成蓬勃奮發之朝氣，戮力奮鬥於抗戰建國之大業。

由此視之，蔣公提倡之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精神建設，實爲一整個之精神教育運動。此一運動應普及全民，深入人民日常生活之中，方能發揮宏效。蔣公論「建國三要素」（註七），包括精神、物質、行動三方面，在精神方面主張推行新生活運動：其主要目的，在轉移風氣，發展德性，掃除社會上腐敗之惡習，培養社會活潑之生機，以禮義廉恥之規律，行之於日常生活之中，一切行動，均合乎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之標準，實是一種精神革新之運動。又謂，唯有推行新生活運動，恢復民族固有之道德，改革習慣，風動社會，始可振作積極之精神。

但此兩大運動，必付諸實踐力行，始能發揮全民精神教育之宏效，歸根究底，仍以蔣公之力行哲學爲推行「精神建設」之原動力。故蔣公提出推新生活運動之要件有四：(1)「昨死今生」的覺悟。(2)「實事求是」的精神。(3)「以身作則」的教化。(4)「互助合作」的誠意。而歸結於新生活運動爲復興民族之運動，爲改造社會之運動。（註八）在在以「實踐」爲要，以「力行」爲本。

#### 四、提倡文武合一教育

蔣公在教育上另一重大之措施，即決定「文武合一教育」之實施。「救國必須實施文武合一術德兼修的教育」（註九），爲有關此一教育構想之重要文獻。在此演講中，蔣公首論古人教人，無論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是文事與武藝並重，文武合一，術德兼修。繼謂現在之教育，則文武完全分途，文人不學武藝，武人不知文事，馴至養成重文輕武之惡習。欲學習武藝，必先鍛鍊體魄，鍛鍊體魄之道，首須與自然環境奮鬥，與「日光、空氣、水」奮鬥；次爲練習武藝，亦爲鍛鍊體魄之良好方法。唯須注意有武藝者，必有武德，否則必流於野蠻魯莽。所謂武德，即古人所謂之「智、信、仁、勇、嚴」也。如大家均能發揚武德，增進武藝，則國家民族必轉弱爲強，轉危爲安。

至論教育之內容，以古人教學生，有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由此可見我國古代教育，本主文武合一，術

德兼修。今後學校教育須根據古人「文武合一」之精神，與「六藝兼修」之原則，唯教育之內容，更求充實進步而已。至於新生活之根本精神為禮義廉恥，此四者本與智信仁勇嚴相通，亦即六藝之根本精神所在。故實施文武合一之教育，應努力推行新生活運動。

蔣公所提「文武合一教育」，與其稍後所講「現代國家的生命力」與「全國總動員的要義」（註一〇）有密切之關係，都是體系一貫，互相裨輔之構想。在「現代國家的生命力」中，大意指「全國總動員」為現代國家唯一之特質，即一切政治建設之總目標。以現代國家之生命力為「教育」、「經濟」、及「武力」三要素。以教育結合經濟及武力，以建立軍國民之教育，而充實國力。至於充實國力之初步具體辦法有三：(1)以「新生活運動」為教育之基礎。(2)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為經濟之初步。(3)以「勞動服務與征工制度」為武力之重心。而最後旨在建設三民主義之新中國。

在「全國總動員的要義」中，蔣公亦主張教育應與政治、經濟、軍事相結合，分工合作，協同一致，以求達到「全國總動員」之目的。以教育為一切事業之根本，而與經濟武力之連環關係，尤為密切，必須互相聯絡，彼此貫通。教育為經濟與武力相聯繫之總樞紐，故更須以發達經濟增強武力為教育之主要方針；實施軍國民教育，始為真正之救國教育。

蔣公在「救國教育」（註一一）中稱，救國教育乃運用教育之工具，發揮教育之力量，以挽救垂危之國家。所謂「救國教育」，亦即「軍事化的教育」（註一二）。實施「軍事化的教育」，應注意下列二事：(1)教育應注重生活的改造，養成刻苦耐勞之生活習慣，使「平時一如戰時，戰時一如平時」。而新生活之六項原則——「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亦即戰時生活之要件及標準。(2)教育要以六藝為基本，亦即實施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之教育。

文武合一教育制度，在抗戰期間即已付實施，自初中以上學校均派軍訓教官，負責訓練及管理之責任，以普遍實施軍事化之教育。政府遷台之後，此一制度曾一度中斷，至四十一年始普遍恢復學生軍訓，並正式建立大專畢業學生預備軍官教育制度。在第一期開學典禮時，蔣公並親臨致訓，講「國家需要革命青年青年需要革命教育」（註一三），指出此次大專畢業學生預備軍官教育制度之建立，為中國革命建國過程中最有歷史意義之創舉，亦為中國教育史上，軍制史上劃時代之新紀元。教育經此徹底改革之後，以建立教育與國防合一之永久基礎，恢復文武合一之教育制度，將青年學子陶鑄成一文武雙全，術德兼備之時代青年，為摧毀俄帝侵略，重建國家自由而戰鬥。

## 五、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自共匪竊據大陸之後，為鞏固其傀儡政權，便於奴役七億同胞起見，便不顧一切，極力思以破壞我傳統文化，消滅我倫理道德。蔣公目覩毛匪奸行，痛心疾首，認為唯有反攻大陸，消滅共匪，始可挽救我中華傳統文化於不墜。爰至民國五十五年

，毛匪利用無知青年組織「紅衛兵」，以造反爲號召，破壞傳統文化。蔣公至是深感毛匪之種種倒行逆施，處心積慮爲鞏固其私人之政權，不惜將我傳統文化置於不顧，甚至顛倒黑白，混淆視聽，侮蔑古聖先賢，頌揚亂臣賊子，長此以往，我傳統文化之優良本質，將蕩然無存矣。遂有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意。

五十五年四月，蔣公書勉孔孟學會會員強化「以仁制暴」、「以正克邪」之精神武器，完成反攻復國使命。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一百廿一誕辰，興建於陽明山之中山樓中華文化堂正式落成，蔣公親臨主持落成典禮，並發表紀念文。復應各界人士之請，明定國父誕辰紀念日爲中華文化復興節。翌年，蔣公於國父誕辰暨中華文化復興節發表紀念詞，勉勵國人以傳統文化復興爲依據，促成反攻復國之精神總動員。民國五十七年，蔣公對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中學「公民與道德」兩課程，作明確之指示，提出食、衣、住、行、育、樂、生活教育、人格教育之詳目，以確立國民生活規範與人格觀念，爲建設國家社會、復興文化道德之張本。五十八年十二月，蔣公於國代年會中致詞，闡明科學與倫理相結合之觀念，即在積極展開科學研究與科學建設之時，不僅要注意自然科學之探討，尤當致力於人文科學之發揚，注意哲學之修養，特別要掌握中國傳統文化以仁爲本之基本精神，以消弭目前泛濫世界之物本主義，與虛無思想之流毒。五十九年十一月，國父誕辰及文化復興節，勉勵全國同胞發揮民族文化潛力大能，並強調中華文化大義正氣千古凜然，終必消滅毛賊奸匪。六十一年青年節，勉勵全國青年本乎其義務感與責任心，以復興中華文化爲己任。毛匪更包藏禍心，在大陸普遍掀起「批孔揚秦」運動，蔣公於六十三年元旦，昭告全國同胞，謂毛賊奸匪瘋狂愚昧，倒行逆施，「批孔揚秦」，我必須厚植國力，撻伐叛逆。光復大陸，不僅是一種目標，而爲中華民族共同之非存即亡、義無反顧之行動。同年青年節，勉勵全國青年堅持國民革命之責任，守護民族之歷史文化。指出毛賊悍然以聖哲孔子爲仇爲敵，以暴君嬴政自居自大，造成人倫巨變，我應掌握關鍵時刻，掃除奸匪邪惡罪孽，拯救大陸同胞。六十四年青年節，蔣公在臥病之際，且僅在崩逝前數日，猶念念不忘以復興中華文化勉勵青年，發表文告，號召青年奮起，以倫理、民主、科學之大道，師法先烈開國、北伐、抗戰之精誠大義，出全力以護衛民族之歷史、文化、道德、智能，貫徹反攻復國之大擔、大使命。

總之，蔣公一生以救國救民爲己任，以復興中華文化爲職責，自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來，無時無刻不以此重責大任以勉勵全國同胞及青年，而期國人真能體認我國傳統文化之浩瀚淵博，源遠流長，爲國家前途及民族命脈之所繫。我國文化之基本精神爲倫理，中華文化之骨幹爲道德，有傳統之行爲規範，有古聖先賢之風範楷模，倘能人人能深體蔣公提倡此一運動之苦心，人人能把握悠久文化之真諦，發揚我國固有之倫理道德，作爲推動及發揚現代文化之動力，勢必使我國文化發揚光大，弘揚於世界；更可以之作爲反攻復國之精神武器，擊潰毛賊共匪之邪惡論說，以完成蔣公之遺志。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亦爲一全民教育之運動，蔣公之發起此一運動，乃針對中共匪黨之破壞我國傳統文化，消滅我國聖



哲嘉言及民族正氣而發者，使人人了解毛賊共匪之陰險伎倆，以邪說謬論以毒化大陸民族幼苗；進而以台澎金馬爲中華文化復興之基地，繼續使我傳統文化得以維護及光大，以鞏固反攻復國之精神力量。

## 六、實施九年國民教育

蔣公鑑於教育建國之重要，及世界各國均努力從事義務教育年限延長之工作。於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訓示：『我們要繼續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成功之後，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計劃。以我們現階段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來解決九年義務教育問題。我們每一家庭，都有兒女，每一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兒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政府只要根據「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原則，結集社會上的力量，就可以辦好這一保育下一代民族根苗的義務教育，亦就可以根本消除惡性補習的痼疾病根，以實現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教育建設，而也就是保證耕者有其田與平均地權的成果於可大可久，貫徹我們均富的主張，實現民生主義的大政至計。』旋於同年八月十七日正式頒佈命令：爲提高國民智能，充實戡亂建國力量，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四項之規定，經交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第三次會議決議：國民教育之年限應延長爲九年，自五十七學年度起先在臺灣及金門地區實施。（註一四）五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蔣公以五十七年台統（一）義字第六六號 總統令公布「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其內容如下：

第一條 爲提高國民教育水準，適應國家建設需要，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國民教育分爲二階段：前六年爲國民小學；後三年爲國民中學。

第三條 國民中學應由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行政區域、人口、交通及國民小學分佈情形，劃分學區，分區設置；容納本學區內國民小學畢業生。

第四條 國民小學當年畢業生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所在學區國民中學入學。在本條例施行前國民學校畢業生年齡未超過十五歲志願就學者，予以輔導入學或接受技藝補習教育。

第五條 私立初級中學應依照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辦理之。私立初級中學辦理成績優良，適合所在地區需要者，得指定爲代用國民中學。

第六條 國民中學學生免納學費，其他法令規定之費用，清寒學生免收之。另設獎學金名額，獎勵優秀學生。

第七條 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應加強其組織，並設置國民教育推行委員會。

第八條 國民教育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爲中心。國民中學繼續國民小學之基礎，兼顧就業及

升學之需要，除文化陶冶之基本科目外，並加強職業科目及技藝訓練。爲培養國民教育師資，並提高其素質，應建立教師之儲備及進修制度。

第九條 國民小學應就原有國民學校基礎，促進教學，注重兒童身心均衡發展；各項設施應符合規定標準。對於體能殘缺，智能不足及天才兒童，應施特殊教育，或予以適當就學機會。

第十條 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所需經費，由省（市）政府就省（市）、縣（市）地方稅部分，在稅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限額內籌措財源，逕報行政院核定實施，並不受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八條但書之限制。

第十一條 凡私人或團體捐贈辦理九年國民教育者，依捐資興學褒獎條例之規定從優獎勵。

第十二條 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所需建校土地，得依左列各款撥充之。

第十三條

一、撥用公地

二、收回其他機關使用之公地

三、原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留地，必要時得變更爲學校用地。

四、捐獻之土地

五、依法徵收之私有土地

第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區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自 總統蔣公之訓示及命令中，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有其重要之時代意義：

第一、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旨在保障及擴大耕者有其田與平均地權之成果，貫徹均富之主張，以實現民生主義之社會。

第二、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使國民小學畢業生，不經入學考試，均得免費入學，以消除過去自小學升初中階段之惡補，以保育民族幼苗。

第三、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旨在提高國民教育水準，適應國家建設需要。當時因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社會，各工廠均不斷引進新式機器及技術，需要學識技能水準較高之工人，以資配合。另一方面因國軍之裝備武器不斷更新，服國民兵及常備兵役者，亦需要學識程度較高之役男充任，故亟需提高國民教育水準，以適應社會之需要。

第四、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旨在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文化陶冶，職業科目及技藝訓練，兼顧就業與升學之輔導。換言之，即注重「全人」教育之實施，徹底革除過去國小初中專以升學準備爲能事之弊端。

總之，蔣公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決策，可謂樹立培育我中華子孫之百年大業，使教育肩負起復興建國之偉大使命。自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命令頒佈之後，舉國上下，無不竭誠擁護，有關方面亦恪遵蔣公指示，積極準備，寬籌財源，籌建校舍，充實設備，均能如期實施。因事前有周密之計劃，所有困難均獲得一一解決。較之日本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一部分學生初期在露天上課，缺乏教室及課桌椅之情形，實不可同日而語。此實賴我總統蔣公英明之領導，始克致此！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後，全國教育學者反應意見極為良好。鄭西谷先生稱：「延長國民教育為九年，是中華民族改造的起點，是反共復國的基石，同時也是促成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所在。故能獲得全國國民的竭誠擁護，認是政府偉大的德政。」（註一五）王亞權氏亦稱：「以言九年國民教育效益，吾人可以確言九年國民教育為一項多目標的建設：在經濟上，因人力素質的普遍提高，有利於國家經濟建設的推行，並提高國民所得，可以改善國民生活。在政治上，因為國民基本知識增進，人民能正確的運用四權，可以改進地方自治工作，而對於大陸同胞尤其有政治號召的作用。在國防上，因國民知能豐富，體格強健，可以有效的使用精良的武器，鞏固國防建設基礎，增強反攻復國的力量。在社會上，可以增進國民就業機會，安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繁榮。在教育上，消極的能和緩升學競爭，防止惡性補習，重建教師尊嚴及改良教育風氣；積極的，可促使國民教育正常化，奠定教育發展的良好基礎。」（註一六）宗亮東先生亦謂，延長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為我國教育史上之新紀元。（註一七）由此觀之，蔣公之決定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實為一迎合世界潮流，適應國民及社會需要之明智決策。就教育之投資觀點言，延長九年國民教育，乃開發人力資源之唯一途徑。可發展民智，推進工業，改進社會結構，而充裕人民財富。故延長九年國民教育，實乃厚植國力，改善人民生活之重要措施。

#### 附 註：

- 1 見民國十七年九月廿四日新聞報。
- 2 參閱孫邦正著：教育概論（增訂本），第五二至五三頁。
- 3 見 蔣總統：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載蔣總統集（第一冊）第四八三頁。
- 4 蔣總統：「建國的行政」，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講，載 蔣總統集（第一冊）（國防研究院本），第九四二頁。
- 5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六日出席縣市行政講習所開學典禮時講，載 蔣總統集（第一冊）第九三四頁至九三六頁。
- 6 蔣總統：「為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告全國同胞書」，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 7 見 蔣總統：建國運動，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在廬山暑期訓練團講。
- 8 見 蔣總統：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在首都新生活運動二週年紀念會講。
- 9 蔣總統於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在成都四川省黨部講。
- 10 「現代國家的生命力」，係 蔣公於二十四年九月八日出席峨嵋軍訓團 總理紀念週講：「全國總動員的要義」係 蔣公於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

日在峨嵋軍訓團講。

11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五日在廬山暑期訓練團講。

12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五日招待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出席人員講。

13 民國四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在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開學典禮講。

14 參閱「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報告」，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秘書處印，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15 參閱鄭西谷：九年國民教育推行之觀感，載中國教育學會主編：九年國民教育研究，（商務）第二頁。

16 見王亞權：九年國民教育行政工作，同上，第四八頁。

17 見宗亮東：建立國民中學教師儲備與進修制度，同上，第四九頁。

## 伍、對學校教育之重要訓示與決定

### 一、過去學校教育之陳弊與改革方向

蔣公一生論及學校教育之言論頗多，其中尤以指陳學校教育流弊之處，所在多見。茲就蔣公有關教育言論及訓示之演講及專著中，加以分析綜合擇學校教育缺點之聲聲大者，計有下列數端：

（一）忽視「民族精神教育」：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蔣公在教育部講「中國教育的思想問題」，即已指出民國二十年以來之教育，不但毫無進步，而且日見後退。主要原因，由於在教育實施之方針上，缺少正確之主義觀念，缺少中心之信仰，致使教育之效果無法發揮。中山先生之思想，為中國之正統思想，乃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之仁義道德思想。在教育中缺乏此種傳統精神或道統，國家不能存在，中華民族便要滅亡。

同年三月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學校總理紀念週演講（註一）時，慨然指陳當時一般學校之教育為亡國之教育，而非建國之教育及革命之教育，盲目崇外，忽視我國固有之能力及精神。吾人一方面要研究科學支配物質，一方面尤其要發揚固有的優美的德性智能和民族精神。

學校教育之一般錯誤，即由於盲目的學習外國之科學及物質文明，而忽視本國之文化傳統。蔣公當時曾感喟指謂：

「這個失敗的原因，我們以為是我們東方人的歷史背景，有東方人的地理環境，尤其是有東方人特別的精神。如果我們忘了我們自己的精神，拋掉我們自己的歷史，完全去學他們外國人的東西，那你對於物質科學講求得如何的好法，總是不會成功的。」

蔣公以中國教育之失敗，歸咎於教育方針之錯誤，而未樹立三民主義之教育方針。唯有實行三民主義，始可挽救危亡。蓋

三民主義之思想淵源，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所流傳下來之道統，其根本精神，即以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來領導革命，復興民族。

在「革命的教育」（註二）中講，今後教育之目的，在培養一般能建造國家復興民族責任之健全國民，簡言之，即教其成爲一個真正之中國人。最近此二十七年來之教育，幾多是糊塗之教育，其影響所及，不僅足以亡國，而且將致滅種。培養出之學生，既不明瞭本國之歷史文化，及民族地位之重要，亦不尊重本國固有之德性，及立國精神之特點，更不知國民對於本國應負有如何之責任；不知應當如何愛重自己之國家及文化，只知盲目的接受外國之一切，祇講表面，徒襲皮毛，浮動淺薄，隨人俯仰，完全喪失獨立國家之國民精神。蔣公剴切指示，中國之教育，要培養青年使其成爲真正之中國人。

「要知道：我們中國人是有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固有的德性，是有我們中國人確乎不拔獨立不懼的特性和品格，我們中華民族有中國整個一貫的民族精神，所以中國國民，必須要有中國人所固有的品格德性和精神，纔可以算爲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換句話說：中國人不僅要以「中國」爲他的生命，而且要以「中國」爲他的靈魂，所謂中國的靈魂，就是國魂。這個國魂，就是包括中國一切固有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和道德思想，以及五千年來一切精神物質的創造和積累。作了中國人，一定要以中國國魂作自己的靈魂，以中國國家的生命作自己的生命，纔算是一個真正中華民族的子孫，纔不愧爲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蔣公對教育界人士發表演講時亦稱，教育一般國民，使其成爲真正之中國人，即從根本上教其愛國，教其齊家，教其接物、處世，教其立業、治事，教其負責、服務，教其強身、助人，教其濟世及成功。而在此一切教育之根本科目中，均以固有之精神思想及道德，亦即將整個之中國國魂，貫徹其間，使深植於人人內心之中。（註三）在抗戰期間，蔣公亦勉勵全國教育界人士，要堅定全國抗戰之意志，建立積極建國之精神，提高民族固有之道德，激發全民族之獨立自尊性，喚起全民族對暴敵之同仇敵愾的犧牲性，樹立起全民族對革命前途及國家將來有深切之自信心，從而鼓勵向前進取，積極奮鬥之決心，而後中華民族始能自千辛萬苦中孕育出光明燦爛之新生命。（註四）

至於如何實施民族精神教育之問題，蔣公會迭有指示。經綜合歸納，大致有下列數端：

（1）建立對三民主義之信仰：中華民國以總理之三民主義爲建國之依據，而三民主義又爲我國傳統思想之精華。蔣公極力主張闡揚總理全部遺教之理論，普及青年對於三民主義之信仰，以三民主義之哲學觀及世界觀，從新建立各種學術之系統，樹立各種文化事業之重心。（註五）

蔣公並指示，大學教育中缺乏一套以三民主義爲中心之建國思想之大學用書，每一課程之講授，皆由教授自定，於是在同一學校之內，同一課程，不特解釋各異，而且思想紛歧。表示個人學術思考，可以自由，但學校教科書，必須完全統一。指令

教育部從速編訂一套以三民主義的精神爲體系之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社會學、以及三民主義之理則學與思維法則……，以確立三民主義建國之教育思想。在大學用書方面，蔣公亦有明確之指示，應儘量減少使用原文本，而代以譯文本。此種譯文本，亦並非完全照譯，而應參酌國家民族之特性，根據三民主義之準繩，予以改編。（註六）此種主張，蔣公早在民國十六年一月之「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演講中，即已確認欲改革教育，須以實施三民主義之教育爲本。其睿智之見解，與夫擇善固執之精神，堪爲萬世楷範。

(2) 改進各級教育：蔣公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指示，國民中學應重視思想教育，以啓發其立志向上、愛國自強之精神。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教育，不惟應接受軍事訓練，並應接受嚴格之管理，以新生活運動之要領爲管理之依據。在大學教育方面，重視變化氣質，以民族文化爲優先。凡此種種詔示，無不以建立完整之民族精神教育爲依歸。

(3) 發揮有關學科之功能：蔣公指出在學校中有若干學科，如能善於發揮其學科本身之功能，自然可達成發揚民族精神，激勵愛國觀念之目的。如公民教育不論課程計劃或課外活動，可使其「了解三民主義的本質，和民主政治的觀念以及民主生活的方式」。又可「從童子軍教育、國民軍事訓練及勞動服務中培養愛國思想與民族精神」。（註七）國民中學歷史地理之常識，務使學生了解現代國民對國家社會應盡之義務與責任，不失爲愛國愛民、堂堂正正之現代國民。大學教育應注重一般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本國語文與史地教育），使其與自然科學平衡發展。師範教育更應着重國文程度之提高，民族文化之發揚。（註八）蔣公又在指示小學「生活與倫理」、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之編纂，與教學方法之改進時，亦指出此二科旨在教育學生成爲一個愛國家、愛同胞、合群服務、負責守紀，且足以表現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堂堂正正之中國人。（註九）以上各種學科，均爲實施民族精神教育之重要科目，若能遵照蔣公訓示，注重內容之編纂，及改進教學方法，必能發揮學科本身之重要功能，完成民族精神教育之要旨。

(二) 忽視道德教育 我國古稱禮義之邦，對道德教育極爲重視。筆者常謂，我國文化之精髓或骨幹爲倫理道德，換言之，倫理道德爲中國傳統文化之基本精神。若將倫理道德因素自我國文化中除去之，則我國傳統文化之內涵將甚爲空洞矣。但晚近國人對我固有之道德漸不重視，不但罔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世之學，即連起碼之誠意、正心、修身之做人功夫亦表輕視，遂致社會風氣日趨澆薄，而人倫道德逐漸淪喪。總理在民族主義中即大聲疾呼，欲求民族獨立，除發揚民族固有之智能外，必求恢復我民族固有之道德。蔣公一生對於我國傳統道德尤爲尊崇，曾多所闡揚。曾謂，中山先生之思想，爲中國之正統思想，即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孟而中絕之仁義道德思想。（註一〇）蔣公無論對全國國民告諭，無論對軍人訓話，處處均以維護及發揚我國倫理道德爲職責。以「智」、「信」、「仁」、「勇」、「嚴」爲軍人之武德；並以「仁」爲此武德之中心。（註一一）提倡新生活運動，固在使全國人民共同革除舊日之不良生活，而過「整齊」、「清潔」、「簡單」、「樸素

「之新生活；但主要之目的在將「禮」、「義」、「廉」、「恥」等道德規範，貫注於全民日常生活之中，激勵其篤履實踐，身體力行，以發揚我國固有之倫理道德。故蔣公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在本質上言，實為全民之道德重整運動也。

蔣公對我國古代政治哲學「大學」與「中庸」兩書要義，均有極精闢入微之闡釋。（註一二）以大學之三綱八目，為做人、做國民、及做軍人最重要之學問。但現在不僅一般軍人，即是一般學者，對此做人、做事、成功立業之大道理，大學問，真能精研洞達，切己體察，竭力推行者，寥寥無幾矣，以致中國自古以來獨有之政治哲學，無人能真正重視。蔣公講解大學中之三綱八目，可謂最能得古人之心。

「大學之道，分為三綱、八目，所謂三綱，就是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所謂八目，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明明德」的意思，就個人來說，就是一個人一定要有道德的修養，使良知不昧，無所愧怍。「親民」的意思，就是說既能明明德之後，還要能親近民衆，並且要喚醒和感化民衆，使民衆都能自強自立，日新又新，以求人我皆能止於至善。所謂「止於至善」，是說明德，親民，皆當盡其天性，止於至理，這所謂至理，就是真理。止於至善，即止於真理，再無變遷的時候。」又謂：

「其次，在大學的八個項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中，「格致」是做人做事最緊要的起點，亦即修己治人的根本所在。」（註一三）

自蔣公之講辭中，可知根據朱子注，「格物」、「致知」則互為因果，格物在所以致知，而致知乃格物之結果；依據陽明解，則以「格」為「正」為「去」、以「物」為慾，格物者乃去心中之慾也，故「格物」在所以「致良知」也。但不論作如何解釋，而「格物」、「致知」為做人做事最緊要之起點則無疑義。至於「誠意」、「正心」、「修身」則為修己之功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為治人之事務。前者又可稱為「內聖」之功夫；後者為「外王」之事業。由「內聖」而至「外王」，即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成己而後成物」。持此心，故能發揮「老老」、「幼幼」以及「仁民愛物」之精神，此為我國固有道德之精華所在。

我國古代有三綱、五常，有三達德，有四維，有八德，有六德，有六行，即六藝中之禮、樂，亦與道德教育有密切之關係。此一切德目，均為社會行為之規範，乃和諧人群關係，安定社會秩序，維繫民族精神之肯綮。社會有此則安定繁榮，國家有此則生存強盛。故管子有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由此可知，道德教育之興替，關係國家民族之存亡盛衰者至鉅。

蔣公對全民道德教育極為重視，而對各級學校之實施道德教育尤為重視。彼對道德教育之實施方式亦具有真知灼見。蓋過去道德教育之實施方式，往往流於說教，久而久之，遂至形式化，不能收到預期之效果。德哲凱欣斯泰納（Kerschenshteiner

嘗有見及此，倡工作陶冶說，以救其偏。主於工作中訓練個人正確之工作精神、態度、觀念，以及各種敬業樂群之德性，使人於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而收涵濡陶鑄之功。蔣公倡新生活運動，主將禮、義、廉、恥等德性，貫注於日常生活之中，使人於習焉而不察之中，培養成「規矩矩的態度」（禮），「正正當當的行為」（義），「清清白白的辨別」（廉），「切切實實的覺悟」（恥）。（註一四）蔣公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以教育之任務在充實學生生活之內容，其中對倫理與道德之生活，主以合作互助為根本之個人修養，使其在家庭與社會中和諧相處。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指出國民小學教育，應注重倫理教育，以四維八德故事，以及先賢往哲格言，培養其仁愛誠正之人生觀，使其能知孝親、敬長、尊師、重道、合群、愛國。又謂，九年國民教育制度，以養成民族倫理與固有文化——即四維八德之習尚。對於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教育，主張以新生活運動之要領為依據，取締一切不良少年之組織滲入學校，防止其一切欺誘、強迫、仇恨、鬥毆等邪惡行為，徹底杜絕太保太妹之產生。並實施訓導（導師）責任制度，對學生之品德、生活加強輔導。大學教育亦主端正其趨向，變化其氣質。師範教育，必須名符其實，務使能為人師之規範，而為學生之表率，所謂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師表，必能事事躬行實踐，以身作則。蔣公並在五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所頒發之訓詞中，主以四維八德貫注於日常生活之中，而在國民教育時期尤為重要，唯有在日常生活實踐倫理道德，始可達成建設現代社會，復興民族文化之目的。

（三）忽視生活教育：我國之學校教育，一向忽視生活教育，教師平時不常與學生接觸，對於學生之平日生活多不了解，鮮能注意其言談、舉止、行為、禮節、及生活細節之指導。目前之青年學生，在家庭中既缺少晨昏定省，灑掃應對等禮節之訓練，在學校中更缺少尊師、睦友之生活儀態之陶冶。意志散漫，生活無規律，舉止、言行不知檢點，在在表現缺少生活教育之訓練。蔣公幼年在農村生活，保持淳樸之古風，加以幼承王太夫人庭訓，生活謹嚴，自幼即養成艱苦卓絕之精神。嘗自稱：「本席現在四十五歲，回憶十五歲以前，完全是過的鄉村生活，洗衣掃地拭桌，及其他勞苦的事情，自己都能做，什麼髒的地方都不怕，我一生的事業完全以農村生活做基礎。假使我是生在都市，決沒有現在這樣，因為生於鄉村，對於農民的情形，人民的痛苦，都能知道，所以相信個人革命工作，決不會落人的。」（註一五）蔣公因自幼即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之生活習慣，故平日無論對部下、學生、學校教職員、及全國國民訓話，常勉人養成刻苦耐勞及整齊清潔之習性。嘗謂：「衣服用具，不在華美，但求整潔，我們造成整齊清潔的農村，先要造成整齊清潔的學校，這是全體職教員學員要格外注意的，此是小事，實在要緊。太凡人的思想行為習慣，都須受環境的支配，走到清潔的地方，腦筋就會清潔，走到髒髒的地方，腦筋就要髒髒。」（註一六）由此視之，個人之生活習性與周圍之環境，對其一生之思想態度有決定性之影響。蔣公提倡新生活運動，即實施全國人民之生活教育也。講「革命的教育」時，勉勵受訓學員，返回學校之後，切實負起教育青年之責任，其中論及生活教育時稱：「我們要他如何辦事，就一定要教他禮節，能尊重禮節就知道組織和秩序的重要；要教他能够負責，就一定要教他



服從，能服從纔能貫徹任務，重視職責。現在一般學校都不知道教學生如何負責，如何服從，以致大家都輕浮虛偽，放浪無紀，沒有一點爲朋友爲民衆爲國家服務的眞誠，我們要轉移這種壞風氣，以後一定要教一般學生能負責，能服從，決不是服從那一個個人，而是服從本身所應服的任務，所應盡的職責。」（註一七）

蔣公平時對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均強調生活教育之重要性；無論對軍隊之教育，學生之教育，子女之教育，以及國民之教育，亦莫不注意生活之訓練。嘗訓勉黨政幹部稱：「無論學校教育，軍隊教育，或各種訓練班的教育，都要和家庭教育一樣，能够寓教於育，眞正要使學校當做一個大家庭，這樣纔能盡到教育和訓練的功効！我們訓練班，現在最注重生活訓練，所以要實行軍事管理，這是「育」，育的要務，就是要注重生活的改進；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衛生，無論食衣住行的日常生活，都要整齊，要清潔，有規矩，有秩序，要合乎衛生，能够使受訓的人，增進健康，預防疾病，否則生活無規矩，不整潔，不合乎衛生，什麼毛病都要發生出來。」（註一八）

蓋學校爲兒童青年良好行爲習慣培養之處所，良好之學校教育，不只在增進學生之知識與技能，尤重要者，在改變其不良之生活習慣，培養其正當之行爲，使其在環境陶冶之下，潛移默化，化醇去偽。故蔣公論教育之功能時稱，教育唯一之功能即爲生活之改造。以我國近幾十年之教育，偏重於知識技能之傳授，而對於教育本身生活之整飭，與受教者實際生活之指導，缺少注意，所教所學者幾與實際生活毫不相關，或且根本脫節，以致教育自教育，而一般國民與青年之生活，完全不適合於現在時代與環境。並指出東鄰日本，以區區小國，而能變法圖強，且侵略我國，其所以能如此者，在其國民與學生平時均接受節衣縮食刻苦簡單之生活教育。（註一九）

在蔣公之教育思想中，以生活教育之重要性，並不次於倫理教育，人格教育及民族精神教育。且以倫理道德以及民族精神教育，必貫注於日常生活之中，始能達其功効，故生活教育又爲其他教育之基礎也。而且生活教育不只限於學校教育，且爲全民教育之內容，學校之生活教育，即全民之新生活運動，乃培養健全國民所必經之途徑。故蔣公指示在國民教育階段（包括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特別注重生活教育之實施。且主以四維八德諸德目，貫注於食、衣、住、行、育、樂日常生活規範之中，並舉例說明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之一般禮節，不厭其詳，諄諄告誡，領袖之苦心孤詣，無非在培養生活整飭之現代化國民。（註二〇）

蓋唯有現代化之國民，始可建立現代化之國家也。

（四）忽視人格教育：蔣公在批評「新教育」時曾指出：「我們中國近十年來倡行所謂「新教育」，在表面上似乎是理論方法，應有盡有，實際上這種「新教育」只是盲從、粉飾、凌亂、空泛，無計劃無目的的教育。教出來的一般學生，大部份都不知道怎樣做人，也沒有立志要做怎樣一種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所以有許多學生什麼事情都不能作，生在世界上，於社會於國家於他個人，都毫無益處，其結果，使我們國家民族到今天要受敵人無止境的侵略，蒙受現在這樣奇重的恥辱！」（註二一）

在此所指一般學生，均不知如何做人之道理，實由於學校之忽視人格教育所致。蔣公一向對人格教育極爲重視，曾謂：

「大凡一個人在沒有做事以前，就要先想將來的地位，這個人一定是沒有志氣，沒有人格。」（註二三）平日無論對軍隊幹部，或對軍校學生訓話，常提示人格教育之重要性，且以人格影響，為軍紀之第一要素。嘗論「人格的影響」時謂：「怎樣叫人格的影響？就是自家要鍛鍊自家的意志，盡忠自己的職務。對於紀律要尊重，一切奉上對下，都要以身作則，這就是人格的影響，為軍紀第一要素。」（註二三）又在「合作訓練之意義與目標」演講中，指出人格教育即使人知道做人之道理，建國須從建設個人起，有充分之知識技能，與健全之人格始能負擔建國之責任。在「教養術」之演講中，亦指所謂人格教育，即將受教者教成一個「人」！懂得做人之道理——禮義廉恥！由此視之，人格教育亦即健全國民之培養的教育，換言之，即教育一個人成為一個「中國人」之教育。故蔣公在「革命的教育」演講中，大意謂，今後教育之目的，即是要教出一般能擔當建設國家復興民族責任之健全國民，簡言之，即教育其成為一個真正之中國人。又在「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演講中，指出教育上最基本之任務，在於國民人格之陶冶，要陶冶國民人格，則不能不要求全國教育界確立一致之趨向，認清自身及責任，集中於一個目標之下，以身作則，以造成普遍之風氣。至於如何實施人格教育，蔣公亦有明確之指示：第一、認清尊師重道之意義，蓋師嚴而後道尊。學記云：「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謂師嚴，並非指夏楚之威，執朴之施，乃指教師必須嚴於律己，而後師道乃尊。第二、確立道德之標準，全國各級學校，以禮義廉恥為共通之校訓。因其為固有之國民行為基準，亦為近代國民必具之品格。第三、全國教育必須齊一努力之方向，推行三民主義之教育。使革命建國之最高原則，能普遍傳授於民衆。（註二四）

以上民族精神教育、道德教育、生活教育，及人格教育，在學校教育中均佔有極為重要之地位。過去之學校因偏重知識與技能之傳授，對此四者常予忽略，故不能達成完人教育之目的，當今之世，欲培養健全之國民，訓練良好之公民，除傳授其基本生活之知識技能外，對於此四種教育之實施，決不可忽視，在國民教育階段尤為重要。蔣公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訓詞中，訓示吾人，國民小學教育，應以倫理教育，生活教育為主；國民中學教育，應以思想教育，人格教育，與職業（技能）教育為主。此處之倫理教育即道德教育，而思想教育即民族精神教育。即在高中、大學，及師範教育中，此四者亦應居於重要之地位。

再者，此四種教育彼此關係密切，相輔相成，更易發揮陶冶之功效。蔣公在「以四維八德諸德目貫注於日常生活之中」訓詞內指示：「國民教育，為建設現代社會與復興民族文化之張本。」特別命令有關單位編纂小學之「生活與倫理」，中學之「公民與道德」教科書，及改進教學方法，以期達成下列之目的：

首先在教育學生成為人之所以為人，其生活與行動得像一個人，成為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

次之，則在教育學生成為一個愛國家、愛同胞、合群服務、負責守律，且足以表現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前者必須著重生活教育與人格教育；

後者則必須著重民族精神教育，與民族道德教育。

蔣公並謂此四種教育，無輕重先後之分，徹上徹下，仍屬同條共貫。由此視之，學校中知識技能之教學，不過在充實學生之謀生工具；而生活教育、人格教育、民族精神教育、道德教育等，則充實學生之精神內涵，教其所以爲人之道。缺此，徒具有豐富之知識與優良之技能，其於社會、國家、人羣、民族之貢獻可能不大，甚或做出危害國家民族之行爲而不自知。

此四種教育固爲學校教育之不可缺；但在推行全民教育或社會教育之工作中，亦爲重要之課題。蔣公提倡新生活運動在前，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後，若細研此兩大運動之精神與主旨，則知前者包括生活教育、人格教育、及道德教育；而後者則涵攝民族精神教育及道德教育。由此可知，此四種教育亦爲推行全民教育及社會教育之重要工作也。

此外，蔣公在「民生主義教育樂兩篇補述」中，亦曾指陳過去學校教育有三大缺點，即：升學主義、形式主義與孤立主義。爲簡明起見，茲撮要分論如後：

第一爲升學主義：蔣公以此爲小學與中學教育之根本缺點。小學之課程爲升入中學作準備；中學之課程爲升入大學作準備。而中學、大學之招收名額有限，每年能升學之學生佔少數，而大多數之學生不能升學，勢必轉入社會中就業。但中小學課程既不能教育學生在家庭中做子弟，又不能提供職業訓練，使就業之學生求取生活。蔣公認爲對此問題應加緊考慮，切實解決。

第二爲形式主義：蔣公以形式主義爲大學教育所犯之缺點。今日之大學，只講讀若干圖書，賦予畢業生一種資格，具備一種形式，作爲一種裝飾而已。大學必須指導學生適應變動之社會，不僅有求生之能力，且使其成爲建設新社會之骨幹，以適應國家與社會之需要。

第三爲孤立主義：蔣公指出今日學校之科學教育，脫離社會實際生活，而成孤立之狀態。大學中之科學教育與社會生活不發生密切關係，中小學之科學教育又只爲準備升入大學，更與社會生活毫無相關。

蔣公針對上列三項缺點，特提出民生主義教育之方針：第一、教育的內容爲四育與六藝；第二、教育的使命在促進社會進步與民族復興；第三、教育的任務在充實學生生活的內容；第四、達成學校的目的與功效；第五、各種計畫與設施的配合；第六、各種文化宣傳工具的配合。此六大方針內容具體而切合實際，若根據實行，自能使上述之三種缺點爲之消除。且在民國五十七年明令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徹底根除國小升國中惡性競爭。而使國小與國中學生於接受知識教育之外，並能深受生活教育、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之薰陶，以及職業課程之陶冶。使其於獲得謀生之起碼知識與技能之外，復明白處世

立身做人做事之道理。

## 二、對各級學校教育之改進訓示

蔣公對學校教育之改進意見，主要見於其兩篇重要之論著或訓示：一爲「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另一爲「革新教育注意事項」。前者發表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後者公佈於五十七年二月十日。兩文之發佈日期雖相隔有十五年之久，但兩者之間有脈絡可尋，均爲改革當前學校教育之重要依據與指示也。茲綜合 蔣公關於上述兩重要文件之要點如後：

(一)於國民小學教育方面：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蔣公指出，民生主義教育之目的，是要教導一般國民使其適於民生主義之社會生活，並成爲革命建國之器材。首須使其均能識字，均具備公民之常識。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蔣公指出：國民小學教育，應以倫理教育、生活教育爲主，（以四維八德故事，以及先賢往哲格言，生活規範，涵濡浸潤，培養其仁愛誠正的人生觀）使小學生大之能知孝親、敬長、敬師、重道、合群、愛國；小之能培養花木（不摧折搖撼），愛護牲畜（不虐待鞭撻），次之亦能知食、衣、住、行如何始合於禮義廉恥、整齊清潔的現代生活之標準。

根據 蔣公之指示，國民小學教育除教以生活之基本知識與技能之外，在家庭應使其成爲良好之子弟，在國家應使其成爲良好之公民。故主張國民小學學生，應以培育其身心爲第一。涵養其性情，鍛鍊其體魄，以維護其身心之正常與健康。

(二)關於國民中學教育方面：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蔣公指示，國民中學教育，應以思想教育、人格教育、與職業（技能）教育爲主，以啓發其立志向上、愛國自強之精神，並應強調對國民基本之知識，民族文化之淵源，以及自由與法治，處世與接物之分際，職業技能與一般事物管理之學習，使之認識責任與義務，並能實踐不欺不妄之準則。並根據學生之資稟、能力、特長、興趣，輔導發展其潛能性向，以作爲升學就業之參考。並預防國民中學後半段之惡性補習與升學競爭之發生。

國民中學爲義務教育之範圍，故教育內容仍以培養國家良好之公民爲主。故 蔣公特別重視思想教育與人格教育，又以職業教育訓練其謀生之技能。

無論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均重視道德教育，民族精神教育，與生活教育。故 蔣公主張注重民族倫理與固有文化，以培養其四維八德之習尚；並增進其歷史地理之常識，務使其了解現代國民對國家社會應盡之義務與責任，成爲愛國愛民，堂堂正正之現代國民。並應以新生活運動與四健運動訓練之，使其成爲身心健全，手腦並用之國民。

(三)關於高中高職教育方面：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蔣公指示，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教育，應開始着重科學教育，服務教育，管理教育，加強建教合作，手腦並用，使學生之科學與技能教育得與其實驗教育相結合，學生之工作能力，得表現於社會服務之上。又高級中學與高級職業教育，不惟應接受軍事訓練，並應接受嚴格之管理。

對此等學生之輔導，蔣公主張依據新生活運動之要領，以養成其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之習性，並嚴防一切不良少年組織之滲入學校，預防一切邪惡行為之產生。並加強訓導（導師）責任制度，使導師與軍訓人員密切合作，對學生之品德、生活，加強輔導，必要時，並應與學生家庭密切合作。在教育行政方面，則應加強督導責任制度，嚴加視導監督。

（四）關於大學教育方面：蔣公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指出，當今大學教育之缺點有下列數端：第一、大學教育成爲一般中學學生升學之目標，使大學教育超越日常職業生活之上，而職業教育遭受輕視。第二、大學孤立於教育系統之外，未肩負起社會改革與民族復興之責任。第三、大學教育忽視工作及生活經驗，以及對社會實際問題之理解。

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蔣公對於大學教育亦有嚴厲之指責，而以大爲大學教育之缺失有下列數點：（1）偏重自然科學教育，而忽視一般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本國語文與史地教育），兩者不能平衡發展，將導致社會結構，無法健全。（2）大學課程之編製，未能確立三民主義建國之教育思想。（3）各種大學用書，多採用原文本，不適合國家民族之特性，而不能根據三民主義之準繩。

蔣公針對大學教育之前三項缺點，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特別提出下列之三項改革原則：

- （一）大學要訓練各階層各職業裏服務的人才，不做某些特權階級的裝飾品。
  - （二）大學要講授，更要研究，要與各企業和機關的研究室取得聯繫，而構成各種研究的中心。
  - （三）大學要爲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領導，而培養服務管理和負責盡職的通才。
- 並且指出大學僅指導學生做科學研究之方法；使學生於就業之後至工廠、農場、實驗室或社會上做各種專題研究。故大學教育雖可幫助各職業各機關之研究，提高科學及技術水準，但大學教育之主要目的，究竟還是智育與德育並重，專題與常識兼顧，訓練通才，即能擔當爲社會政治與文化服務之中堅領導人才。

針對大學教育之後三項缺點，蔣公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提出下列之改革訓示：

- （一）大學教育，應以科學教育爲第一，更以變化氣質、重視民族文化爲優先。教育部應設法端正其趨向，變化其氣質，務使自然科學教育，既能突飛猛進，而一般人文社會科學（本國語文與史地教育），亦能平衡發展。
- （二）教育部應即突破一切困難，從速編訂一套以三民主義之精神爲體系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社會學、以及三民主義的理則學與思維法則……以確立三民主義建國之教育思想，使民主與科學之教育，建基於民族倫理教育之上。

- （三）各種大學用書，應儘量減少使用原文本，而代以譯文本。此種譯文本，亦並非完全照譯，而應參酌國家民族之特性，根據三民主義之準繩，予以改編。

又大學教育既注重研究，各校自應根據本身特長，繼續專精研究，以建立學術上之領導地位。故 蔣公有見及此，特指示大專院校，應作有計劃之分工專精。教育部須輔導其就某一部門固有之特長，成爲其專長重心。

(四)關於師範教育方面：蔣公對於師範教育學校師資素質問題向極重視，蓋「教育之成敗，繫於師資之良窳」。蔣公嘗以大陸失敗之主因在教育，而教育失敗之主因又在師資之不良。曾慨然訓示吾人曰：

「尤其回想過去大陸上一般自稱爲博學之士，對於我民族傳統精神的禮義廉恥和孝悌忠信的國民道德基本教育，曲解抹煞，以致弄得在學校內，一般教師不僅是不肯教，而且是不敢提，反以八德爲封建遺物，而視四維爲頑固反動教育。並以此自鳴識時，而以超然中立爲高蹈，騎牆觀望爲自由，他想不到共匪即乘這個弱點，就施其中傷離間的伎倆，無形中已成了他的工具，受利用，而不自覺。這樣一來，以致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學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最後卒遭今日國破家亡，清算鬥爭，而無以自拔。」（註二六）

蔣公講「救國教育」時，早已指出教師對學生之影響至大，應知自立、自尊，以建立學生與民衆對教師之信仰，養成尊師重道之風尚。「師資不立」、「師道不尊」，形成教育界弛懈、散漫、輕浮、凌亂、矛盾、衝突種種毛病，爲民族復興前途最堪焦慮之一個隱憂！在「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講演中，蔣公眼勉今日之教育家，應自認爲衝堅折銳之前線戰士，應自認爲移風易俗之社會導師，應自認爲葦路藍縷之開國先驅，應自認爲繼絕存亡之聖賢英傑。在「青年團工作根本要旨」中，蔣公囑咐負有教育青年責任之人，均須特別認識教育之根本要旨所在，研究如何使本身具有變化氣質之精神及本領，更如何使一般青年學生均能受到教育之感化，古人所謂「聖神功化」，此一「化」字乃立己立人一切之基礎，此即教育之能事。故蔣公以教育爲建國之基本要務，爲國家民族精神與文化亦即永久的生命根基之所託。故教育之優劣成敗，即國家民族興亡盛衰最大之關鍵。且指出中國今日之教育無精神、無內容、無效果，以及種種根本失敗。欲改良教育，必先充實與提高師資。必須導師重道，端養士氣，以轉移風氣，振作人心。今後若不能將担负教育責任者之地位與品格儘量提高，將教育徹底改善，則一切救國教育，皆將無從着手，勞而無功。（註二七）

由以上所引，即可見 蔣公對師範教育之倚重與關注，亦可知 蔣公在師範教育上之真知灼見，實有啓牘振聵之作用。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對師範教育之辦理方針方面尤多所指示。

第一、關於師範教育之重要性：蔣公以師範教育，必須名符其實，務使能爲人之規範，而爲學生之表率，所謂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師表，必能事事躬行實踐，以身作則，庶幾無愧！此國家對於師範教育，所以特別重視，對於師範學生，所以特別優待者，意即在此。

第二、關於師範教育之辦理方面：蔣公指示今後對師範教育之管理考核，應特加嚴謹，以樹立社會與民衆之師範。

第三、關於師範教育之課程與教法方面：蔣公指示師範教育之課程，更應着重國文程度之提高，民族文化之發揚，新式教法之研究（軍隊六項教學法中之準備、講解、示範、實施、測驗、講評，即可供參考），以及品德言行之示範。

第四、關於研究與輔導方面：師範大學，應於各系附設教學研究中心，使師生得以教學相長。各級師範學校，對其已畢業之學生，仍應在教學方法上以及德業進修上，予以不斷的輔導、通訊、聯繫。

第五、關於師範生之獎懲方面：責成教育部與教育廳、教育局對優秀而清寒之師範學生，作有計劃之扶掖培植。

由以上所示，故知教師之工作，必須接受師範教育之專業訓練者方能勝任，唯有在完整之師範教育體制之下，繼續充實各級師範院校之師資及設備，加強生活訓練與環境之陶冶，始能培養出經師而兼人師之師資。

（四）關於職業生活教育方面：職業教育之實施，不但使學生學有一技之長，將來有謀生之能力；且可培養學生勞動服務之精神。蔣公平日對於民衆教育方面極爲注意，曾訓示幹部須以身作則，領導一般民衆，以勤苦耐勞之精神，以補救我國物質之不足。嘗引管子語曰：「以死教民強，以勞教民富。」（註二八）復在「勞動與服務」演講中稱：「所以我們一方面要養成勞動的習慣，一方面要提高服務的精神，從此以後，大家必須徹底剷除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與求個人榮華富貴的惡劣卑賤的思想，而注重社會的生存，增進公共的道德，養成勞動的習慣，發揚服務的精神！」在學校教育中，而職業之訓練與陶冶，最能養成學生勞動之習性，與服務之精神。蔣公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曾指出職業生活教育爲民生主義教育之主要部門，青少年要在社會中生存發展，必先就業。但蔣公在此所指之「職業生活教育」，乃廣義之職業教育，除職業學校之外，在普通之中小學中，亦須普設職業科目，使大多數不能升學而就業之學生，均能就業，使其成爲健全之教育制度與實用之學校課程。

欲在中小學校實施職業生活教育，對其課程及課外活動須重加設計。關於此點，蔣公提出下列之指示：

- （一）從家庭生活了解社會經濟狀況，並學習處理經濟事務的技能（家庭生活教育對職業生活教育的幫助在此）；
  - （二）從公民教育了解中國的資源、國際經濟關係及社會問題（公民教育對於職業生活教育的幫助在此）；
  - （三）創造積極、自動、負責與服務的人生哲學，與手腦並用、協力互助、分工合作的工作方法；
  - （四）在工作中保持生理與心理的健康及減少傷害，增進安全的知識和技能；
  - （五）增進工作能力的基本工具——例如（甲）數學、科學常識、寫作能力；（乙）生產事業及市場情況的實地考察，及採取情報的方法；（丙）社會經濟各種統計的搜集與整理的方法；
  - （六）對於工具機器的管理、愛護、修理、保護的責任心，業務費用的設計考核，節約增產以及廢物利用等常識的培養。
- 學校教育只須教導學生，獲得職業生活上的一般知識、技能與修養。尤須注重修養，陶冶其性情，改變其氣質，校正其行

爲，始能收到教育上之實效。學校儘可與工廠礦業農場及政府機關合作，創立各種職業先修班，隨學生之性格志趣及能力，指導其選修。旨在訓練其手腦並用與智德兼修，使其將來進入社會，能發揮自己之才能，成就遠大之事業。

(六)關於公民教育方面：蔣公對公民教育之訓示，最重要之資料見於「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此之前，於民國二十四年講「現代國民必備的條件」時，而指出其條件有四：(1)重秩序，守紀律。(2)明地位，負責任。(3)崇主義，復國魂。(4)揚武德，張四維。此亦可謂之公民教育。若擴而言之，蔣公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亦可屬於公民訓練教育之範圍。蓋就其主旨而言，新生活運動乃全體國民之生活革命，以「禮、義、廉、恥」爲基準；就其本質而言，新生活運動乃轉移風氣之工作，補偏救弊，改變舊日之不良生活。就其目的而言，以勁疾之風，掃除社會惡習，以黨和之風，培養社會生機與正氣。就其內容而言，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而後達至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以及生活軍事化。(註二九)故就新生活運動之工作內容而言，實可屬於廣義之公民教育也。

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蔣公大意指，公民教育之範圍甚廣，一方面包括開會之方法，選舉之制度與方法，政府之組織與職能，法律之常識與守法精神；另一方面亦包括做一個良好公民所應有之技能、態度與作風。公民教育不僅灌輸知識，尤須使其了解中國倫理習性，父慈、子孝、兄友、弟愛、夫義、婦順之六項正德，乃是做中國國民必不可缺少之基本條件；同時亦要改變學生之性格與行爲，使其適應獨立自由國家之生活。

至於公民教育課程與課外活動之計劃，應依照下列要點實施：

- (一) 了解三民主義的本質，和民主政治的觀念以及民主生活的方式；
- (二) 了解中華民國政治制度的原理和四權的運用方法；
- (三) 認識國家在國際環境中的地位和前途；
- (四) 了解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中的地位和責任；
- (五) 明瞭科學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
- (六) 從實際生活上發生研究社會問題的興趣，從實際調查上學習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
- (七) 從童子軍教育、國民軍事訓練及勞動服務中培養愛國思想與民族精神。

蔣公指示，在公民教育中，除「公民」課程與有關之課外活動外，其他如歷史、地理、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科目，均爲實施公民教育過程中不可缺少之學科。其中尤以歷史、地理兩科最爲重要，蓋其能真正激發學生之愛國心與民族感情，使其認識中華民族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與禮義廉恥四維之重要，始能教導學生做一個愛國之公民。

此外國民軍訓對於國民之身心健康裨益甚大，可養成合作之精神，鍛鍊爲國服務之信念，習慣於有秩序有紀律之生活。羣



子軍訓練之內容包括智、德、體、群四育，爲手腦並用、文武合一之訓練，糾正過去忽視勞動之積習，引導青年走上科學教育與國防建設之道路，均爲培養健全公民之重要途徑，而擴大公民教育效果之輔助活動。

### 三、學校教育內容及教學

(一)學校教育之內容：所謂學校教育內容，即指學校課程而言，蔣公在此方面之指示亦多，且對其極爲重視。蓋學校教育實施之成敗，與課程內容之組織安排，及教學方法之優劣，有密切之相關。

(1)四育之主張 所謂四育，即指智育、德育、體育、群育而言。蔣公不但指示學校教育應以四育爲主，而且指示軍隊教育之內容，亦應四育並施。在「黨政工作人員須知(二)」演講中，蔣公指出，體智體群四育中，最重要者爲體育，蓋無健康之體魄，不能任重致遠，不能担当國家大事，不能成功革命事業。「智育」即指知識才能之增進，「德育」即指道德人格之修養，「群育」即指團體之改善。

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一書中，蔣公亦以四育之重要性詔示吾人，嘗謂：

「教育、經濟、軍事三者之中，教育尤爲首要。以言教育，首須先使受教者發揮其智識、道德、體魄與群性，即所謂智、德、體、群四育。智育即智識、技能之培養，德育即品德、人格之提高，體育即精神、體魄之增強，群育即團結一致與互助合作習性之養成。」

又在「對陪都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指示」演講中，蔣公指出：「培養德、智、體、群之四育以臻於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之完成，即爲現代教育精神之所在。而顧名思義，於「教育」二字之內涵意義，尤必整個體會。通常教育二字，習用爲一名詞，實則「教」與「育」自有不同之涵義，合「教」與「育」，方能盡陶冶次代國民之責任，兩者並重，絕不可以偏廢。教者注重於智識、技能之傳授，育者着重於生活、修養之指導，夫德育、智育、體育、群育之所以皆稱育而不稱教者，即明示此種修養之完成，皆非講授灌注之方式所能爲力，而必須對於受教者之生活行動，食衣住行，起居作息，以至灑掃應對進退與課外學習，一一示以正軌，施以督導，使其身心發展，兩臻健全，庶幾道德之培養，精神之發揚，體格之鍛鍊，常識之充實，與乎心性之陶冶，情感之滋長，相輔相成，方足以完成教育之功效。」(註三〇)

早在民國二十四年，蔣公講「現代國家的生命力」時，即指示稱，現代國家之生命力爲教育、經濟及武力，而其中最重要者仍爲教育。並稱，教育之類別雖多，但有一共同之根基，即一切教育之共同要旨所在。此共同之要旨，即使受教者竭力增進充分發揮其「智慧」、「道德」、「體魄」、「與「群性」，即所謂「智」、「德」、「體」、「群」四育。智育即知識技能之培養；德育即品德人格之提高；體育即精神體力之增進；群育即團結親愛互助合作習性之養成。

在以上所引四篇訓詞中，蔣公均論及四育之教育內容，發表之時間雖有先後，而對四育之詮釋則完全一致。旨在矯正過去學校教育之偏失，而指示革命教育之發展方向。以往學校之教育內容，多偏重智育，而忽視其他三育，所培養出之青年，徒有高深之學識與熟練之技能，缺乏善良之品德，互助合群之習性，與強健之體魄，對國家社會之貢獻不大。我國古代教育之內容，使學生在校中不但有知識技能之傳授，而且注意體格之鍛鍊，與品德之陶冶。韓愈亦曾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與解惑也。」授業、解惑二事，指知識、技能之傳授，而傳道者則指道德之培養，人格之範成，與情感之陶冶而言，絕不獨偏於智育，此即「全人」教育之主旨所在。蔣公深悉此要旨，認為學校教育內容；應四育並重，除智識、技能之傳授外，而道德之培養，體魄之鍛鍊，與夫精誠團結互助合作習慣之養成，尤為重要。

唯四育之實施，僅注重各種學科之教學，則不能奏功，必也室內教學與課外活動密切配合，而道德教育、人格教育、生活教育與體魄之鍛鍊等兼籌並顧，作妥善之安排，始能發揮教育之宏效。

(2)六藝課程之理想：蔣公在其訓詞中，主張恢復六藝教育的內容之處甚多，迭見於「軍人精神教育之精義(二)」(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講)、「軍事教育之要旨(三)」(二十三年八月七日講)、「為學之目的與教育之要義」(二十四年七月一日講)、「現代國家的生命力」(二十四年九月八日講)，以及「軍事化教育」(二十八年三月五日講)等演講辭中，且均有詳細之講解，對此教育內容之重視，於此可見。

第一、所謂六藝教育，即禮、樂、射、御、書、數，在二千餘年之前，孔子以六藝教人，蔣公認為現在雖時代不同，社會形態演進，但六藝之重要性，仍舊不變。孔子設教，禮居「六藝」之首；管子論治，禮為「四維」之先。禮者節也，節者節制也，軍隊無禮節，便無上下，更無紀律，則不能成為節制之師。社會國家無禮，便成為無秩序無組織之腐敗社會，與混亂之國家。故維持社會秩序，振作國家紀綱，必自「禮」字着手。

其次論「樂」，蔣公謂「樂」對於社會國家之關係極為重要。能解人苦悶，振作精神，陶冶性情，培養高尚情操。對於人心士氣之激揚蹈勵，實有莫大之作用。古人謂，樂者和也，有和諧社會，消除隔閡，聯繫人際情感之功用。

再次論「射」，蔣公謂古人自七歲入學，即開始習射，可見其重視之程度。古人謂射，指射箭而言；今則指打槍與瞄準射擊，此為自衛衛國之手段，亦即國家教民教兵必不可缺少之課程也。

又次論「御」，古代盛行車戰，一車為一乘，大夫為百乘，諸侯為千乘，天子為萬乘，衝鋒陷陣，決勝於沙場之上，御馬駕車之術的精良與否則大有關係。故「御」為古代課程之一。蔣公謂，現代言之，御則指騎馬之馬術，與駕駛各種車輛與飛機之技術。

書則指讀書與寫字而言，讀書則可增進知識，吸取經驗，學習文化之菁華。寫字或書法，在我國不僅視為一種藝術，且可

當作陶冶性情，及進德修業之日程。

最後論「數」，所謂「數」即指數學而言，目前一般統計及測量知識之技能均屬之。（註三一）

第二、六藝教育為教學生做人及立業之基礎。蔣公會以習射之目的為例，以訓示吾人。謂習射不在殺傷敵人與鳥獸，其目的在藉以鍛鍊及比較各人之精神與德性。古人之習射，不僅要練技，尤其要養德，要練精神。古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云：「射之弗中也，弓無罪，矢無罪。」此即謂藉射可使人切己體察，反躬自問，而達到進德修業之目的。

其次，蔣公謂，古人無論講射與御，均以禮為前提，比賽雖有所爭，但爭必依禮；惟其為禮讓之爭，而非權利之爭，為養德之爭，而非鬥爭之爭，故為君子之爭。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古燕禮者，所以明上下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故習射可使人心神意志日益專精，品格德性日趨高尚。（註三二）

第三、六藝教育為文武合一教育之重要內容。蔣公以禮為處世立身之道，樂為和諧性情及社會之方，射、御為自衛衛國之技，而書、數為謀職生活之具。故六藝教育為文武合一教育之重要內容，亦為現代國民所不可或缺之智能。使學生成為健全之人材，以建設現代之國家。而蔣公稱此種教育即實施文武合一術德兼修之教育。（註三三）

第四、六藝教育為完全之教育。蔣公謂完全之教育，即指廣義之「教」，而非狹義之「教」而言。所謂廣義之教，即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教育之基本內容。不僅注重學術之講授，而且注重精神道德之修養，與體魄之教導及鍛鍊。（註三四）

第五、六藝教育即軍國民教育。蔣公指出，六藝教育中之禮、樂、射、御、書、數，無一而不與軍事教育有密切之關係，故六藝教育即軍國民教育。所謂軍國民教育，並非窮兵黷武之意。蓋我國向來崇尚四維八德，以王道為本位，以道德文化感化外人，故國家強盛之後，即發揮其濟弱扶傾、自立立人之精神，以造福世界與人類。實施六藝教育，旨在奠定建設新中國之精神基礎。故六藝教育即軍國民教育，而軍國民教育即救國教育。（註三五）

第六、六藝教育為現代國民所必具之修養與技能。蔣公認教育要以六藝為基本。六藝雖為中國古代基礎教育科目，但亦為現代國民所必具之修養與技能，亦是文武合一身心兼修之教育。照此種教育內容施教，始可培養受教者成為完全無缺之人。（註三六）

唯知蔣公雖重視以六藝為教育之主要內容，但絕非復古或泥古。彼深悉教育之內容須適合時代與社會之需要。而主張因時代關係，不妨變通古時所教六藝之內容，但必須認定六藝為現代國民教育不可缺一之基本科目。（註三七）

(3)倫理民主科學之內容 蔣公在「三民主義的本質」講辭中，以三民主義之本質爲倫理、民主與科學。換言之，民主與科學，爲三民主義之精神所在，亦即達到三民主義必經之途徑。民生主義之本質爲科學，民權主義之本質爲民主，而民族主義之本質爲倫理。

科學爲達到民生目的之方法與過程，故民生主義實即科學之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目的在改善人民之生活。人民生活之基本要素爲衣、食、住、行。民生主義以「耕者有其田」，與「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之途徑，以足民食，以裕民衣，以樂民居，及以利民行。但唯有發展科學教育，始可改善民生。故各種自然科學之學科，實爲民生主義教育之內容。

民權主義之內涵爲民主。總理主張之民權主義，在以民爲主，而達到「以行主權在民之實。」蔣公謂民權主義中有若干特點：第一即全民政治，第二爲權能區分，第三爲五權分立，第四爲中央與地方均權，第五爲地方自治。故民權主義在建立全民政治之基礎，而所追求者爲真正之民主。民主之基本精神，爲自由與獨立，權利與義務。要爭取自由與獨立，必先明權利與義務之真諦。欲明權利義務之分，則必有社會科學之學養，其中以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尤爲重要。故民權主義教育之重要內容，則爲社會科學。

民族主義之內涵爲倫理，民族根於天性與種性，亦即根於倫理。倫理乃說明人與人之關係，而民族主義則以倫理爲基礎；而倫理高度發揚之結果則爲民族主義。國父提倡民族主義，主要之目的在發揚我國固有之道德。欲發揚固有之倫理道德，則必精研倫理學、道德學，以及我國之四書五經等典籍。故民族主義教育之內容，則爲人文科學。（註三八）

總之，以上三種教育內容之主張，自其實質言之，則體系一貫，相互符合，而毫無衝突也。就四育與六藝而言，禮、樂即德育；射御即體育，且兼收德育之效；而書、數則爲智育也。就四育與倫理、民主、科學而言，倫理與德育相符，民主、科學與智育、體育相符，至於群育則在班級活動及課外活動中可達成之。

此外，蔣公在學校課程方面，對於若干學科之有促進全民教育之功效者特加重視。如在「現代行政人員須知」講辭中，注重提倡音樂與體育。以高尚之音樂，可陶冶性情，敦厚風化，慰藉哀怨，激揚士氣，使一般人之精神有所歸宿調劑，而消除種種禍亂於無形，更能使整個社會煥發生機，漸漸向上發揚，其有助於政教之實施與革命之進展，效率尤爲顯著。關於音樂之重要性，在六藝教育中亦曾稍論之。至於體育，蔣公認爲要挽救一般人民體質之孱弱，精神之頹廢與整個民族衰弱之病根，實有提倡體育之必要。特別指示，提倡體育之目的，乃在普遍增進一般人民之健康，並非培養少數特殊之體育人才，更非培養一般運動會之特殊選手。提倡體育之方法，要以普遍發展爲基本原則，要以講求衛生爲第一要着。

在「爲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講辭中，以「大學」爲中國正統哲學之寶典。哲學爲人人必修之學科。以爲不修哲學，則不知如何爲人。

至於歷史與地理學科，對於達成民族精神之目的極有裨益，蔣公表示非常重視。在「革命的教育」講辭中，以歷史地理教育，可激發愛國愛同胞之思想和精神，堅定民族生存發展之自信心，發揮革命之力量，挽救國家之危亡。認其為革命建國教育之中心科目，不論在各級學校及民衆教育上均應特別重視。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蔣公對於九年國民教育及大學教育中之史、地學科亦有特別之指示。

(二)論教育方法：在教學方法方面，蔣公亦有其睿智卓絕之觀點，與一般僅偏重知識技能之傳授及訓練，而不顧品格情操之陶冶者不同。茲綜合蔣公在教育方法上之理論與訓示，重要者約有下列數端：

1.身教重於言教 在上文中，已知蔣公之施教方式，以智、德、體、群四育並重，已可窺出其重視「身教」之端倪矣。嘗謂教育之方法，最重要者係以施教者自己之人格以感化學生。我國古語云：「身教從；言教訟。」以人格感化青年及學生，即是「身教」。教師平時在言行方面，做人處世方面，均能躬親實踐，以身作則，率先倡導，學生在耳濡目染之下，自能潛移默化。

在「青年團工作根本要旨」，蔣公囑勉一般學校校長與教職員，須專心致志，對於青年學生負起教導訓迪之責任，皆應以感化學生，變化青年學生為自己唯一任務，以運用「精神感化」以達成「變化氣質」之目的。又稱，領導人員應如何研究使自己具有變化氣質之精神與本領，更如何使一般青年學生均能受到教育之感化，古人所謂「聖神功化」，此一「化」字即立己立人一切之基礎，亦即教育之能事。

「身教」一詞，換言之，即是德化教育。蔣公認為教師之人格感化，其主旨即在使學生能潛移默化，變化氣質，使其能明禮義，知廉恥也。蔣公不但主張在學校教育中應使用此種教法，即使在軍事訓練中亦應採用之。在「黨政工作人員須知（二）」演講中，認為黨政人員在軍隊中居教師之地位，應負整個教育之責任。禮義廉恥為軍隊精神教育之中心原則，智德體群四育為軍隊教育之內容。而所採用之教育方法，亦應以人格感化為主。

2.管理期於自治 蔣公對於民衆組訓及軍事教育方面，主張管理之方法以軍事化科學化為最高原則，即指管理之方法，要重組織，重紀律，重秩序，重勞動，尤其要重責任。一切重要勤務，均以受訓人員自動擔任為主，無論生活行動，皆要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標準。（註三九）由此視之，管理只是暫時之手段，主要之目的乃在管理中逐漸養成受訓者自動自發之自治精神。對民衆組訓與軍事教育之方法尚且主張如此，對一般學校之教育方法尤不例外。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七日，蔣公在南昌召集各中學校長學生，講「立志為學與服務」時，即勉勵學生一方面須自治、自強、自立，努力學業；另方面須助人、教人，努力為社會服務。

3.訓育注重啓發 舊式之訓育方式，負責訓導之人員，具有至高無上之權威，常以管理、強制、壓抑等方法加之於學生之

身上，不能收到預期之效果。蔣公訓示吾人，訓育方法應注重於啟發學員自愛、自反、自治、自律之習慣，避免被動的強迫的執行紀律。要時時引起受訓者感覺藝術化、生產化、合理化之興趣和他的重要。並且要使之知艱難，重節約，能够愛物惜用，尤其要時時養成愛護公物之習慣與風氣，並能廢物利用。又負訓導責任之人，務須要與受訓人員共同生活，共同學習和研究，隨時啟發其智能，堅定其意志，並實行參加一切課外活動，造成共甘苦，同患難之情感。（註四）。

4. 教學重視討論 蔣公以討論之方法乃領導學生走上民主化途徑之重要步驟。在教學時注重領導及自動，實際與活潑、深刻與啟發各點，須多用集會討論（辯論）、批評報告、競賽、檢查、評定、公告等方法。亦為領導機關辦事；訓練部屬增進工作效能之方法。而短期訓練尤宜於應用此種方法。蓋增加受訓者相互報告與討論之時間，並且要聽取受訓者之呼聲及需要，為改正訓練之寶貴材料，並隨時提出實際問題及其解決方案。蔣公並特別注重討論後務須獲得正確之結論，俾供訓練或教育改進之依據。（註四一）

5. 注意發展學生個性 新文化運動之後，發展學生個性之口號，盛行於教育界。蔣公認為此種學說，本非源自西洋教育哲學，中國歷代之教育家，均有此種主張。此語洵非虛也，我國講發展個性者，最著稱者為孔子。孔子之「因材施教」，即因人而異，而發展學生之個性也。唯蔣公認為教育要發展青年個性，乃為當然之事，但青年運動家與教育界負責人士必須了解如何始能發展青年學生之個性，以及二十歲左右青年之個性究竟如何？如不先明白此種道理，僅講發展個性，必將貽害青年以無窮之禍害！一切動物均有其個性，如不辨人性與獸性之分，指示青年發展人性而化除獸性，則盲目發展個性之結果，直將發展其獸性與罪惡性，而埋沒其高尚善良之人性與良知矣。（註四二）蔣公以上之訓示與卓見，實可發人深省，從事青年領導工作及教育界工作人員，應切實注意及之。

6. 注重「寓教於育」 蔣公以「教」與「育」自有不同之涵義，合「教」與「育」，方能盡陶冶下代國民之責任，兩者並重，絕不可偏廢。教者注重於知識、技能之傳授，育者側重於生活、修養之指導。而必須對於受教者之生活行動，食衣住行，起居作息，以至灑掃應對進退與課外學習，一一示以正軌，施以督導，使其身心發展，兩臻健全，庶幾道德之培養，精神之發揚，體格之鍛鍊，常識之充實，與乎心性之陶冶，情感之滋長，相輔相成，方足以完成教育之功效。（註四三）

7. 發揮教育愛 蔣公在「中國青年所負的時代使命」講辭中，指示青年運動所必須遵循之原則，其中有以「仁愛」代「殘酷」，以「利他」代「自私」；以「積極」代「消極」，以「建設」代「破壞」等原則，充分表現出對青年之關懷與愛護，亦是教育青年之正確途徑與方法。青年在教師之愛護下，深受啓示，則將能發揚已立立人、己達達人，與「仁民愛物」之偉大胸襟。此為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之精髓，亦即對抗共產主義之「殘酷」、「仇恨」教育之精神武器，際茲國家多難之秋，奸匪破壞我傳統文化與倫理之時，此種「仁愛」之精神，尤應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8.「教」「學」「做」合一 蔣公指示，教育青年應注意養成其勞動之習慣，發揚服務之精神。以爲教育與勞動，本不相分，如只學而不勞動，坐言而不能起行，不能獲得真正之學問，所謂「教」「學」與「做」應須合一。而「勞動」、「生產」、「教育」實爲不解之連環，而其最基本之一點，即是使一般學生養成勞動之習慣，發揚服務之精神。蔣公之此種主張，與陽明先生之知行合一之理論若合符節，而亦與美國近代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之「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之學說同其內涵。

（二）論爲學與做人之道：在此處所謂之「爲學」與「做人」，二者有連帶之關係。蓋蔣公論「爲學」，包括兩方面，一指治純粹學術之方法；另則指學習「修己」、「安民」之道，而後者與做人則有密切相關。

茲先論治純粹學術之方法。蔣公在「爲政與求學」講辭中大意謂，吾人之求學，必有系統，即使要求智識慾望之滿足，亦必有一個系統，有一個次序。無論何種學問，何類科學，若不作有系統之研究，東看一點，西看一點，即學過四年五年，必無任何結果。

又在「科學的道理」（原名「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中，指出治學做事基本之科學方法與程序有六：（1）範圍與組織，即指求學必注意有一定之系統，及固定之範圍。（2）立案與預備。就治學而言，立案與預備指蒐集資料，擬定研究計劃，根據實施。所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預備之功夫實屬重要。若就辦事而言，立案與準備，則指擬定辦事之方案也。（3）分工與合作，無論學問與事業，必須分工始能專精，合作始能成功。（4）研究與實驗。任何學問，唯有繼續不斷之研究，始有進步；亦惟有不斷實驗，始可驗證其精確。（5）分析與統計。在治學與做事之過程中，分析與統計之步驟可發現優點與缺點，以作改正計劃與方針之憑藉。（6）改進與發明。發現錯誤，即求改正，始能有新的發明。蔣公又在「爲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講辭中，提出爲學之六種科學方法大致相同。而且此若干種方法，實爲從事學術研究者必須遵行之途徑。

由以上所引蔣公之訓示，則知治學首先注重方法，有方法則事半功倍，無方法則事倍功半。第二爲「學貴有恆」，關於此點，即以上之「自強不息」。蔣公主研究學問，必須有繼續不斷貫徹始終之精神。在開始之前，即應考慮妥當，確定目標，決定辦法；既經開始，便要下定決心，一直做下去；雖遇任何險阻艱難，均須以百折不撓之精神，繼續不斷的進取，切不可半途而廢。（註四四）

第三爲「學以致用」。學問必注重實用，實用之學，始爲真學問。蔣公謂從前之教育，不注重實用，多屬空泛陳腐之知識，與實際生活完全脫離，不能應用。今後無論施教求學，均須注重實用，無論何門功課，不僅要教以普通之理論，切須授以實用之方法。（註四五）

蔣公論「爲學」之第二種意義，則指治「修己善群」之學，勉人「學先立志」。每人在求學之先，要立濟世救人之大志，

效法歐陽修、文天祥、陸象山、王安石等人，來改造社會，建設國家及復興民族。立志求學之最高原則則在「興滅國，繼絕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爲學之方法固要在學術技藝上用功夫，同時要實踐「禮義廉恥」之基本修養，力行新生活；並須推己及人，爲國家社會服務。（註四六）

在「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講辭中指示，吾人爲學要先學做人，換言之，即「學先立德」。故教育應以養成學生健全之人格爲第一義，應發揚我民族固有之精神道德，以爲一切學術技能之基礎。「做人」與「爲學」有密切之關係。蓋吾人應先有健全之體魄、學問、精神、道德，方可負起復興民族之責。

爲學必先確立正確之人生觀，此亦即「學先立志」之意。就宇宙言，人爲宇宙之主宰，應求無忝所生。就國家言，應作良好之國民，以盡忠於國家民族。就社會言，應爲社會勞動服務，以增進人群之福利。此即「立己」者所以「立人」，「達己」者志在「達人」，「修己」者在所以「善群」也。故 蔣公云：「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故爲學應志其大者，起點在學習如何做人，而終的則在於「濟世安民」，而以發展國民經濟，解決民生問題爲其中心目標。

#### 附 註：

- 1 講題爲「進德修業與革命之途徑」，載 蔣總統集（第一冊）第六一二至六一四頁。
- 2 「革命的教育」，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出席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講。
- 3 同上。
- 4 見 蔣總統：「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講。
- 5 見 蔣總統：「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三十年七月九日、十日對青年團中央幹事會與監察會聯席會議講。
- 6 見 蔣總統五十七年二月十日頒發「革新教育注意事項」。
- 7 蔣總統：「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第二章，第三節。
- 8 蔣總統：「革新教育注意事項」，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日。
- 9 蔣總統：「以四維八德諸德目貫注於日常生活之中」，五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 10 參閱 蔣總統：「中國教育的思想問題」，民國二十年二月在教育部講。
- 11 見 蔣總統：「中庸要旨」，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在南京陸軍大學講。
- 12 詳見 蔣總統：「大學之道（上下篇）」及「中庸要旨」。
- 13 見 蔣總統：「大學之道下篇」，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在廬山軍官團講。



- 14 見 蔣總統：「新生活運動綱要」，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 15 見 蔣總統：合作訓練之意義與目標，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講。載 蔣總統集（第一冊），第六〇四頁；
- 16 同上，第六〇五頁。
- 17 革命的教育，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講，載同上，第一〇五六頁。
- 18 見 蔣總統：訓練的目的與訓練實施綱要，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講，載同上，第一一三一頁。
- 19 見 蔣總統：軍事化教育，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五日招待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出席人員講，載同上，第一一〇二頁。
- 20 詳參閱 蔣總統：（一）「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二）「以四維八德諸德目貫注於日常生活之中」兩訓詞。
- 21 見 蔣總統：革命的教育，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講，載 蔣總統集（第一冊），第一〇五五頁。
- 22 見 蔣總統：服從命令與軍人的人格，民國十三年六月九日在黃埔軍校講，載同上，第四一一頁。
- 23 見 蔣總統：說軍紀，民國十三年六月八日在黃埔軍校講，載同上，第四〇七頁。
- 24 見 蔣總統：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講，載同上，第一一〇七頁。
- 25 見 蔣總統：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民國四十年九月三日在陽明山莊講，載同上（第二冊），第一八〇〇頁。
- 26 見 蔣總統：教育與革命建國的關係，民國四十年九月三日在陽明山莊講，載同上，第一八〇〇頁。
- 27 見 蔣總統：建國的行政，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出席高級行政人員會議閉幕典禮講，載同上（第一冊），第九四五頁。
- 28 見 蔣總統：推進政治注重農村建設，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八日在漢口總部講，載同上，第八四九頁。
- 29 參閱 蔣總統：新生活運動綱要，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公佈，載同上（第二冊），第二〇五一至二〇五六頁。
- 30 見 蔣總統：對陪都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指示，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講，載同上，第一四五一至一四五二頁。
- 31 詳閱 蔣總統：軍人精神教育之精義（二），載同上（第一冊），第七〇一至七〇二頁。
- 32 詳閱 蔣總統：軍事教育之要旨（五），載同上，第八二二至八二三頁。
- 33 詳閱 蔣總統：救國必須實施文武合一術德兼修的教育，載同上，第八八一至八八二頁。
- 34 詳閱 蔣總統：為學之目的與教育之要義，載同上，第八八四頁。
- 35 詳閱 蔣總統：現代國家的生命力，載同上，第九〇九至九一〇頁。
- 36 詳閱 蔣總統：軍事化的教育，載同上，第一一〇三頁。
- 37 同上。
- 38 詳閱 蔣總統：三民主義的本質——倫理、民主、科學，民國四十一年七月七日在夏令講習會講。載同上（第二冊），第一八四一至一八五〇頁。
- 39 詳閱 蔣總統：訓練的目的與訓練實施綱要，民國二十八年講，載同上（第一冊），第一二〇至一二三七頁。

40 同上。

41 同上。

42 詳見 蔣總統：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民國三十年七月九日、十日講，載同上（第二冊），第一三五二頁。

43 詳見 蔣總統：對陪都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指示，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講，載同上，第一四五一至一四五二頁。

44 詳見 蔣總統：科理的道理，載同上（第一冊）第八五二頁。

45 詳見 蔣總統：為學辦事與做人的基本要道，載同上，第八五八頁。

46 詳見 蔣總統：立志為學與服務，民國二十三年講，載同上，第七六六至七七〇頁。

## 陸、蔣公之倫理教育思想

筆者嘗謂，中國傳統文化之精髓為倫理道德，欲復興中華文化，必自恢復固有之倫理道德着手。蓋倫理道德實為維繫中華民族五千年生命之綱紀，安定傳統社會於不墮之肯綮，以及保障國家民族繼續強盛與繁衍之中心力量。今則又謂，在蔣公之教育思想中，而其倫理教育思想亦佔重要之地位，在其演講、專著、文告、談話、雜著等，闡明傳統倫理道德思想之要點，處處可見。影響 蔣公倫理教育思想之因素甚多，茲舉其犖犖大者，略述如後：

### 一、影響 蔣公倫理思想之因素

(一)家庭教育：蔣公祖先世代務農，父肅庵公，正直勤儉，常為鄰里排訟解紛，親屬多敬重之。母王太夫人，仁慈嚴正，對子女教育，極為重視。蔣公九歲失怙，王太夫人茹苦含辛，撫育幼稚，備極劬勞。當時吏胥勢豪，欺凌交加。王太夫人獨撐家門，歷盡艱苦。蔣公在「報國與思親」一文中，曾追述前情有云：「當此之時，獨賴吾母本其仁慈，堅其苦節，毅然自任以保家育子之重，外而周旋豪強，保護稚弱，內而輯和族里，整飭戶庭，罔不躬親負荷，謹慎將事。」

蔣公幼年穎悟，稟賦過人，王太夫人慈愛有加，但偶有過失，從不寬容。常自謂「及六歲就學，……而先妣訓迪不倦，或夏楚頻施不稍姑息。」（註一）又云：「其於中正撫愛之深，常如嬰孩，而督教之嚴，甚於師保。出入必檢其所携，游息必詢其所往，罷讀歸來，必考其所學；而又課以灑掃應對之儀，教以刻苦自立之道，督令躬親傭保僕賤之工作，以勵其身心；夜寐夙興，無時不傾注其全力，期撫孤子於成立。」（註二）由此可見，王太夫人對 蔣公幼年之教育，可謂寬嚴有度，皆合禮法，深具古代賢母風範。

王太夫人有超人之見解與膽識，誠非一般婦女所能及。平日訓誨 蔣公，常勉以讀書報國大義。蔣公十八歲時，深受留學

救國輿論之激勵，蓄志東渡習陸軍，鄰里親故，群相阻難，王太夫人則獨具慧眼，力排衆議，促子成行。及蔣公許身黨國，奔走革命之際，而「戚族相戒，莫敢通問」，而王太夫人則曾不稍懼；迨蔣公革命事業遭受挫折之際，而王太夫人則又勉之勸之，以堅其志。故知蔣公完美之人格，與崇高之志節，實由於自幼秉承庭訓，深受母教之薰陶所致；而一生救國救民，獻身黨國，亦實因受王太夫人「大孝報國」之鼓勵，有以致之也。

蔣公自幼秉承母教，對我國傳統之倫理道德不但深有體驗，且能篤履實踐。一生事母至孝，嘗自謂：「虛度六十，馬齒徒長，對母親未報作育之恩，對國家未盡忠孝之職；民衆痛苦，遺族罔恤，捫心自問，清夜長思，愧惶無地！」（註三）蔣公亦能深體慈母苦心，一生移孝作忠，盡瘁於黨國事業。在「報國與思親」中曾云：「口體之養，世俗之譽。非所以盡孝；男兒惟以身許國，乃爲無忝於所生。凡茲懿言，皆吾迄今猶無以慰吾母九泉之望；每憶昔日寡母孤兒，形影相依之情景，彌覺罔極深恩之圖報無日也。」我國古代以「孝」爲百行之先，孝爲諸德之本。禮記祭義篇：「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蔣公在「報國與思親」一文中亦云：「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爲吾中華立國固有之精神與道德，而孝道尤爲總理遺教所特重！可知中國立國之道，自來皆以孝爲本，唯孝莫大於尊親，其次曰不辱。所謂尊親，謂發揚光大吾祖先黃帝之遺緒；所謂不辱，謂當勿貽吾父母以隕越之羞。」由此視之，蔣公之倫理教育思想，得益於其家庭教育者實多。

（二）自然環境：蔣公世居浙東奉化縣溪口鎮。浙東擅山水之勝，有四明、徐甌諸勝，山明水秀、地靈人傑。經國先生遊徐甌岩時曾曰：「此間山水美麗清奇，世罕其匹。聞康有爲在其七十國遊記中，認世界上山川之美，黃山第一，美國黃石公園第二，可惜康未遊雪竇與徐甌也。」（註四）雪竇即四明盛景之一。

蔣公一生喜愛山水，於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引退後，次日，即歸故鄉輶輅光養晦，當時雖赤餒瀾漫，國事方艱之際，初卸仔肩，猶繫念不忘國家命運與民族前途。惟半生爲國操勞，難得有如此餘暇，故暫時寄情於山水雲壑之際，徜徉於山林泉石之間。與家人友朋等遊雪竇寺，觀千丈巖瀑布，訪育王寺，遊石倉、華蓋山、法華庵、妙高台、獅子山、隱潭、寶林寺、峨山、白虎山、引仙橋、小盤山諸名勝。

和談決裂之後，李宗仁無力統御，共匪長驅直入，半壁河山，慘遭蹂躪，三十八年八月，蔣公雖已來台，經各方敦促，望以國家民族爲重，出而力挽狂瀾。當時以在野之身，僕僕風塵，飛抵重慶坐鎮，指揮西北及西南戰局。猶能於忙中偷閒，偕經國先生等遊覽黃山勝景。

蔣公在台復行視事後，亦常乘日理萬機之暇，不忘情於山水，徜徉於陽明山、大溪、慈湖、日月潭、溪頭、壽山、橫貫公路等風景勝地，常於林泉溪壑之間，月白風清之際，而決軍國大計。

經國先生曾描寫 蔣公引退後鄉居情形，有云：「父親自本（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以來，家鄉遨遊，將閱四月；在此百餘日中，雖心懷邦國，而閒情逸致，不減當年，蓋亦唯有在寧靜中更能致遠耳。」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在大自然之優美環境中，方能養成恢宏之胸襟，高尚之情操，清白之志節，與「仁民愛物」之偉大懷抱，故能退而怡情滌慮，寄情於山水之美；進而則憂國憂民，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此種大仁大智人格之完成，則深受自然環境薰陶之功也。

（三）傳統文化：蔣公少年時代，適值清代末季，時雖歐風東漸，但深受我國傳統文化之薰陶。五歲入塾。八歲讀大學中庸。九歲讀論語孟子，習禮記。十歲讀孝經，王太夫人教以禮樂。十二歲讀詩經，間習古文辭，學作制藝。十三歲出就外傳，往嵎縣葛溪，從姚宗元讀尚書。十四歲，從毛鳳美讀易。王太夫人教公親習勞作，藝桑灌園，以鍛鍊其身心。十五歲讀於皇甫氏，學作策論。十六歲從毛思誠溫習左傳，圈點綱鑑。十七歲，赴縣城肄業鳳麓學堂，受新式教育。十九歲，赴寧波，從顧清康於箭金公學，讀周秦諸子，說文解字及曾文正集，並研究性理之學。顧先生授 公以孫子兵法，且講述民族大義。公始有出國學陸軍之志願。（註五）

綜觀 蔣公在二十歲以前之求學經過，悉習我國古代之重要經典，潛心研讀，融會貫通。故在從政之後，其一貫主張，無不以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恢復民族固有倫理道德爲己任。蓋我國古代文化之骨幹爲倫理道德，自孔孟以至宗明大儒，均致力於發明道德之知及性理之學，教人敦品勵行，仁民愛物。蔣公深受我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一生對於倡導民族之固有道德，曾不遺餘力。

（四）總理感召：蔣公自二十二歲，在日本由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二十三歲，初次謁 總理，傾談國事。總理許爲不多得之革命人才。二十五歲返國響應武昌起義。此後即追隨 總理，贊襄革命大業，依爲左右手。國父倡導革命，手著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中，以爲欲使中華民族獨立，國家富強，首須恢復固有道德知識與能力。我國固有之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爲抵抗外來侵略，達成「民族自決」之精神武器。蔣公嘗謂：「總理嘗語吾人，中國立國，自有其道，不可徒效外國之皮毛，更不可抄襲帝國主義之霸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爲吾中華立國固有之精神與道德，而孝道尤爲 總理遺教所特重。」（註六）總理講「軍人精神教育」（註七）時以智、仁、勇三達德，爲軍人精神之要素。以軍人之智有四，曰：（一）別是非。（二）明利害。（三）識時勢。（四）知彼己。以仁之種類有三，曰：（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國之仁。軍人之仁，其目的在於救國。謂勇有小勇大勇之別，而軍人之勇，在成仁取義，爲世界上之大勇。以上種種，皆爲傳統文化中之精髓也，總理提倡之在先，蔣公發揚之於後。在蔣公之演講及論著中，闡明我國固有道德之處，所在多見，而個人一生之修養，得力於傳統倫理道德之神益者實多；而受 總理人格及思想之感召者尤多。在「中國教育的思想問題」中，蔣公以 中山先生之思想，爲中國之正統思想，即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之仁義道德思想。將之發

揚光大，三民主義即自仁義道德中發生出來。蔣公爲總理忠實之信徒，一生盡瘁黨國，奉行主義，復興中華文化，恢復固有道德。

## 二、蔣公之人格修養

(一)刻苦耐勞之獨立精神：蔣公幼年喪父，「一門孤寡，兒子無依」，里脅迫，豪強肆虐，甚至「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生活之困苦，不言而喻。嘗自云：「吾母子含憤茹痛，荼蘼之苦，不足以喻。」幸賴王太夫人刻苦卓絕，勤儉自持，主家教子，卒至於成立。故又曰：「然而豪強之侵逼，能陷吾母子於困厄，而不能挫吾母保家教子之志節，亦不能阻吾母自求多福之途徑。」（註八）在此幼年艱苦煎迫之環境中，母子相依爲命，與環境奮鬥，與惡勢力相搏，卒能養成其刻苦耐勞之獨立之精神。

蔣公幼年家境清寒，生活儉樸，且因世代務農，忠厚傳家，故庭訓甚嚴。平時父母不但課以灑掃應對之儀，亦教以家庭瑣細勞役之工作。曾自述云：

『我從前在家裏，每天一定要掃地，洗地板，還要燒飯。吃飯的碗筷，也統統自己洗滌，吃完飯的時候，不僅桌上不能有半粒飯屑，就是飯碗裏有一點不乾淨，也一定要受父母的嚴格教訓，甚至打罵。穿衣也是一樣，如果有一顆扣子沒有扣，父母也要罵的，洗臉有一點沒有乾淨，父母一定叫我再洗。』

是知拂逆與窮苦之環境，正足以磨鍊一人之志節，不屈服於環境，決心戰勝窮困，必使人卓然獨立而有所成就。

(二)堅毅持恆之奮鬥精神：蔣公幼年家境艱苦，又受國父革命精神之感召，而養成剛毅持恆之奮鬥精神。自獻身革命大業之後，歷盡艱苦，飽受挫折。但橫逆之來不能挫其心，侮蔑之至不足喪其志，而愈挫愈勇，擇善固執，卒能突破艱險，使革命大業終底於成。領導東征北伐，以少勝多，備嘗艱辛，但終能完成全國統一。對日抗戰，以劣等裝備，對抗強十倍於我之頑寇，但憑堅毅不拔之毅力，終能贏得最後之勝利。戡亂戰爭，雖遭暫時之挫敗，播遷來台，從不因局勢之惡劣，而對反共抗俄之革命信心發生動搖。但當時蔣公處境之險惡，如無超人之堅毅精神，決無法應付。嘗曰：「本（民國三十八年）年憂患艱危忍辱茹辛，在內奸外敵重重包圍夾擊之下，幾乎無倖存之理，而乃竟能出生死堅忍不撼。」（註九）在奸匪環伺之下，台澎金馬風雨飄搖之際，在菲律賓會談中，蔣公尚面對季里諾總統，作堅決之保證，而謂：「余可保證我國政府決不致被共匪消滅，如果政府當局降共或崩潰，則余必繼起領導反共到底。」在顛沛板蕩之際，而壯志豪情不減，而失敗主義者及落井下石之國際友人，能無愧乎！卒以堅毅有恆之決心，領導自由中國軍民，建立台澎金馬爲反攻復國之基礎，二十年來慘淡經營，國軍日日壯大，海內外歸心，國際友人側目而視，奸匪寢食不安。嘗訓示吾人曰：「天下無不勞而倖得之收穫，亦無徒勞而不

穫之耕耘，唯貴以一致之精誠，出以持續之努力，則任何艱危，無不可以突破之理。」（註十）

（三）光明磊落之誠實態度：蔣公一生繼承國父遺志，致力革命大業，然其謀國之苦心，常遭人誤解，含沙射影，惡意中傷者不知凡幾！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囊括我東北，蔣公以當時國力未充，不足以抗強敵，乃委曲求全，冀收桑榆，國內群情鼎沸，譁然雀噪，但此種苦心，甚少為人諒解！復鑑於「攘外必先安內」，遂定剿匪計劃。但奸匪乘機宣傳，惡意侮蔑，幾使國人魚魯不辨。以致張、楊受共匪之利用，發動西安事變。及至張學良閱讀蔣公日記之後，始悉領袖謀國之忠，乃幡然知悔。

民國三十三年，為決定抗日戰爭最後勝敗關鍵之一。毛匪澤東，包藏禍心，運用其所謂「統一戰線」之政策，以打擊政府，孤立政府，提出組織「聯合政府」之口號，參加政府，冀乘機奪取政權。並對美國朝野大事宣傳，鼓動美國干涉我內政；且陰謀與日寇夾擊我軍，顛覆政府，當時領袖處境之惡，可以想見。蔣公在此（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日記中記載：

「國家前途多難，尤以俄國與中共問題為最大；但此乃關於國家存亡之幾，在我者惟有以天理與常道為準則，遵此而行。至於存亡盛衰，非所逆觀。對我黨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其後形勢益惡，外國各報在華記者，清濁不辨，對蔣公極盡詆譭污辱之能事；不時向國外廣播，誣蔑我政府。勝利之後，美英盟邦，誤信奸匪宣傳，棄盟友於不顧，反而為虎作倀；而國內黨內黨外跳樑之輩，反以蔣公為共匪和談之障礙，內外交詬，促請引退。却適中共匪統戰之伎倆，卒導致大陸淪陷，赤禍遍地！國人此時始悉共匪之真面目，而亦明白蔣公堅持戡亂決計者，實為國家民族之前途命運着想，而非為個人一己之進退也。（註十）

蔣公此種光明磊落之態度，一本至誠，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中，曾以「誠」為革命之原動力，有「擇善固執，貫徹始終」之意義。惟有誠乃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唯有誠乃為物之終始，乃能一往無前，貫徹到底；唯有誠乃能創造，能奮鬥，能犧牲。蔣公一生為國為民，秉心大公至誠，故嘗曰：「能公必能『誠』」；又曰：「求得人生最完滿的境界，我的所作所為，皆要本乎『至誠』。」（註一一）此種謀國苦心，因出自至誠，故態度光明磊落，榮辱不藏於心，進退不以為念也。

（四）澹泊寧靜之致遠修養：蔣公自追隨總理革命之初，即深受器重。陳英士先生被刺殞命之後，國父尤倚為股肱。然亦因此，常受內外人士之嫉視，責難頻至。故時因對國事意見不合，屢請自退，藉以促使黨內人士之團結，而一致謀國，恆不以個人之進退而介懷也。關於此點，在民國十三年三月二日，復上總理書中，可以見之。其中有云：「蓋世嘗有終身忍受枉屈，而不得宣諸口者，亦有言非其時，非其人、非其地，言之不惟無益，反足以見笑而自玷者，此古人所以寧為放逐伏死於巖蔽江濱，而不願回面污行，苟合取容，以求親近於一時也。」又云：「然而義不苟取，更不願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期通其

聲氣，此亦中正之所自矢耳。」復云：「中正任事固無他長足取，惟此一念至誠，不爲私而爲公，不爲權利之爭，而爲道義之交，乃可表見於吾黨也。是以處世接物，一以道義爲依歸，而合則留不合則去二語，爲中正惟一箴語。」

此等胸懷，何等瀟灑！老年人有之，不足爲奇，時 蔣公公正值盛年，却不以個人之得失繫心，非大有修養者，曷克致此！蓋與 蔣公自幼之母教及自然環境頗有關係也。王太夫人嘗教之曰：「自汝父之歿，吾辛辛苦苦，使汝讀書，非欲攬顯官擁厚資也，所望爲國自愛，以保先人之令名足矣！平居燕語，亦屢以是相勗。」（註十三）民國十四年，蔣公返里掃墓，重修武嶺樂亭，亭落成，作記，其中有云：「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潄洄，游魚可數。牧童漁父，徜徉其間，樂且無窮。其幽靜雅逸之景象，竊歎世外桃源，無事他求矣。」至「無事他求矣」一語，可見 蔣公澹泊寧靜之志趣。

三十八年初，蔣公引退之後，返里小憩，與家人親朋徜徉於水林泉石之間，怡然自得。二月六日，携經國先生等遊「石倉」，在徐家宅吃烤蕃薯。事後，經國先生記之曰：「深覺家鄉風味，舌本留甘也。」

又同月十三日，經國先生會記之曰：「鎮日冷風侵骨，下午携兒輩，侍 父親往桃坑山，橫路埂祭掃祖墳，後回慈庵。夜間月光皎潔，父親獨步龜山，聽泉賞月，一塵不染，玄覽澄懷，優遊自得。倘使國家昇平，父親早應享此高蹈之清福；而乃於匪氣梟張之時，始暫卸政務仔肩，偶然樂此逸境，豈天意亦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乎！」（註一四）蔣公此等急流勇退之精神，乃大勇之表現，如有益於國家之前途，國人之團結，而不計個人之進退，非平日有「主靜立極」之功夫，胡克得古人「用進舍藏」之深旨！此蓋經國先生之所謂「唯有在寧靜中更能致遠耳！」

（四）謙冲退讓之容忍風範：蔣公一生秉公爲國，不計進退。謙冲退讓之精神，足資範式。又爲促成國內團結，處處忍讓，不計個人之毀譽。民國十六年，公繼續揮師北伐，時汪精衛爲共黨利用，造成寧漢分裂。公爲避免目標，冀便團結，自行引退，辭去本兼各職，回鄉掃墓。是爲公之第一次下野。同年十一月，汪兆銘在廣東成立政府，十二月共產黨在廣東暴亂。四中全会預備會議決議請 公復職；各方亦紛電促 公再起。民國十七年一月，中政會決議任 公爲北伐全軍總司令。繼續督師北伐，六月，克復平津，全國統一。公以任務完成，回京，提請解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中央懇切挽留。八月，五中全會推 公任國民政府主席。

民國二十年，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侵我東三省。公在行營聞訊，書立遺囑，決心抗日。十二月，四屆一中全會開會，粵方人員僅一部紛參加，胡漢民等在上海堅持要 公下野。公爲促成黨內團結，辭國民政府主席職，離京回鄉。是爲 公之第二次下野。

二十一年，「一二八」事變爆發。中央同志聯電促 公入京，挽救危亡。三月，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開會，決議任 公爲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負責救國。

民國三十六年元旦，頒佈中華民國憲法。四月，公仍被推選任國民政府主席。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公被選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共匪叛亂日亟，公於三十八年元旦，發表文告，表示和平如有可求，不計個人進退，期以促成國內和平。遂於元月二十一日，宣佈引退，並發表文告，闡明「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因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全文充分顯示公謀國爲民之苦心。是爲公之第三次下野。

三十八年，大陸變色，政府播遷來台，時中樞無主，人心惶惶，幸公以在野之身，支撐危局，轉危爲安。三十九年，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議，請公復職。立法委員三百餘人亦同時聯名電請。三月一日，公宣佈復行視事，並發表文告，說明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當此危急存亡之日，受全體軍民同胞責望之切，已無推諉責任之可能，乃決定復職，繼續爲反共復國而奮鬥。二十年來，自由中國軍民，在公領導之下，勵精圖治，生聚教訓，使國軍力量日日壯大，台澎金馬成爲反攻復國之基地，皆公之英明領導有以致之！

綜觀蔣公一生三次引退，又三次應政府及全國軍民之促請，出而担任鉅艱，力挽狂瀾，不戀棧權位，不計個人得失，如此謙冲退讓之容忍風範，足堪景仰！

(四) 剛直無私之嚴正態度：蔣公一生之革命過程中，遭逢種種阻撓與詆毀。其中尤以汪兆銘、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等或惡意中傷，或竊慕權位，或受人挑撥，或受匪利用，然皆爲蔣公剛直無私之嚴正態度所懾，或潛跡遁形，或投順輸誠，或感愧知悔。民國十五年，公督師北伐，共黨份子鼓動反動派對公大肆攻擊，誣爲新軍閥，促汪兆銘出主黨政。公在南昌發佈告黃埔同學書，闡明革命立場，力主黨內團結。民國十八年，馮玉祥部實行破壞交通，陰謀叛變，公三次電馮，多方曉喻，馮不聽，乃下令通緝。七月，馮玉祥悔過，國府下令撤銷通緝令。旋又稱叛。是年初，廣西李宗仁部稱叛，公曉以大義，不聽，乃派兵擊潰之。十九年，馮與楊虎城、閻錫山合謀稱叛，汪兆銘與叛變軍閥合流。九月，閻錫山通電下野；十月，公自前方呈請國府赦免政治犯，馮玉祥通電下野。二十年，胡漢民對召開國民會議，獨持異見，言論偏激，同志憤慨，公一再手書勸胡珍重革命歷史。四月，胡系在越謀叛，通電勸公，公呈請中央徹查。二十五年十二月，張學良、楊虎城叛變，以禍國條件脅公署諾，公嚴詞峻拒，蒙難西安逾半月，卒以人格感化，張、楊悔悟，護公回京。二十七年，日相近衛提東亞新秩序，發出調整國交之聲明，公發表駁斥文告，指出此一聲明爲敵人吞滅中國，獨霸東亞，征服世界的妄想陰謀之總自白。汪兆銘響應近衛聲明，離渝出走至河內，發表艷電，主張中止抗戰。公回渝，嚴詞駁斥汪電，並下令通緝。

在抗戰初期，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汪兆銘等，終能在蔣公肝膽相照之下，尙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不幸汪、馮中途變節，或依附日寇，或爲匪俄作僇，卒至身敗名裂。李宗仁於三十年當選爲副總統，唯爲權位薰心，復受奸匪煽惑，與投



機份子同流合污，對公心有芥蒂。但公一本以往剛直無私之嚴正態度，不與計較，且在在野之身，調誠協助，冀以挽救國家民族之命運於萬一。

(六)公而忘私之負責精神：民國十年，十月十四日，母太夫人卒。公哀慟守制，總理馳電奪情，乃赴粵桂。旋請歸葬母，葬畢又赴桂。十一年，陳炯明率部叛變，總理避居永豐艦，公聞難赴粵，卒護總理脫險到滬。並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以揭發陳逆罪狀。十六年，寧漢分裂日甚，公爲委曲求全，以喚醒黨內團結，乃自請引退。十二月一日，公與宋美齡女士結婚於上海。時汪兆銘在廣東成立政府；國民政府發討伐廣東令。共產黨在廣東暴動。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決議，請公復職，各方亦紛紛敦促。十七年一月四日，公進京呈報正式復職。

觀上所舉，公在母喪之時，或在新婚之際，但一聞總理徵召，或政府電催，即刻啓程，遄赴國事，此種公而忘私，認真負責之精神，實可令人景慕不置。

蔣公人格之如此完美，得力於其平時治學及修養工夫。嘗勸人爲學當先立志，因訓示吾人曰：「無論教學都要以『立大志』爲首要的急務。必須立定大志，方可做大事，能做大事，乃可成大功，立大業。古人所謂：『人皆可以爲聖賢。』又說：『不爲聖賢，便爲禽獸！』我們立志，就是要做聖賢豪傑，做大學問家，道德家，大政治家，事業家，來救人救世，復興民族！」

#### （註一五）

蔣公治學一本先儒立教之旨，仍主自格、致、誠、正之工夫做起，馴至修、齊、治、平之大道理。平時極重「慎獨」、「切己省察」、「存心養性」，與「主敬」，故能「處變不驚」，「臨危不亂」，而有「大担当」，「大決斷」。橫逆之來不足以挫其心，危難之至不足以敗其志。其有法天自強箴之「至誠無息」，與「主敬立極」；畏天自修箴之「慎獨誠意」，與「克己復禮」；事天自安箴之「存心養性」，與「寓理帥氣」；故能有如養天自樂箴之「澹泊沖漠，本然自得，浩浩淵淵，鳶飛魚躍」之心境。（註一六）非平日有深厚之靜養工夫，曷能至此？

三十八年，經國先生四十歲生日，蔣公書「寓理帥氣」字軸以祝之。其跋中有云：「每日晚課，默誦孟子養氣章，十五年來未曾或間，自覺於此略有領悟。又嘗玩索存心養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無聲無臭，惟虛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帥氣』，爲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體認深切，引爲自快。」而盼經國先生切己體察，卓然自強，而不負所望。

四十八年，蔣公又書「主敬立極」字軸，以祝經國先生五十歲生日，勉其「益擴充往日寓理帥氣修養工夫，其意在不偏不激，盈科漸進，事事皆能忍辱負重，尤望能逆來順受，一以大中至正，無憂無懼處之，以期有成焉。」前後兩軸，蔣公盡意在訓勉經國先生，使其能領會我民族傳統之大道與實踐之門徑，其來源有自，而切己體察焉。

經國先生六十歲生日時，蔣公又題「精一執中」以勉之，並闡述其精義。其中有云：

『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乃我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道統之正傳，朱子序中庸章句曰：「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器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平，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稍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余以為朱子此說，乃闡述道統危微精一中之正解，尤以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一語，以闡明中字之義，誠為開示蘊奧明且盡者矣，故余每晨默誦此篇，切已反省，未嘗有所間斷。」

觀乎以上所引，則知 蔣公平日存心養性之工夫，是何等之勤，何等之力！每晚默誦孟子養氣章，十五年來未曾間斷；每晨誦朱子「精一執中」釋義篇，而切己體察，雖古之聖賢，亦不過如此耳！因其用功之勤如是，體察之微又如彼，故能深得孔孟「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之奧旨，而推其「人溺己溺」、「人饑己饑」之愛心，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天下。」「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為 蔣公「大公無私」及「捨生取義」之偉大胸襟的寫照。「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一聯，則為 蔣公之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之人生觀及宇宙觀。

### 三、論蔣公之道德教育思想

(一)力行實踐之道德哲學：總理倡「知難行易」學說，蔣公主「力行哲學」理論，上已述之。力行實踐為 蔣公之革命人生觀，而其道德思想即植基於「力行哲學」之上。蔣公在研究總理「知難行易」說與王陽明之「致良知」時，指出宇宙中除物質之外，尚有精神，承認精神之存在，便承認心意之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唯良知在能「致」，致即是行，所謂致良知，亦即「知難行易」之實行者，如此所謂良知，始不致落空，始不致成為空疏之唯心論者，亦不致成為機械之唯物論者。故吾人對於哲學之態度，不能承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古今來宇宙間，只有一個「行」字始能創造一切，唯認知難行易為唯一之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之哲學，為唯一之人生哲學。故吾人要完成革命，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唯有實行總理「知難行易」之學說，唯有實行總理之三民主義，復興我國固有之民族性。（註一七）

由此觀之，蔣公之「力行哲學」乃融合總理之「知難行易」說，與王陽明之「致良知」說，而特重「致」與「行」，因以建立其力行實踐之革命人生觀。而此種人生觀，又以民生哲學之「心物合一論」為其基礎，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補二說之偏頗，救兩者之不足。

在本節之開始處，即稱「蔣公之道德教育理論，植基於總理之「知難行易」說，與蔣公本人之「力行哲學」之上。在此擬引蔣公之講辭以證之。在「革命哲學的重要」演講中，蔣公會訓示曰：『三民主義是什麼？在倫理和政治方面講：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做基礎，在方法實行上講：就是「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現在我們要恢復民族精神，要中國的國家民族復興，就先要恢復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道德，尤其要實行總理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來充實這個哲學的精神，推動這個哲學的效用。』蔣公在此篇講辭中，特別說明「知行合一」與「知難行易」，均淵源於「大學之道」。而稱革命之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而以「三民主義」即大學中「明德」、「親民」之道理，為我國立國之精神所在，此即所謂「國魂」。國魂即是民族精神。要恢復民族精神，即須先恢復中國固有之民族道德；尤其要實行總理知難行易之革命哲學。

道德固需有理論之基礎，但尤重實踐，吾人若徒具有豐富之道德理論，而不肯行仁取義，使「道德之知」與「道德之行」分離，不僅對個人之進德修業毫無裨益，即對端正人心與夫轉移社會風氣亦毫無幫助。故「行德」較「知德」尤為重要。

蔣公在道德教育方面，主張道德在於力行實踐，以為「殺身成仁」及「捨生取義」之大智大勇，為救國救民之革命事業。但此種「成仁」、「取義」之「立人」、「達人」之偉大精神，則發自於個人平日之「成己」工夫上，常勸人要切實反省，以此種省察工夫，為一切學問道德和事業進步之基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即其每日自我省察之工夫。反省可使人「日新又新」，然後推而及外，始可担負完成革命、復興民族之重大使命。（註一八）

蔣公在其專著「政治的道理」中，而稱政治要以人為本，要以修養人格與推己及人為推行之根本。政治應由個人對家庭社會國家完滿負責做起，應篤行五達道與三達德，而以「誠」字貫徹到底。為政之道，在乎由內及外，使天下人由親及疏，各得其所，以達和平安樂之治。政治之運動力在乎「誠」，而完成「誠」之德性，在乎力學與篤行。政治之理想及目的，在提高「人」之品格，發揮「人」之價值與功用，修明「人」與「人」之關係，故為政在人，一切以人為本。並以政治哲學應與倫理哲學相合為一，政治應以倫理為基礎，故施政必行仁政。

蔣公在講「大學之道」時，而以大學之道即一切做人做事之大道理。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即大學之三大綱領。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大學之八項條目。由內在的德智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之過程，可謂本末兼賅，體用合一，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道。蔣公在此篇中，表列大學之道綱領，條理井然，極為清晰。而以「格物」、「致知」為「即物窮理」之工夫；「誠意」、「正心」為「慎獨存誠」之工夫；「修身」為「成德立業」之工夫。而「即物窮理」、「慎獨存誠」與「成德立業」在於「明明德」，而「明明德」即是「修己」之工夫，換言之亦即「內聖」之工夫。又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開物成務」之事業，即

「親民」、「治人」之工作，換言之，亦即「外王」之大業。而「內聖」正所以爲「外王」也。若能「擇善固執」，則能「日新又新」，而「止於至善」。但此一貫大道，由內至外，自個人至國家天下，無不賴於力行實踐。故 蔣公稱，大學之三綱八目，爲做人——做國民，尤爲做軍人最重要之學問也。

關於此點，蔣公在「爲政與求學」演講中亦曾說明之。大意謂，一個人要從事革命事業，首須要有品格，講究誠意、正心、修身，否則，無論如何聰明，有多大之學問，亦不能成立功業。唯有個人先求實踐力行，先求修己，方能治人，先有良好之品德修養，然後始能推己及人，去完成轟轟烈烈之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是知「修己」即所以「善群」也。

蔣公提倡新生活運動，主張廢除舊日之散漫、頹廢之生活，而過整齊、清潔、迅速、樸實之新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禮、義、廉、恥等道德。又主張將倫理道德貫注於日常生活中，均爲倡導道德教育上之篤履實踐，及身體力行之風氣，使之蔚然成風，而形成全國之道德實踐運動。

(二)成仁取義之革命人生觀：成仁、取義表面視之雖爲二，實則一也。蓋仁與義本相通。事實上，不但仁、義相通，實則仁與諸德皆有密切之關係。因仁綜諸德，禮記云：「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嚴有如此者。」

蔣公講「禮義廉恥的精義」時，則以無論「禮義廉恥」，無論「孝弟忠信」，無論「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或「智信仁勇嚴」，雖有德目之多寡，與文字上標示之異，而其所指之真實意義，均相互包涵，互相關連，可以彼此發明，貫通一致。

蔣公又謂，仁字之含義甚廣，但最簡切之解釋，即爲「博愛」，即是「爲人」。自字義上講：「仁者人也」，可見「仁」即合乎人道之意。如抱「博愛」主義，存爲人之心，再表現於吾人之一切行爲，施之於諸般事物，爲他人，爲社會，爲國家造福，此即所謂「救人之仁」，「救國之仁」與「救世之仁」，亦即「禮義廉恥」之義。故 蔣公指出「禮義廉恥」之「義」，即爲「智仁勇」之「仁」。

由此視之，凡能「成仁」者，必能「取義」；凡能「踐仁」「行義」者，必能實踐其他諸德。其故何在？蓋我國自古即以「仁」爲統攝諸德之一個最重要之元德也。關於此點，蔣公在「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中解釋得極爲詳盡。曾謂，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中，稱軍人之道德爲「智、仁、勇」。而我國古代謂軍人之基本德性有五種，即「智、信、仁、勇、嚴」，兩者雖有簡繁之異，而基本之德性仍舊相同。無論講「智仁勇」或「智信仁勇嚴」均有此「仁」字在其中間，因「仁」爲軍人精神之基本，亦爲中國一切固有道德之中心，又可謂統攝諸德之重要元德，爲我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流傳下之基本倫理。亦即中國數千年來以道德相承之中心。如無「仁」，一切之精神與道德，則不能整體連貫，完成高尚純潔圓滿無缺之人格，與至大至剛之氣節；因道本惟一，德必求全，一有偏缺，必至走入歧途，得此失彼。

是故仁者必能捨己爲人，辨義利，別生死，在緊要關頭，而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故曰：「唯仁者能愛人」。

蔣公在「軍人精神教育之精義」(一)中，曾訓示曰：

『這種保國家救百姓復興民族文化的革命事業是什麼？就是叫仁，就是要行「仁」。古人說：「仁者人也。」張子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思都是說「仁」就是「爲人」，就是不要專顧自己而犧牲自己來爲他人造福，這就是「仁」字最簡要的注釋。我們之所以要革命，要打仗，要剿匪，完全是爲要救國家，救人民，完全是要行「仁」，即以「仁」爲心，行「仁」之道，求「仁」之普遍圓滿的實現。「仁」之普遍圓滿的實現即革命的「成功」；爲達此目的而犧牲我們自己，就是個人的「成仁」。革命軍人能個個成仁，革命事業必能整個的「成功」，也必須有許多革命黨員能「成仁」，然後艱難偉大的革命事業才能「成功」。所以「成仁」與「成功」可以說就是一件事情。我們革命軍人的犧牲一切，效命疆場，就是要達「成功」或「成仁」的目的！就是要「行仁！」』

蔣公有成仁取義之革命人生觀，故能臨危不懼，置個人之死生於度外。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孫大總統蒙難，蔣公聞之，即遄赴廣州，毅然負起捍衛總統之責，卒使中山先生脫險，安然抵滬。領導東征北伐，冒鋒鏑，犯矢石，指揮若定，卒使十倍於我之軍閥爲之崩潰，而統一全國。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受共匪煽惑，突然發動西安事變，脅迫蔣公。當時蔣公雖身處危難，正氣凜然，毫不爲叛軍所屈。曾面斥張曰：『余爲長官，汝爲叛逆，國法軍紀對汝叛逆均應執行懲罰，況斥責乎？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爾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個民族四萬萬人之人格，人格尙有毀傷，民族即失其存在，爾以余爲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爾有武氣，我有正氣；我雖然無武器，須知正氣與喉舌即爲余之武器，余必捍禦民族之人格，而求無愧爲總理之信徒，無負於革命之先烈，亦必無負於生我之天地父母與全國國民！爾小子何知，乃妄想余爲爾所威脅，而視余今日之正氣爲個強乎？爾如有勇氣，則立時斃余；不然，則認錯悔罪，立時釋余。否則，爾既不敢殺余，又不能釋余，則爾將來更何以自處？余爲爾計，應立時斃余，乃爲上策。爾曷不毅然殺余耶？』蔣公當時決心以身殉國，故面斥叛逆，義正辭嚴，卒使張、楊感愧，俯首悔罪。

三十八年，蔣公引退之後，而共匪擴大叛亂，破壞和談；當時代總統李宗仁束手無策，多方規避。蔣公目觀國家民族之命運已至生死交關，毅然以在野之身，負起指揮西南軍事之責，親冒矢石，飛抵重慶坐鎮。當匪軍合圍重慶之勢已成，指揮國軍轉移陣地，時匪軍砲火已射入機場，而蔣公仍不肯起飛，左右再三強請，始搭機而去。

由以上所舉之少數事例中，可證明蔣公之一生從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者不知凡幾，其所以能有「成仁」及「取義」之決心及勇氣者，乃發自於不怕死、不怕難之大無畏的精神。平日只知有國，不知有家；只知有黨，而不知有個人之犧牲決心，

發而爲浩然正氣，一旦視「義」之所在，故決不反顧也。

六十四年，蔣公病中，猶手書「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一聯，交經國先生收藏。此一聯語可爲蔣公一生「成仁」、「取義」之精神的寫照，而發自於內心肺腑之最後心聲。

(三)修己善群之利他人本論：蔣公平日教人，先注意個人人格之修養。一個人如果品德不良，決不能成大功立大業。在「爲政與求學」演講中，曾謂：

『一個人要做革命事業，就是要有品格，講究正心誠意修身；否則，這個人無論怎樣聰明，有多大的學問，也決不會成功事業的。我們將來要做國家的一個政治家，要成功一點事業的話，就一定要注意到總理所親口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這幾句話。就是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心正、身修、家齊、治國、平天下。總理就是要平天下的人，不僅是治中國，還要進到世界大同，到世界大同即是平天下。』（一九）

上文所引，亦即儒家所謂「修己」與「善群」之大道理。欲善群，必先修己，否則不能言善群。蓋「修己」爲「善群」之基礎；「善群」爲「修己」之推廣。換言之，即「己立」而後始能「立人」，「己達」而後始能「達人」，「成己」而後始能「成物」也。大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與「修身」乃「修己」之工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善群」之事業。但後者必以前者爲基礎。

善於「修己」者，必有仁心，推此仁心，故能發揮「老老」、「幼幼」之精神。是即孔子所謂之「仁民愛物」之心；亦即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懷抱，與王陽明之「萬物一體之仁」也。

蔣公對於「仁民愛物」之精旨，曾有極詳明之闡釋，而謂：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革命軍人，對於古人所講的「仁民愛物」這一句話，個個人都應當能了解，能實行。所謂「仁民愛物」就是對於人民，要愛他們，對於一切的物品，除非是有害的東西，如毒蛇病菌之類，必須撲滅他之外；其他一切也要加意愛護。因爲我們能愛人民，所以能推「仁民」之心而「愛物」，因爲能愛物，當然更能愛民！所以愛民與愛物，道理是一貫的，意思是相同的，所以古人把「仁民愛物」兩件事，連帶來講，並且視爲做人最緊要的一句話，無論那一個人，尤其是我們軍人都應該澈底明瞭這個道理，從而身體力行，切實做到纔好！』（註二）。

蔣公在指出革命之人生觀時，要人首須了解生活之目的，與生命之意義。就其本身體驗之結果，曾撰書成一付聯語，即「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此一聯語，即爲「仁民愛物」極好之注釋。蔣公常謂革命工作即是「行仁」，其意蓋指革命之工作，乃救國救民之工作。革命先烈因有良好之修養，故能發揮一己之仁心，拋頭顱，灑熱血，捐軀體，前仆後繼，而救國家於危亡，拯人民於水火之中。此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偉大胸襟，完

全爲「利他」精神之發揚。三民主義爲人本主義，以人爲本，以民爲本，前已言之。民族主義在求民族之獨立，使每一國民都有獨立之人格；民權主義在求民權之普遍，使全國國民均有平等自由之精神；民生主義在求民生之發展，使全國國民均能豐衣足食，生活改善。蔣公爲三民主義之信徒，一生憂國憂民，救國救民，置個人之危險及死生於不顧，此種只知有人，不知有己之利他精神，因其抱有「以國爲重」、「以民爲重」之「人本論」的「利他」思想也。嘗訓示吾人曰：『人本是一個爭生存的动物，但因人類進化，生命就有一種向上的衝動。這一點向上利他的衝動，存之於心便是「德」，施之於物便是「善」。故「德」貴自覺，而「善」貴及人，自覺就是「明德」，及人就是「至善」。所以一個人有利他的傾向，便能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凡是一個人愛父母兄弟，愛人類，愛社會，愛國家，愛民族，都是一點利他性的擴充。』（註二一）蔣公在此指出人類因進化而有利他之衝動，衝動者，本能也，此利他之衝動，亦即生而即有之善心，推此善心，故能仁民而愛物。實爲對抗與駁斥馬列唯物史觀之精神武器也。唯物論者以階級鬥爭方能促進人類之進化，在民族間、在國際間廣事製造糾紛，挑撥叛亂；在國內人民間，則處處製造仇恨，進行清算鬥爭，儘量抹煞人之善性，助長人之獸性，實爲我傳統道德之公敵，唯有發揚我國固有之道德，方足以消滅此邪說於無形也。

（四）光大傳統之倫理思想：總理在民族主義中，主張恢復我民族固有之倫理道德；蔣公進一步發揚光大此種思想，提倡四維、八德、三達德、五達道等，而尤其對於我國「大學」、「中庸」之精旨，闡發無遺。故此現代兩大偉人，不僅爲我國傳統思想之繼承者，尤爲我國傳統思想之發揚光大者。

蔣公在敘述總理思想之淵源時，曾數次論及中山先生之思想淵源，即繼承中國自古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所流傳之道德，其根本精神，即要用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來領導革命，復興民族。蔣公並稱，一蘇俄代表會問總理之革命哲學基礎爲何時，總理即以上語答之。蔣公在講述「總理生平之根本思想與革命人格」時，曾引用戴季陶先生所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之內容，其中曾謂，中山先生之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以總理爲孔子之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之大聖。並以中山先生之人格，『乃以仁愛爲基礎，一切表現，無不仁愛，有過人之智，而其智惟用於知仁，有過人之勇，而其勇惟用於行仁，可知離却仁愛，絕無革命可言，民生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的基礎，其他一切道德，皆不外由此而生，完成仁愛之用而已。』（註二二）由此可知，總理之根本思想，乃淵源於我國之傳統思想，而尤其根源於中國固有之倫理思想。而三民主義即中國固有倫理思想之實踐及發揚，戴季陶先生將智、仁、勇三達德，與中山先生之民族、民權、民生聯貫一起，以前者爲「達德」，後者爲「達道」。曾謂：『天下之達道三：民族也，民權也，民生也。所以行之三：智、仁、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也。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蔣公會對此段加以解釋如下：

「這一段，是說天下可以行得通的大道，只有三條，即民族、民權、民生，人類社會一切問題，都可歸結這三項，古今天下下的學術文化，都是要解決這三個問題。總理的三民主義，就是古今中外一切學術思想的結晶，就是解決人類社會問題最妥當的方法；總理的三民主義，而民族、民權、民生三條，要如何才能實行，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尤其是每一個革命黨員，要具備三種可以行通的德性，所謂智仁勇三種德性，必具備智仁勇三種德性，才能行得通民族民權民生三條大道，所以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這三種德性，乃現代國民人人所應有，亦為我們民族所固有，如果人家要問我們民族固有的基本德性是甚麼，我們可以回答他，中個民族固有德性，就是智仁勇，亦可說是總理所講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一個人如果沒有這種德性，便不配做一個現代國民，尤其不配做一個革命黨員。怎樣才算有智仁勇三種德性呢？……要具此三種達德而充溢發揮以大功立大業，必先能「誠」，誠即是「一」，一心一德，始終如一。所以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也。」（註二三）

由 蔣公上述之解釋中，更可明瞭總理之三民主義，與我國之傳統倫理思想實是同條共貫，一脈相承。總理曾為蔣公講「天下為公」及「大學」、「中庸」之理，而謂中國自古即有良好之倫理哲學及政治哲學，「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哲學，乃現代西方人所崇尚之哲學，是極為危險之思想。大學中庸之道，始為中國良好之倫理哲學及政治哲學。蔣公自稱經過總理指導之後，思想及信仰為之完全改變。（註二四）

蔣公講「大學之道（上下篇）」、「中庸要旨」及「政治的道理」，合稱為「科學的學庸」，乃闡揚我國傳統倫理哲學及政治哲學最重要之文獻。深入淺出，精闢入微，真所謂見前人之所未見，發前人之所未發也。大學、中庸為我國古代修己善群之道，立身處世之術。蔣公在「革命哲學的重要」演講中，以「國魂」即為民族精神，欲恢復民族精神，先要恢復中國固有之民族道德；尤其要實行總理知難行易之革命哲學。並以總理之「知難行易」，與陽明之「知行合一」，均淵源於「大學之道」。而謂大學為革命之道，為革命之學。並將總理之三民主義，與大學之道相互對照發明。謂大學之道，就「體」之方面言，即自「明明德」做起，其次在「親民」，而以「至善」為止。就「用」之方面言，即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做起，其次在「修身」、「齊家」，而以「治國」、「平天下」為歸。總理之「三民主義」與「知難行易」之學說，即始於衣食住行之微，而極於大同之治。故以知難致其知，而以行易致其用。故總理之主義學說，除形式上富有時代之色彩外，其本質、方法、作用，完全與大學之道相符合。（註二五）

蔣公平日無論對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民衆教育，均訓示以恢復民族固有之倫理道德為其功能；即使對黨員教育與軍人教育，仍以實施道德教育為主。在「軍隊教育的要點」中，主張訓練軍隊，在技術之外，一定要注意固有道德之訓練。所謂固有道德，即總理所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亦即管子之所謂「禮義廉恥」。此皆我中華民族數千年遺留下之固有的道德精神



，有此道德性，方可成爲一個人，創立一個國家，軍隊必須有此精神，方可克敵致果，爭取勝利。由此視之，蔣公實爲我傳統倫理道德之實踐者，倡導者，恢復者，而尤爲其發揚光大者，信不誣也。

#### 附 註

- 1 參閱 蔣總統：先妣王太夫人事略，民國十年六月二十五日，載蔣總統集（第二冊），第二四三〇至二四三一頁。
- 2 詳閱 蔣總統：報國與思親，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載同上，第二四三二頁。
- 3 見蔣經國著：風雨中的寧靜，第三三頁，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六十四年五版。
- 4 同上，第一六二頁。
- 5 見 蔣總統革命報國大事紀要，載「領袖精神萬古常新」，第二八〇至二八一，中央日報社編印。
- 6 同註二。
- 7 見 總理：軍人精神教育，民國十一年一月講，載 國父全書，第九〇六至九一九頁，國防研究院印行。
- 8 同註二，第二四三二至二四三三頁。
- 9 同註三，第一一八頁。
- 10 同註二。
- 11 參考自蔣經國著：風雨中的寧靜。
- 12 同上。
- 13 同註一。
- 14 同註三，第一五二頁。
- 15 見 蔣總統：立志爲學與服務，二十三年六月七日講，載 蔣總統集（第一冊），第七六七頁。
- 16 蔣總統四箴，每箴各有八句，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書，見「領袖精神萬古常新」一書，第二二頁。
- 17 見 蔣總統：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講，載 蔣總統集（第一冊），第五八〇頁。
- 18 見 蔣總統：中國魂，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講，載同上，第七七五頁。
- 19 見 蔣總統：爲政與求學，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二日講，載同上，第五六二至五六四頁。
- 20 見 蔣總統：軍官自勉之道，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講，載同上，第六五六頁。
- 21 見 蔣總統：革命哲學的重要，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講，載同上，第五八四頁。
- 22 見 蔣總統：總理生平之根本思想與革命人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二講，載同上，第七四〇至七四三頁。
- 23 同上。
- 24 見 蔣總統：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講，載同上，第五八一頁。

總統 蔣公教育思想之研述

## 柒、結 論

綜觀 蔣公一生論著甚多，其中有關教育之論著及言論，多散見於專著及演講中，但其教育思想對我國近代教育實際方面之影響，可謂至大且鉅，其對教育方面之演講、專著、談話及訓示等，無一而不爲一切教育實施之根據，以及改進之準繩。雖日理萬機，却能以其睿智卓見，發人之尚未發，見人之尚未見；常針對時弊，指示改革方向，導引教育事業之發展，步入正軌。尤其難能可貴，而使我輩從事教育工作人員汗顏者，是其理論實際兼顧，原理方法並重，以理論指導實際，以方法反證原理。此種精神得力於其力行哲學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者極多。其論教育之目的及意義，不但完全切合我國古人論「教育」之精旨，即以現代中外著名之教育學者的眼光視之，亦無不符合教育之一切規範與準則也。茲以個人研述 蔣公教育思想之結果，深悉其教育理論有下列若干重點，並略如後：

(一)體系性：蔣公之教育理論，雖散見於其專著、演講、訓示之中，但在研讀之下，即可見其體系一貫，條理分明。所發表之有關教育方面之言論，前後相差幾近半個世紀，但教育思想之重點，與一貫之主張，始終屹立不搖，完全以三民主義教育之要旨爲依據。蔣公自民國十六年一月在江西教育講習會，發表「三民主義要旨與三民主義教育之重要」，主張改革教育，要以實施三民主義之教育爲本，所謂三民主義之教育，即民族教育，民權教育，民生教育。其後數十年來有關教育方面之改革訓示，悉以此爲張本，絕無變更。蔣公爲總理思想之信徒，認定三民主義爲救國之唯一武器，故一生奉行三民主義，救國救民，擇善固執，不稍改變。故三民主義教育爲 蔣公整個教育思想之體系，此後一切教育之言論與訓示，完全環繞此一中心。時間延續數十年之久，言論散見於各專著、演講及訓示之中，仍不失有其完整之體系性。

(二)調和性：三民主義之思想本質含有調和性：民族主義調和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民權主義調和權力主義與自由主義；民生主義調和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心物合一論，又調和唯心論與唯物論。三民主義教育之本質亦具有濃重之調和性。在西方之教育學說中，個人主義教育說偏重個性之發展；社會學派之教育家則偏重群性之陶冶，我國之民生教育注重人性教育，謀個人個性之發展，民權教育注重群性教育，重視公民責任之訓練，使個性與群性獲得均衡之發展，以調和了個人主義與社會學派在教育理上之矛盾。自然主義之教育學者偏重兒童本性之自然發展，唯物論之教育家偏重個人勞動生產之訓練。我國民生教育注重人民自然生活之改善，實施生產與職業教育；民族教育注重精神生活之充實，重視民族精神教育及道德教育，兼顧生理與精神生活之陶冶，折衷了自然主義之只重心智生活與唯物論之只重物質生活之衝突。英國實利主義之教育學者認教育乃使兒童青年做成人生活準備之歷程，偏重個人現實生活各種活動之滿足，故特重自然科學教育；德國理想主義者認教育爲

個人理念不斷發展之歷程，培育崇高之理想，追求真、善、美之精神生活，而特重人文學科之教育，二者相互扞格，積不相能。我國民生教育提倡自然科學教育，注重培養生活技能，以滿足人類物質生活上之各種需求；民族教育注重人文教育，重視情意之陶冶，道德之訓練，故調和了實利主義之只偏重自然科學教育，理想主義之只偏重人文科學教育之偏頗。

蔣公提倡三民主義教育，在其教育思想中，具有以上之調和性自無疑義。除此之外，在對日抗戰前後，蔣公倡導軍國民教育。但此種教育與德國之軍國主義教育完全不同，前已述之。後者在帝國主義之羽翼之下，為極端之國家主義教育，有濃厚之侵略色彩。蔣公所提倡之軍國民教育，以民族主義教育為依據，對內要擺脫列強之侵略，達到「民族獨立」之目的；對外則濟弱扶傾，聯合弱小民族共同奮鬥，以奠立大同之治。故蔣公之軍國民教育實調和了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之教育。

（三）更新性：在教育活動上，蔣公提倡道德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在教育內容上倡導六藝教育。表面視之，似有復古陳腐之弊。實則不然，國父在民族主義中，而以恢復民族固有之道德與智能，方可恢復民族之自信心，方可外禦列強之侵略，內求民族之獨立。蔣公認定我國固有之倫理道德為救國救民之唯一武器。且也道德之德目雖舊，而道德之精義，則常隨時代及社會之進步，以適應當前之需要。至於蔣公之提倡六藝教育，亦非照古代之禮、樂、射、御、書、數一成不變的用之於今日。蔣公特別注重六藝教育之實用性，主張採用古代六藝教育之精神，而在內容方面，注意適合時代需要，而酌予改變與充實，以求推陳出新也。

（四）適應性：蔣公在教育上之主張與訓示，經常注重適合時代及當時環境之需要，而作適當之調整。舉例言之，以民族主義教育而言，在全國未統一前，蔣公認為提倡民族主義教育，旨在打倒軍閥，解除人民之倒懸；抗戰期間，而民族主義教育則以外禦強敵，內求民族之團結為目的；戡亂期間，民族主義教育則以消滅奸匪，維護數千年之傳統文化，保障民族生命為職責。對日戰爭時，為求強國強種，以擊敗強敵起見，則提倡軍國民教育，文武合一教育等。民國五十七年之前，各級學校教育作惡性之升學競爭，缺點畢露，蔣公在五十七年，通令全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特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訓示中，在國民教育階段實施生活教育，民族精神教育，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及職業陶冶，以圖澈底消滅升學競爭及惡性補習之弊，使國民教育導入正軌。凡此種種措施，皆足以證明蔣公能適應時代之潮流及需要，而在教育上作適當之改革也。